

# 目 录

导言 全球化理论的问题	1
总的问题	2
“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理论	8
第一章 肖尔特的谬误	18
导 言	18
定义的成就	21
何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26
第二章 罗布·沃科尔 :哲学的背景？	45
导 言	45
本体论假设	50
空间与现代性	53
为什么是空间？	59
国际理论的质疑	62

第三章 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 社会学的基础？ 87

导 言 87

形成断裂 91

前进还是后退？ 99

队列中的困惑 112

论证的重组 121

时间和空间在捉迷藏 127

结论 全球化理论庙宇的坍塌 158

## 导言 全球化理论的问题

1990年,安东尼·吉登斯写道:“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的辞典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术语。”<sup>①</sup>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于1999年发表关于这个课题的演讲<sup>②</sup>之时,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因为在此期间的十年中,这一术语取得的进展已经相当可观。在学术著作和政府政策声明中,在新闻媒介和公众意识中,均宣称这个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联合在一起了,该观点似乎已确立了牢固的影响力。《国际先锋论坛》更是无与伦比,它在一个10月的早晨<sup>③</sup>着实让读者震惊了一下,因为该期的一条标题是:“全球化跃变为现实”。而在许多学术著作中,学者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赋予这个概念的学术含义,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全球化不仅被认为标志着一种真实的、基本的社会转型——“以全球性传播现代性”<sup>④</sup>,而且,作为这种转型的结果,一些正统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也变成多余的了,这甚至波及到“社会”这一概念本身。更为戏剧性的是,全球化使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化”<sup>⑤</sup>成为必需,这种空间化是建立在对社会秩序结构中的交通速度之中心地位的“回溯性发现”<sup>⑥</sup>上的:

大洲和作为整体的全球的划分,是距离起的显著的作用,而距离的产生又归因于交通的原始性和旅途的艰难,这一点突然变得很清楚……“距离”是一个社

会的产物,它的长度根据能够克服距离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所有其他用以构建、分离和维持集体认同的社会的产物——诸如国家边界和文化障碍——回过头来看,似乎仅仅是速度的副产品。<sup>⑦</sup>

简单地说,对于一些作家——以下称之为“全球化理论家”<sup>⑧</sup>——而言,全球化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论题”,并成为“我们借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转换的关键概念”<sup>⑨</sup>。

## 总的问题

在任何严肃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结果。因为恰恰是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的“全球化”自身充满了麻烦。毕竟,乍一看来,“全球化”这一术语仅仅是一个描述性范畴,既表示社会进程的地理扩张,又有可能表示吉登斯所定义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sup>⑩</sup>。现在,既然没有人否定“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今天确实以种种方式存在着,而且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理应没有人反对倡导一种全球化理论,如果这种理论意味着是对上述进程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的解释。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如果要避免空洞的循环,就必须求助于一些更为基本的社会理论,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术语所表示的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如此独特、如此显著的特色。(全球化不能被仅仅解释为引起朝向全球化这种结果发展的过程。)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举例来说,如果“时空压缩”被解释为一种特殊历史类型的社会关系的自发属性,那么“全球化”这一术语将根本不是它所表示的那个理论——它将仅仅作为这种历史进程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程度的尺度。很清楚,全球化的理论家们还打算做得更多。他们宣称,作为社会活动场所

的单一全球空间的出现,日渐压倒了其他任何偶然性的结果,这种偶然性传统上曾被用于解释社会现象。他们推断,这一现象的地理维度已经转换为一种替代理论,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维度问题。最后,他们不仅使这一问题与当代社会科学进行竞争,而且使之与全部现代社会思潮的古典基础进行竞争。通过所有这些方式,他们已经使自己的眼界超越了这一概念所承担的单纯描述性角色。在他们论点的逻辑结构中,原本作为被解释项的全球化,作为某种历史进程发展的结果,已经逐渐转换为解释项了:恰恰是全球化现在正在解释现代世界的变化,甚至还产生了对过去时代的“回溯性发现”,本来这些问题是假定不存在的。

这种被解释项与解释项的倒置不能在纯逻辑的基础上被轻易地加以否决。毕竟,一种特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自身确实可以逐渐变成为重要的原因,反过来又制造出原初历史进程所不能产生的结果。这对于历史发展的本质而言是固有的。比如说,马克思就相信,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已经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础,而无论这些关系原初是否是其他原因(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的)造成的。事实上,马克思也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是系统陈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一新问题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他也断言对于过去(前资本主义时代)作回溯性发现的可能性。<sup>①</sup>这一对照表明,全球化理论不能简单地根据推断加以否定。但是,这也提醒我们注意这种理论的真实特征。正如安克·胡格维尔特在一部表述温和但准确地把握了这种观念转换的书中指出的:

这里争论的是,由于世界正被重新组合成一个单一的社会空间,完全同一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全球化)现在已经跃变为一个新的可变通范围。如果说,在以前,在人类状况逐渐统一和渗透的意义上的全球整合,

是受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所驱动的话,那么,在今天,恰恰是人类状况的统一,驱使着进一步资本积累的逻辑发展。<sup>⑫</sup>

在这一变迁中,我们可以确定将在以后涉及到的基本区别了,即全球化的理论(a theory of globalization)和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的区别:前者可以从一切导致时空现象的事物中构建;相反,后者一定是在这些现象自身中得出它的解释机制的。简言之,后者需要——甚至以此为先决条件——对社会理论本身的时空重构。而且,正是全球化理论的后一种论述——在文献中日益显露出自信的论述——将在本书以下部分受到质疑。

必须记住,在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史学史、哲学和历史学的观念中——我们只需略举几例——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丰富文献,其中一些相当广泛,这对于领会全球化这一奇特的发展也许是有帮助的。长久以来,人们已经达成下列共识:即时间性和空间性是随着时段和文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被人们在心理上经历到,而且那些不同的方式是与社会秩序的建构高度一致的。<sup>⑬</sup>

同样已经确立的是,在任何比较性的评论中,特殊意义的现代,即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化的时空建构,已经急转直下成为一种历史的例外、社会学上的特殊和文化上的奇特现象(都是从字面意义上说的),尽管这仍然是重要的学术讨论的主题<sup>⑭</sup>。通常用来描述这种特殊性的形容词为“抽象的”、“线性的”、“虚化的”、“可虚化的”。而且,在相当一批文献中,已经有人试图致力于去理解这种特别的时空建构是何时、怎样、在哪里起源的,并去理解它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和传播中(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其外)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今

那些社会的社会权力的组织和文化意义的建构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社会学意义上的和哲学意义上的)<sup>15</sup>。

然而,当人们阅读这些文献时,很快便会意识到——而且这肯定是关键点——在那些更为严肃的作品中,没有人会在字面上理解“虚化”(empty)。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确认,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上把空间和时间当做没有内容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进程定位并形成于其中。这种进程能够通过时空来分析——考虑到距离、接近、持续、同时、顺序等的“客观性”的基础,来阐明它们如何调动所有的可能性。而且,把空间、时间当做是虚化的、同质的、统一的、抽象的,是建构这种形式的分析的前提条件。这些作家也都认识到,西方调动空间和时间的现代特殊性,的确是根植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它独一无二地推断:这种“虚化”、“科学性”是它自身文化和社会对空间和时间建构的中心形式,而且这反过来又是构成现代社会再生产的许多重要维度——诸如官僚机构、意识的历史形式、民族国家的界限,等等——的条件。<sup>16</sup>

但也不过仅此而已。因为首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其他时段和文化时,就不能弄清楚,鲁尔、提夫、阿尔及利亚、马雅、古希腊、巴厘等地方的人们生活在与现代欧洲如此不同的时空世界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本应该出现的他们自身的现代性。虚化空间和时间的观点与前社会自然特性的明显对应,不能改变这些观点充满着社会和文化决定论的事实。这种状况只会使上述决定论易于出错,因而非常可能使这些决定论自然化。

避免这一结果的惟一方式是基于分析来加入如下问题:在哪一种社会(或文化)中,时空维度采取“可虚化”时空这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其原因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它间接地控制着分析的逻辑结构,比如,罗伯特·大

卫·萨克在《人类的领土性：理论和历史》中对空间的论述，或唐纳德·洛在《资产阶级感觉的历史》中对时间的分析，以及尼柯斯·普兰查斯对他称之为“时间和空间的内在概念模式”<sup>①7</sup>的分析，就是如此。而且，这种分析远不是将接下去的关于时空在社会现实结构中的重要性问题缩小化，却恰恰是将它们适当地组织起来以在社会学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因此，即使是（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在研究空间和时间的领域中——这一领域中的时空现象非常突出——颠倒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正常关系的动向也遭到普遍的抵制。相反，颇具特点的先行动向是，借助于以虚化形式制造和再制造时空的特殊社会和文化关系，来对现代时间和空间的虚化进行社会学和现象学上的解构。通过这种方式，时空问题本身的出现就被排除了，而且人们可以轻易地明白这是为什么。无论牛顿或后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家可能会告诉过我们有关自然界的什么，却没有谁经历过不是以特殊的社会—文化形式斡旋和建构的时空决定因素。因此，试图去构造一种普遍的时空研究的术语，就必然会碰到比较分析的问题——这使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不同地产生了距离、接近、持续、同时、顺序等共同参数。然而，如果这些范畴被完全融合到社会解释的逻辑结构中去，它们就必然导致争论，如同萨克以外交辞令指出的：“将空间的重要性过分普遍化”<sup>①8</sup>。而且在这种过分的普遍化中还内在地存在着进一步的危险：虚化空间和时间（它们实际上来源于这些现代形式的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的特性，将会很不明智地赋予空间和时间本身“客观”的特征，并因此使一些现象自然化和不可破译，其效果恰恰是促进了空间和时间在第一位置上的高度膨胀。简言之，它们将被人为化。在这个基本的理论错误上，我们指出，我们将在全球化理论中发现最终的根源和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里根对她日益昏聩的父亲说：  
你的本性站在了它的范围的边缘：  
你将被某些辨别力左右和引导，  
它们比你自己更好地判别你的国家。<sup>19</sup>

当代社会科学在它们热望解决时空问题时，似乎也是站在了它们的连贯性的边缘。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将试图表明，它们超越了这个边缘。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对三个跨越边缘的例子加以分析，以作品的先后为序，分别是让·阿尔特·肖尔特、罗布·沃科尔和安东尼·吉登斯。第一位作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倡导全球化理论，第二位作家贯通国际关系领域和哲学领域，最后一位占据了“直接的”社会学领域，而且肯定是全球化的社会学领域中最著名的倡导者。通过对比这三个例子——每一个都来自于不同的智力方向（而且每一个文本都显然不能够和其他文本相互参照）——我们能够得出隐含在全球化理论雄心中的谬误。

但是，本书的目的并不都是否定性的。全球化理论因其全部的知识上的巨大努力，还是有其优点的：它使两点可以值得讨论和辩护。第一点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地位——它首先在卡尔·马克思的书中体现出来，其后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体现出来，也在持续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体现出来。既然这种发展的本身仅在其与演进中的历史事实的关系中才有意义，那么这些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从而能否使它们与当代社会保持联系的问题，就完全站得住脚了。而且，正是这种质疑迫使C·赖特·米尔斯称之为“传统的古典社会分析”<sup>20</sup>的拥护者们更新和扩展了传统，他们试图证明古典社会学的方法和眼界可以阐释看起来超过它们的分析范围的历史事实。在这本书中，肯定的目标必须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即批判其他作家。不过仍然很有希望的是，在这种批判中，本书

正在捍卫的价值也变得更清楚了。然而,如果书中对这些作家作出有力的评判的话,那么该书其实是不应该被当做一部试图证明这些作品不合理的书来读的。事实的真相是,笔者正是由于上述作家的激励才得出他自己更为细致的结论的。所以,最强烈的反对也必须最终服从于把我们统一在一起的东西:集体努力以理解社会世界的共同追求。

在全球化理论的争论中被抛出的第二个争议问题是:现代性的社会世界,把“国际”的观念当做重要和特殊的维度。有时,全球化理论相当极端地对之加以否定,这迫使我们估量这一观念,并澄清什么应该加以保留,或者是否应该全盘保留,什么正处在危险之中。

## “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理论

如果“大洲和作为整体的全球的划分”的确在被打破的话,并且如果全球化理论的含义合理的话,那么不仅作为一个地域实体的“社会”的概念将必须让位于正在发生的现实,而且传统上被定义为跨实体、实体间和实体中的相互行动的研究也将被迫进行最基本的修改。因此,让·阿尔特·肖尔特指出,“方法论上的领土主义”已被写进了“国家间”关系的定义中去了。他提出,这使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人都被当代全球挑战中的“超地域”特征所蒙蔽。因为这种状况不仅日益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地域空间中,也日益存在于由现代金融市场、卫星通讯和计算机网络促成的“无距离空间”中。现在迫切需要进行知识上的纠正了:“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对方法论上的领土主义做出让步,其危险性是存在的。”<sup>②</sup>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的纠正尚未进行,或者至少不像全球化理论家在其他领域中进行得那么快。根据马尔科姆·沃

特斯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理论已证明不能超越“全球化的原理论”<sup>②</sup>。在这种理论中,超越国家整合的进程与主权国家的持续重要性有争议地并存着;这种“二元性仍然是全球化中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sup>③</sup>。如果捍卫全球化理论的战斗仍旧不能赢得这块阵地的话,警报就始终长鸣着。而且,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近几年不断涌现,它们采取了新的术语,并宣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终结。<sup>④</sup>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细节上,这些作品都宣称,围绕着主权、地域国家建立的世界组织正逐渐淹没在新种类的(非地域的)联系之下。这种联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制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权力的空间和机制构成——一种“后国际”<sup>⑤</sup>体系,其形式与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国家之间模式的联系越来越少。

在下面的讨论中,在有关这件事的沙堆上将画出两条线。首先,人们争论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存在物,作为当代宣称全球化理论的重要性的关键历史土壤,事实上是个神话。定义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纯粹是基于国家间相互行动的地理基准的,它实际上(在社会学上)来源于最狭窄的国际理论——政治现实主义。而且它已经阻碍了对国际关系更丰富的理解了,这种理解来源于对更广阔的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观念而取得的发展的分析,那是一种看不见的发展,或者无论如何是不相关的发展。准确地说,为什么全球化理论——最具前瞻性的信条——本应该使它自己在知识上更依赖于最传统的历史前提,将在第一章结尾处加以讨论。

如果我们画的第一条线是指向一种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评论,那么令人惊讶的是,第二条线将跨越第一条线以形成同样重要的防线。因为在国际的全球化理论中融合进(正在消退的)威斯特伐利亚信条,将轻而易举地对由跨越人类社会、社会间和社会中的相互行动提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

的那些普遍问题的分析上的决定因素加以直接的否定。这就是说,它已经变为一种否决,即对传统上构成国际关系的显著主题(可以被称为“国际问题”)的否决。这种否决得到了罗布·沃科尔的支持,他以他独特的方式在他的著作《局内与局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sup>⑧</sup>中加以赞同。因此,我们将在第二章中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有限的例子,在“国际问题”的关键对应点上构造一个可辩护的版本。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为什么任何人都要关心国际关系学科?而且为什么任何一个不在这个狭隘的领域,并且有可能远离这个领域的读者,都要对这一如此神秘的进程怀有兴趣?答案是:他们有可能并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远离这个学科,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这个学科之外。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化研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接一个学科将触角伸入到“全球范围”内,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于一个地理上扩大的全球视野中。这种延伸使其他学科也进入到国际关系的门槛,因为一种日益形成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的存在,已经非常必然地构成了研究的经验实体。所有这些新来者并不是都能给这个领域带来受欢迎的养分的,特别是在冷战中,这一领域似乎注定知识贫乏。与此同时,以前存在的东西尽管有很多缺点,却是否证明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对新来者们也是意义重大。如果它们不能证明——或者它们证明的东西又证实仅仅只是纯粹的历史现象(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点它们还不能正确地理解,而且这些现象的条件无论如何已经过时了——那么,人们将理所当然地忽略它们。

但是必须说一句友好的提醒的话:新来者应该当心。因为在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积累下来的思考,事实上都是围绕着更为普遍和持久意义这个问题的,那么,对于任何不够谨慎也许会忽视这种可能性的新来者,就应该抱有另一种不

同的预测了。要么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这个学科中重复着历代有关自由主义和其他“理想主义”的实践,他们对现实主义正统的干涉的反对,因其不能掩盖住这些普遍问题的重要性而无所作为;要么他们致力于艰苦的进程,以便以不同的方式重塑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齐格蒙特·鲍曼肯定不是惟一遭遇到后一种命运的人,但是他的例子是惊人的一例:

这个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社会学在处理超越民族国家和其他任何东西范围之外的社会空间上,很是无能为力,除了在分析意义上的被压缩的“环境”。

只有在现在,我们才能理解,在何种程度上,社会学的所有主要范畴因其意义和时间上的无能为力而依赖于典型的社会内空间的关系,这种空间不同于任何由普遍确认(也就是在空间内)的权威认证的想像的社会空间……我认为,苦心经营适合于分析“非社会”的社会空间中的依赖和相互行动的范畴,是社会学面临的最紧迫任务。这种空间是指没有“原则上的同等”、“占主导的文化”、“合法的权威”等等的那一种……需要修正的现实,不仅仅在于它当前的形式,而且也在于它貌似合理的前景,这比社会学家过去试图在知识上理解的任何东西都更具可改变性,更异质,更“不够典范”。<sup>②7</sup>

鲍曼“现在惟一能……开始理解”的,当然是历代国际关系正统研究中的中心和定义问题。

因此,对于那些正在从外面进入到这一领域中的人而言,全球化的主题可能已经提供了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有用方法,而且他们因此感到疑惑,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如此显著。答案是,一句古老的谚语仍然有用:故事已经告诉你了。

既然如此,全球化理论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遭遇国际关系理论时的困难,而在于它自身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显露出来的深层次的矛盾:在它试图构建一个“全球化”作为解释项时,却导致了“空间”概念的膨胀,这不仅带来了本体论上的判别困难,而且易于制造具体事物而不是解释。并且我们还仍然要说,维持这种优先性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该怎样进行呢?答案只能是,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理论家自身的文本中检查这些假设的结果。全球化理论使它的拥护者如此依赖于有关空间理论的断言,这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是如何寻求证实这些断言的呢?反过来,这些断言是否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他们所经历的解释困难的核心问题呢?我们必须拭目以待。

全球化理论中空间概念膨胀的必然性、其根植于一种可替代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不可能性、具体解释的物化结果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这三个断言中的任何一个,被我们所发现的证据反驳,那么我们批驳全球化理论的全部努力将归于失败。

反之,如果它们都得到证明,则我们就可以作出下列预言。越是不遗余力、系统地追求作为一种解释的全球化理论,其内在的问题就越是具有明显性和断裂性。最后,这种愿望的知识代价证明是如此高昂,以至于必定要出现以下两种结果中的一种:要么,全球化理论的断言将不言而喻地从其自身争论的进程中撤退(在经过一系列维护行动趋于失败后),这就是我们试图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需要指出的细节;要么,那些断言将从一开始起就成为如此强烈的知识上模棱两可的东西,以至于作者必将防止他们自己(也许是明智地)自由发挥。然而,后一种策略的结果(在让·阿尔特·肖尔特的例子中就显示出来了)就是,不可能出现清楚的、明确的论点。由于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断言必然以某种摇摇欲坠的形式出现,这种知识上的模棱两可与建筑上的荒谬极为相似。

如果全球化理论必然具有混淆视听的性质,我们又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将其作为学术评论的主题呢?为什么不简单地等着它自行倒塌呢?答案是双方面的。首先,我们的怀疑和预测在这一阶段仅仅是怀疑和预测,它们还没有得到证实。其次,全球化理论的当前流行式样并非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如果认真对待的话,它所作的断言混合着一种理论对另一种的否决,这将成为理解普遍意义上的当代世界和特殊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的有利资源。在我们进入下一章之前,我们将停下来看一看这种否决包含着什么。

它似乎有三个主要要素。其一,在全球化理论代表着决定性地超越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古典作家想像范围的当代世界时,这一理论在事实上又抛弃了确切理解极为重要的时空理论的关键资源。一旦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丰富的解释范畴中脱离出来,这些现象自身就转换成一种不能复归的原由——就会出现把这些古典作家早已问题化、非神秘化的东西重新自然化的现象。这一进程的一个中心特征是针对空间范畴的系统崇拜,这是潜伏在“全球化”中的可能性,但是空间又只是在它被用来在社会解释结构中扮演角色时才有活力。这又反过来带来社会科学解释性断言缩小的悖论。对于现代性的最深层次的经典质疑——最戏剧性、最反直觉的发现都是由此发现的——现在正被重新封锁起来,这归因于那些业已过时的社会解释的具体化,它们在新的科技语言的帮助下获得了进步性的再生。

其次,由于把普遍的社会关系和这些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合并在一起,即漫画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化理论错误地理解了国际关系这种行将过时的形式的进一步演进。在这方面,现存国际关系理论远没有取得进展,它只是简单地放弃了这一领域,而且不幸地再次制造了自由理想主义的许多谬误,因

而在某些特殊的分野上加入了现实正统主义长时间维持的阵营。当其出现之时,“现实主义者”的反应将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理论的毁坏因素,正如它们在反击传统动向的地缘政治学时所做的那样,使后者的领域难以构成理论。

最后,作为社会学思潮和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今的会聚点,全球化理论成为这一领域中最大的迫切需要之物——一种真正的国际体系的社会理论——的最近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具断裂性的障碍。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不再是只事关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事物(如果它曾经是),尽管它起源于社会学,关注国际进程,但全球化理论既不偏袒前者,又不维护后者。

就其自身而言,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与作为“社会理论中心主题”的方法背道而驰的。但是,考虑到这一论题在公众讨论中所承担的模棱两可的角色,我们就必须对其进行更积极、更富有批判性的诊断。这就是本书试图提供的内容。

## 注 释

-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剑桥1990年版,第52页。
- ② 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逃逸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一书中,伦敦1999年版。
- ③ 1997年10月26日。
- ④ M·奥尔布罗:《全球化时代》(The Global Age),剑桥1996年版,第4页。
- ⑤ M·费瑟斯通、S·拉希:“全球化、现代化和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化概述”(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载M·费瑟斯通、S·拉希和R·罗伯逊编:《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伦敦1995年版,第1页。

- ⑥ Z·鲍曼：《全球化：人类的结果》（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s），伦敦1998年版，第15页。
- ⑦ 同上，第12和15页。
- ⑧ 同注释5，第1页。
- ⑨ 沃特斯：《全球化》（Globalization），伦敦1995年版，第1页。
- ⑩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64页。
- ⑪ 比如，可参见他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Grundrisse）的“导言”中对“劳动”范畴的讨论，M·尼古拉斯翻译，哈蒙德沃斯1973年版，第103页。
- ⑫ A·胡格维尔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世界：发展的新政治经济》（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巴辛斯托克1997年版，第121页。这一断言是在对吉登斯的作品特别是《现代性的后果》的简短讨论的结尾处出现的。
- ⑬ 刘易斯·芒福德关于“没有两种文化是生活在相同种类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的观察，在1934年动笔时就毫无争议[参见他的《技术与文化》（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伦敦1934年版，第18页]。自此之后，该观点又不断为人类学和其他研究的成果所充实。其中一些著名的有E·埃文斯-普里查德的“鲁尔的时间计算”（‘Nuer Time-Reckoning’，载《非洲》1939年第12期），保罗·博安南的“尼日利亚提夫族的时间概念”（‘Concepts of Time Among the Tiv of Nigeria’，载《人类学的西南杂志》，1953年第9卷，第251~262页），皮埃尔·鲍迪埃的“阿尔及利亚农民对时间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 Time’，载S·皮特-里弗斯：《地中海的乡人：有关地中海的社会人类学论文》（Mediterranean Countrymen：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Mediterranean），巴黎1963年版]，马克·布洛赫的“现在的过去和现在”（‘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载《人类》1977年第12卷，第278~292页），克里福德·格尔茨的“巴厘的人、时间和行为”[‘Person，Time and Conduct in Bali’，1963年版，再版于他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伦

敦 1993 年版] 雅克·勒高夫的《中世纪的时间、工作和文化》(‘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芝加哥 1980 年版), 等等。

详细的跨文化时间研究包括: A·埃文尼:《时间的帝国: 日历、钟表和文化》(Empires of Time: Calendars, Clocks and Cultures), 伦敦 1990 年版; J·T·弗雷泽:《时间的声音: 人们对作为科学和人性之表达的时间观念的协力考察》(The Voices of Time: A Cooperative Survey of Man's Views of Time as Expressed by the Sciences and by the Humanities), 伦敦 1968 年版; G·J·惠特罗:《历史中的时间: 从史前到现代的时间观念》(Time in History: Views of Ti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 牛津 1988 年版。

来自不同学科的对这一问题的贡献有: 罗伯特·大卫·萨克的《社会思潮中的空间概念: 一种地理远景》(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伦敦 1980 年版, 以及他的《人类的领土性: 理论和历史》(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剑桥 1986 年版; 伦纳德·戈尔茨坦:《线性前景的社会和文化根源》(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Linear Perspective), 明尼阿波利斯 1988 年版; 亨利·鲁茨编:《时间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ime), 华盛顿 1992 年版; J·哈萨德主编:《时间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ime), 伦敦 1990 年版; 大卫·伍德沃德的制图学研究[比如, 他的“中世纪地图的现实、象征、时间和空间”(Reality, Symbolism, Time, and Space in Medieval World Maps), 载《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年鉴》, 1985 年第 75 卷], 等等。

- ⑭ 比如, 对于古代中国文明不知道传统上独指现代西方的前进的、非线性的时间概念的观念, 李约瑟就提出过质疑, 或无论如何加以斟酌过。参见他的《大滴定法: 东方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中的“时间与东方人”(Time and Eastern Man) 一文, 伦敦 1969 年版。
- ⑮ 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作品外, 研究某一地区历史进程中时间与其他社会形式的相互关系的作品还有 E. P·汤普森的“时间、工

- 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载《过去与现在》,1967年第38期[再版于《乡规民俗》(Customs in Common),伦敦1991年版]。这一流派的最新作品还有M·弗兰奇·史密斯:“血腥的时间与血腥的匮乏:资本主义、权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间经验的转换”(Bloody Time and Bloody Scarcity: Capitalism, Author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mporal Experience in a Papua New Guinea Village),载《美国种族学家》,1982年第9期,第503~518页。
- ①⑥ 参见B·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传播的反思》(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伦敦1991年第2版。
- ①⑦ N·普兰查斯:《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State, Power, Socialism),伦敦1978年版,特别是第四章。
- ①⑧ 萨克:《人类的领土性:理论和历史》,第223页。
- ①⑨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二幕第四场。
- ②⑩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牛津1959年版。为了将米尔斯的论证与国际关系理论直接联系,可参见J·罗森伯格:“国际关系的想像:国际关系理论和古典社会分析”(The International Imagination: IR Theory and Classic Social Analysis),载《千年》,1994年第23期。
- ②⑪ J·A·肖尔特:“全球化:范式转换的前景”(Globalization: Prospects for a Paradigm Shift),载M·肖:《政治学与全球化》(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伦敦1999年版,第18页。
- ②⑫ 沃特斯:《全球化》,第27页。
- ②⑬ 同上,第28页。
- ②⑭ 对这些作品的总的看法,可参见I·克拉克著:《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理论》(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牛津1999年版。
- ②⑮ 詹姆士·罗西瑙,转引自沃特斯:《全球化》,第30页。
- ②⑯ 剑桥1993年版。
- ②⑰ Z·鲍曼:《后现代的亲密关系》(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伦

敦 1992 年版,第 59 ~ 65 页。

# 第一章 肖尔特的谬误

## 导 言

让·阿尔特·肖尔特在《全球化：一个批判的引论》的序言中写道：“我希望对莽撞的抱负的追求，能产生一个可争议的论点。”<sup>①</sup>但是，肖尔特决非莽撞。尽管我们可以肯定，他对“超领土性”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却应当看到它还是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因为他试图清晰而精确地阐述有关全球化的一个论点。更准确地说，从某些方面看，肖尔特是一位最严肃的全球化理论家。他并不宣称一切事物在一夜之间的全盘转变，相反他注意到了新生的全球化力量与顽固的旧世界之间的“微妙的相互作用”，而这个旧世界有可能加入了，也有可能没有加入到转变之中。他用大量的数据文献证明了这些力量存在的现实，但他又提出了同样富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来降低其重要性。若是别人，就会建立起滔滔不绝、意义深远的理论了；而他却精心地使其理论锋芒有所收敛。因此，“全球化已淘汰方法论上的领土主义，并要求我们反思社会理论”。然而，全球化同时“并未显示出多少迹象，以终止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的资本主义、治理的官僚主义、组织的社团主义、知识的理性主义”。<sup>②</sup>我们很少见

到有作者在其理论演绎中对其大胆的理论观点作出如此严密的经验主义限制。

本章的标题所指的正是他著作中的这种特色。就好像 19 世纪热情的建筑师们富有想像的建筑仍然点缀着田园风光一样,肖尔特的全球化理论也必然要成为一道残缺的风景。无论何时,他敏锐的判断总是一再提醒他,他的理论建筑之墙垣不管高低,都不能过于完整;为了不至于引起误解,其理论基础的地砖应当铺得错落有致、参差不齐;即使是其支撑着其他的部分论点并使其独具特色的定义之塔,也染上了摇摇欲坠的风格。

为了研究这种参差而壮观的谬误,我们只需翻到该书的第八页和第九页,在这里作者以表格的形式清晰地列举了八个命题和六个推论。“但是”、“尽管”以及诸多的修饰性连词表明,作者精心设计了一种开放的结构。全球化是一种转型,但是它是增强而非取代已有的社会现象。“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它已初具形态——尽管在此以前它“就已经出现了”。现在看来全球化已势不可挡,但是它并不是非要以这种方式进行不可,尽管它放慢发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看来还微乎其微”。如此种种。很明显,这并非莽撞的推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论点。

从美学观点看来,建筑学上的谬误,若能很好地执行,尽管有其刻意的不完整性,还是能获得真正的艺术效果的。但这一规律对于思想来说还能成立吗?以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论点能逃避批评吗?全球化的论点还能以其他方式合乎逻辑地建构起来吗?这些就是我们针对肖尔特的谬误提出的问题。

以下就是我们的回答。首先,很有必要对全球化的定义表明其谬误性的特征。如果这种定义不能揭示出其他概念所不能解释的论点,那么它就不能对社会科学作出任何贡献。如果它越是往这一方面努力区分,并将其分析性地提炼为一种纯空间的范畴,它就越不能从经验的角度解释其试图解释的东西。这

个问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过去的空间概念,而这对于全球化理论来说又具有本质性的特征。

然而,这种定义上的困境仍不能与其庞大而不合理的历史假设相提并论,而这种假设对于表现全球化影响的倡导者来说又是必需的。为了使跨国关系的当代传播获得其决定性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跨边界”特征超越了业已存在的国际体系的某些基本秩序原则。其次,充满悖论的是,这使得全球化理论家将他们过去已有的模式赋予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传统现实主义观念。该模式的确描绘了主权政治单位构成的世界,并坚持领土空间的绝对不可侵犯的司法权。相形之下,全球化理论所确认的跨边界流动看起来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也的确建立在对特定空间发展的思考之上,肖尔特称之为超领土空间的兴起。

然而,即使在此处,因为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种谬误也只得强调自身的意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得以存在的时间明显是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因此18世纪末英国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将这个过程一分为二。这一事件产生了两个后果,这些后果都与全球化的历史性定义上的闪烁其词截然相反,我们从其分析性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导致了一种重要的超领土关系的传播——而这一过程正好发生在威斯特伐利亚时代领土关系的时间中心点上。另一方面,它导致了政治性质的转变,其结果是超领土关系能够而且的确在继续扩张,但这种扩张却与主权的领土性完全相安无事(不管它们可能使政治权力的运用多么的复杂化)。

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中见不到这两个后果中的任何一个,这就暗示着领土性的地缘政治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延续性。然而,这两个后果都从经验层面上不可避免地使全球化理论扑朔迷离。这种本不存在的超领土关系迫使肖尔特声

称“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才开始改变世界的全球化力量在威斯特伐利亚中就已“初露端倪”,而这些力量对该体系的否定在后来被解释为一种表现。相应的主权性质的转变——马克思称之为“政治国家的分离”——之后才随之发生,肖尔特只能将其称为难以言喻的经验后果:当今的全球化莫名其妙地未能产生真正的划时代效应——而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视角来看,这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肖尔特在书中多次称赞马克思的“先见之明”,因为他“预见”了全球化的兴起。然而,马克思无需这种先见之明。全球化理论家们耿耿于怀的社会关系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最晚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其作出了社会学的解释。若能将这种解释运用于当今的国际体系研究,全球化理论的谬误就不攻自破了。

## 定义的成就

我们在本书的导言中说过,为了使全球化的概念起到作为解释项的作用,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为了不至于太虚无缥缈,就必须以非循环的方式来定义它,也就是避免“全球化就是当今遍及全球的一个过程”<sup>③</sup>之类的公式。另一方面,为了不至于使这个概念变成被解释项,那么它试图解释的现象就必须具有其他已有的概念所没有解释的现实特征。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鉴于该术语的空间性特征,全球化理论最终只能通过特定的空间现象寻求解释机制。最后,我们注意到,这样做反过来必定合乎逻辑地要求(但不一定能得到)将空间作为解释的起点。

这就是肖尔特的逻辑推论,因而正好导致了上述的结果。他认识到了有必要澄清一场混乱的争论,所以一开始就摒弃了

上述循环式的定义,并提出了全球化概念的五种可能意义: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西方化/现代化(Westernization/modernization)和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sup>④</sup>“全球化”可以用来描述以上所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很多由来已久,因而无须引入一个新的术语。更重要的是,如果全球化仅仅是,例如自由化,那么它就可以从“自由”贸易的概念中得到解释(它应当是一个解释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前四个可能的意义都被称为是“多余的”,因为它们都不能成为一个充分定义的基础。只有最后一个——“非领土化”——才能提供这个基础。因此,从肖尔特看来,只有它指出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具有真正的因果意义,又不能被简化成其他概念,因而使用该术语具有独特的优势。

这个推论在某些方面是站不住脚的。一般认为概念必须反映现实世界的对象以证明其解释的地位。但是在此时,这个假设却严重地依赖于语言的使用:“当新的词汇得以普及时,常常是因为它准确地理解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sup>⑤</sup>诚然,此后这种推论也未能给主权概念以任何的(即使是模棱两可的)支持:“对主权的一贯的修辞学用法与连续的主权的真实内涵完全不同。”<sup>⑥</sup>但这也无所谓,因为我们首先已获得了某些基础:在经过了消除这个概念的重要内涵的描述后,就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定义:“全球化指的是社会空间性质的深刻变化。”<sup>⑦</sup>

现在为了使这个概念获得真正的解释能力,空间的意义必须在社会解释的框架中被提升到(或被重新发现)一个更高的层次。只有在此时,空间性质的“深刻变化”才能对整个社会再生产具有“深刻的意义”。肖尔特对此非常清楚,因为他下一步就是试图加强空间角色定义的意义。那么,他又是如何继续的呢?

此时,我们尤其应当记住正在进行的是一个谬误的建构,这

个论点的基础是以一种令人奇怪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应当提出某种论点来支持即将进行的推论;另一方面,肖尔特太过于谨慎而未能赋予空间以完全分析性的优先考虑,但这样做却是全球化理论所必需的。因此,在他的《全球化:一个批判的引论》一书第46页由七句话构成的一段文字中,他总体上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重点的强调与严密的限制几乎在每一句话中都交替出现。空间是“社会生活中关键的决定因素”,但是这一地位又是与一系列其他“主要的维度”所共享的,其中包括“文化、经济、政治和心理”。只有这样做才能“滴水不漏”。空间现象“强烈地影响其他的维度”,但是“反之亦然”。在这一段中间,我们似乎要见到完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了,因为“沙漠游牧民、山村居民和海岛居民的生活差异主要归结于他们居住环境的空间差异”。然而,这很快又被强调地理因素与其他“主要维度”之间的“相互建构”的关系所限制。最后一句话又使得以前的讨论具有了正面的效果:“如果社会空间的性质发生变化,那么其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都可能随之改变。”

作为基石,这样的前提似乎很难支撑沉重的解释性论点。幸运的是,并不是非要如此,因为作者又恰如其分地告诉我们,不管其意义多么深刻,全球化事实上并未给社会生活的其他主要因素带来“深层的转变”<sup>⑧</sup>。如此面面俱到,这总算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论点。以下的推理又将如何进行呢?

将空间的总体意义问题撇在一边,肖尔特准备集中讨论全球化所包含的社会空间性质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一言以蔽之,全球化造成了“领土主义”(territorialism)的终结。领土主义指的是社会地理学,其中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能“在地球表面上标示出来,并以长、宽、高构成的三维架构来测量”<sup>⑨</sup>。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空间”位置不能在这个架构中得以确认(即使它们不是静止的);任何一个位置都与其他位置以绝

对距离分隔开来(不管距离是多少或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任何一条线都能将一片空间与其他周围的空间区分开来。诚然,领土主义“意味着宏观社会空间的总体建构”是以空间单元组织起来的,而空间单元又受到位置、距离和分隔等三个领土规律的支配。其结果是,因为受着同样的规律支配,这些空间单元之中或之间的任何关系都能被恰当地描述为“领土间的”。“直到最近”,肖尔特陡然以一种迫不及待的语气将这些观点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全世界的社会地理都具有领土性特征”。在这一点上,一种强烈的解释性意义再次锋芒毕露,尽管在早先对空间的讨论中还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此时,谬误已经具有了完全的形态。

我们很快就了解个中原因了。按照这种建构,肖尔特就能以前所未有的准确性来定义“全球”现象和“全球”关系了。他请我们注意“电话、电子货币和臭氧层空洞”等现象。前两者具有真正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是社会相互作用的媒介。关键是以往所有的“时空压缩”浪潮减少了(通过加速的通讯交流)位置、距离和分隔规律的影响,但并未完全颠覆这些规律。但是,对于电话和计算机通讯来说,空间距离不仅仅是减少的意义,空间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它们是“超越领土性的”(supra-territorial)。“全球同时性”(transworld simultaneity)<sup>⑩</sup>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允许(某些)社会关系在领土空间规律之外进行运作。与曼纽尔·卡斯特尔斯一样,肖尔特争辩道:一种新的“流动空间”正在与旧的“位置空间”结伴而行。

然而,为什么要将这些超领土性的相互作用称为“全球的”呢?最明显的答案是:“全球的”这一概念现在能用来准确地限制无限扩张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这种扩张性称为“全球的”。在地球这个行星上使社会空间具有现实同时性的技术若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无能为力了。“无线电信号若要跨越星际或

更长距离 时间将再次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全球的”关系指的就是在地球空间内及其轨道通讯卫星范围内不再受位置、距离和分隔规律之影响的关系。肖尔特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术语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们不得不钦佩这种定义的成就。肖尔特选择了当今学术界和其他领域中最具弹性的一个术语,并以无懈可击的精确性限定了它的内涵。事实上,它是如此精确以至于要避免被指责为极端的技术决定论时,肖尔特自己随后立刻放松了对它的限制,真可谓是独具匠心。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哪些社会关系具有了新的性质以及产生了什么效果。

在进行全球活动的考察之前,肖尔特再次强调了他苦心孤诣的精确性。全球化可以理解为超领土性的兴起,但“不是国际化、自由化、普世化或现代化中的任何一种”<sup>①</sup>。当然,“无一例外地”对全球化的质疑都来自于未能将它与其他四种现象区分开来。

此后,读者注定要感受震撼了。因为在对全球活动进行考察之际,这个受到严格限制的定义一旦运用,却成了确确实实的点石成金之笔了。所有的一切都开始闪烁着“全球性”光芒——核导弹、行业协会联盟,还有远程试管婴儿。喷气式飞机也被想方设法地列在了“超领土性联系”的名册之上。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都是“命名不准确”——它们应当是“全球公司”,它们的活动也被称为是“超领土性的”,即使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运输和跨边界运动的成本——具有领土性特征,尽管当地的劳动力、法规和税收成本不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如此等等)都摇身一变成了“全球组织”,因为它们“超越了全球范围”。(而就在前一页,这种特点被限定为“普遍的”,而决非“全球的”。“普遍性指的是领土范围,而全球性指的是时空关系”。)一个跨国银行向多米尼

加共和国的一个贷款者支出美元,事实上这是在以一种“全球货币”进行“全球银行信贷”,这简直就是说货币也正尽力地符合“超领土性”的定义。肖尔特对货币所作出的最强的辩护就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当然不是完全地)从领土空间中分离出来”。诚然,如此游刃有余的论点足以承认所有的一切都“至少部分地显示出全球特性”。形形色色的环境问题被纳入这个范畴之中,是因为“没有一个是局限在领土之内的”。<sup>⑫</sup>

这样,因为“多余”而被逐一抛弃的全球化的另外四种定义又转身回到了这个概念之中,我们当然能理解其原因。毕竟,到底有多少现象——远程通讯除外——能真正地满足严格的全球化定义呢?即使对于远程通讯来说,若没有一个参照系,即不考虑人类利用这些新的媒介进行活动的社会特性(非空间定义的),又能从其“领土性”的简单事实中真正推导出多少因果必然性呢?那么,作为严格的非领土化定义,总体上的全球化理论又具有多少“深远”的现实意义呢?是分析的准确性还是真正的经验价值?——这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该书随后的第267页中,若作者选择了经验价值,谁又能指责他呢?但作为该书的核心部分,其理论建构无疑会受到这种指责。

既然其定义再次有所放松,那么对于全球化又能作出什么确定的解释呢?解释的框架又如何建构呢?答案是作出宽泛的历史性解释。最重要的是,这种框架就是以国际关系的主题和学术规范的思想程序作为隐含的参照系。

## 何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注意到,国际关系的主题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目的,因为该学科必须将世界体系作为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目标。它在这一领域中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还值得商榷,

关键是它位于通向全球化理论之路上,而后者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回应。对肖尔特来说,这种遭遇是间接而非直接的,也许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反向行进的队伍之中。“作为时代特征”,肖尔特说,“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是国际关系的教师,而当我完成这本书时,又已身处全球化和区域化研究中心了。”<sup>13</sup>遭遇是明显的,但是这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呢?

在较早时候发表的版本中,这一章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更明显。在那里,肖尔特公开争辩说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作为社会分析形式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领土主义的假设是“‘国家间的’(inter-national)概念的本质属性”。全球化的影响为“社会分析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他将其称为“世界体系的方法论”转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以一种形式的领土主义取代另一种形式的领土主义”。他的意思是在分析中应当将现实构想为“空间的相互关系”,而空间本身则可看做是“‘世界’空间相互联系的维度”,而不是预先假设的“任何特定空间框架”的分析重点。在这种语境中,“抛弃‘国际’的概念而使用‘世界’的概念就能反映出整体的方法论转向”。<sup>14</sup>

在该书中,国际关系的有关参考书目几乎被全部剔除,而有关国际性质本身的历史断言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与其他批判性地接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理论一样,这些断言都集中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冤大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同时也标志着自新教改革后宗教战争的结束。<sup>15</sup>该和约强调了德意志诸侯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特权以及世俗统治者共同反对天主教干涉的权力,它标志着等级秩序和“超国家”原则的严重衰落,而这些原则居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地缘政治

组织中心。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直到法国大革命战争和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它一直保持着作为欧洲地缘政治中的规则制定者和领土争端调解者的角色。

然而,对国际关系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还有国际法和政治理论)而言,它的偶像性意义<sup>⑩</sup>远远超过了任何历史文件,而且它详尽繁杂的法律和领土条款仍然有可能被继续援用<sup>⑪</sup>。从20世纪由边界和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回溯过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主权原则(不管其形态是多么原始或在其实行过程中是多么不平等)开始作为欧洲国家体系的组织原则而得到明显的加强,而且这一原则也扩展到整个世界。从这一点来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可视为地缘政治现代性的原始起点。因此,由具有合法主权的独立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常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这种提法已受到了严厉的指责。有人认为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中世纪的传统遗风尚存,还有人争辩说早期的主权概念与后来成为当今世界特征的资本主义主权形态有根本的不同。<sup>⑫</sup>一方面,在国际关系领域“传统”的理论家当中形成了这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观念(对他们而言,最广泛意义上的“结构上分离”的主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实);另一方面,就是由全球化理论家所构想的主权观念。

例如,在一篇题为《全球化和旧秩序的终结》的文章中,大卫·赫尔德和安东尼·麦格鲁将全球化相互交错重叠的领土特性确定为对“根据主权和排他性固定领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构成了独特的挑战”,他们宣称这种挑战已促成了“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形成”。同时他们(表述了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消失,国际体系的本身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确信“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地缘政治的力量将逐渐被社会化,从而进入民主的机构和传统之中”。<sup>⑬</sup>在《全球大

变革》中 赫尔德与其合作者继而列举出“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七点详细方案,以作为衡量全球化转变的水准基点。<sup>①</sup>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不是历史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奠定了地缘政治的整体形态,而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事实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性质,直到全球化的新兴力量促成了戏剧性的转变。

对肖尔特来说,情况亦是如此。尽管他们不会非常自信地将这个“谬误”延伸到将来,但是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阵营中,赫尔德等人愿意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让步,并对同样的历史假设深信不疑。“毕竟”,他说,“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肇始于17世纪,并在20世纪中叶遍布全世界,其本质就是领土主义的模式。”<sup>②</sup>尽管如此,只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存在,尽管“方法论上的领土主义”已成为理解当今世界的最大障碍,它还是“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广泛可行的思想捷径”。这种观点就转换成了随之而来的关于知识和社会的更广泛的论点,这反过来又与前文中提到的语言的使用发生了联系。前威斯特伐利亚观念是非领土主义的,因为社会生活并不是以领土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一千多年前的学术研究(原文如此——原注)没有任何一种提到了一个有限的领土空间”。在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方法论上的领土主义在思想上还是合理的,因为它真正地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只是到了今天,由于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侵蚀了这些条件,才使我们有必要“作出另一种选择,即描绘社会生活的非领土主义图景”。

这样做真的可行吗?如果说从17世纪中叶开始就存在一种“本质的领土主义”的国际体系,那么无论是从经验或是理论的基础来看,这种观点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

让我们以加拉格和罗宾逊1953年的著名论文《自由贸易中的资本主义》<sup>③</sup>为例加以说明。他们论点的核心内容就是致

力于解释。如果使用肖尔特的领土主义方法,为什么大英帝国从19世纪早期开始就难觅其踪影,更别说解释了。他写道:“如果将帝国主义的历史纯粹定义为在地图上用红色标出的殖民地的话,那么很明显情况并非如此”,这种方法就如同“只从露出水面的部分来判断冰山的形状和性质”。他们声称一种新的国际力量——一种并没有在政治地图上显示出来的“非形式的帝国”——正在发生作用。例如,阿根廷就被整合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但没有任何领土主义的描述可以揭示这种整合的过程。的确,在加拉格尔和罗宾逊的叙述中,不仅这种非领土主义的帝国在英国的国际力量中比相应的殖民帝国可能具有更大的物质价值——但人们当时只对殖民帝国的庞大领土疆域感到目瞪口呆——而且除了印度和南非等几个重要的殖民地以外,英国政府随后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一致偏好非领土主义的而不是领土主义的扩张方式:“英国政府扩张政策的原则是:只要可能,就采取无形的控制,如果必要,则采用有形的控制。”<sup>23</sup>

后来,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对美国海外扩张的性质也作了非常相似的论述,尽管这么做的远不止他一个人。“美国帝国主义的隐秘性”,他写道,首先应归结于“它的非领土特性”;其次,这种特性又由于它通过形式上“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合法性而得到加强。<sup>24</sup>

然而,这些现象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全球化的超领土特性相吻合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英国的个案中来,衡量它最早的物质联系纽带——棉花王国——与领土主义的位置、距离和分隔规律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确定19世纪早期棉花工业的空间位置呢?我们当然可以指出非洲的劳动力资源,而这些劳动力又被输送到美国南部的原料生产地。我们可以看到棉制品在欧洲国家——随后更重要的是在印度和其他地区——

的销售和分配情况。或者,我们还可以见到兰开夏郡的工厂:在那里,来自周围乡村的数目庞大的雇佣工人在生产棉织品。<sup>⑤</sup>然而,如果像领土主义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可以在地图上标示出来,或者像肖尔特所坚持的“在此阶段,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活动几乎完全是在领土空间的范围内运作”<sup>⑥</sup>的话,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我们如何在地图上标出棉花王国的位置呢?我们不能只简单地选出一个地点,例如,兰开夏郡,这样我们就见不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了。我们也不能只选出四五个地点来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地点没有一个能脱离其他地点而单独存在。

再回到这一点上,如果不能确定它与这些地点在劳动分工中的有机联系,我们就无从描述19世纪早期的棉花工业。它现实的(实际上也是惟一的)存在在于它和社会与生态的关系之中,通过这种关系,无数人在不同的地点之内跨越了空间上的遥远距离而相互联系,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将这种关系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如果要对其作出空间的描述,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唐纳德·洛提出的在18世纪末出现的“政治经济的新空间”<sup>⑦</sup>——这种空间不是以领土,而是以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来定义的。这种新空间的超距离特性不在于交流的速度,而在于以物的“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人类相互关系所具有的社会属性。

然而,如果工业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这种意义上的超领土性,那么后者的两个标志性特色,即全球的同时性和严格定义的“超越边界性”又将如何定义呢?对于全球的同时性,我们不应当将这种现象仅仅简化为交流的速度问题,因为从因果关系来说,兰开夏郡工厂的活动时刻都以美国(或其他地区)农场的持续和同时存在为假设基础,而对商船横渡大西洋的时间不加考虑,反之亦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他所描述

的“全球同时性”的空洞隐喻中争辩说：新世界的奴隶制已成为几千英里以外英格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sup>②</sup>。至于全球关系中的“超越边界性”因素，非常清楚的是：政治边界既没有在“政治经济的新空间”中显现出来，也没有对“棉花王国”的运作造成“不可逾越的限制”。<sup>③</sup>无论如何，就连肖尔特自己一贯的结论都是：第三个因素未能与其他两个因素享有同样的定义标准，因为，很多“国内”的活动同时也“表现出超领土特性”，因此，即使它们没有跨越边界，也值得用“全球化”来形容。

鉴于以上的讨论，我们也许能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发明水力纺纱机的伟大的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并没有发明通讯卫星<sup>④</sup>，但另一方面，通讯卫星也并未开创出超领土空间。我们有一定的经验证据可以假设，超领土性并非是作为20世纪后期科技进步的结果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的。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如果认为通讯卫星出现的背后最终是社会关系，这种假设会不会太过分呢？

然而，在这里也必须指出一个更为广泛、更具有理论性的观点。对于某些激进的全球化理论来说，这些超国家属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造成了民族—国家和国家体系的最终危机。这个主题并不新颖。理查德·科布登在1846年谈到自由贸易时就说过：“我相信，如果我们被允许在这个亚月球场景中再现人类生活，我们将会看到在遥远的将来，这个世界的统治体系将变成某种形式的市政体系。”<sup>⑤</sup>然而，对肖尔特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对他来说，全球化“并未显示出任何削弱民族国家的迹象”，这并不只是因为它“从20世纪60年代才显现出来”，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充分发挥其效果。他在前文中就已慎重其事地告诉过我们：尽管全球化可以定义为超领土空间的兴起，但它“并不是与领土性势不两立的”。然而，它已经“超越了主权假定的领土主义的地理学”，其结果必将导致“主权的终结”。<sup>⑥</sup>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见的,这件事意义重大:为时三百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在结束了。赫尔德的立场也大抵如此。全球化论战中的“转换主义者”(transformationalist)的观点也大多是这样。我们不能仅仅将这种显而易见的模棱两可归结于某位作者的犹豫不决。那么,我们又将作出何种解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发展前文中提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论点,以便用来解释这种明显的混乱将作为该谬误的必然特点而出现呢?

为了证明这种可能性,我们有必要略作回顾:在马克思看来,英国棉纺织业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生产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也不管这种新技术是如何史无前例。它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积累(或剥削)的有效方式的兴起,而这种方式也突破了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限制。更准确地说,它是两者兼而有之。所有这一切又是基于一种更深刻、更广泛和更长期的社会转型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而这种转型又只能在新兴产业中才开始显露其历史的潜能。

马克思曾多次试图总结这种转型的总体特征。其重要意义在于,他认为转型后产生的新型社会能从某些最根本的方面与以往所有的社会形态区分开来:“社会关系的形式”已经历了根本的转变,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联系形式彼此相关的,社会再生产也是通过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的。历史的模式已使人类社会能够通过亲缘关系、朝贡甚至是奴隶制等某种形式(良性或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被组织或重建。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的工人,不管他们的处境多么悲惨,总是彼此之间或者与雇主以及社会以某种不同的社会联系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社会联系形式就是“以物为中介的依附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独立性”<sup>③</sup>。

随着棉花王国的兴起而发展的美国奴隶制度目睹了社会转型过程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的不平衡性。马克思相信,正是他本人证明了这种不平衡性。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认为从某些

根本的方面来看,在中心区域出现的劳资关系的普及化,比在其他地理边缘产生强烈而残酷的“人身依附关系”更能代表未来的趋势。无论如何,他付出了思想上的巨大努力以便能总结出这种新型的人类关系的社会学含义。对于他认为的这个新世界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创造性的方面,即它的政治经济,马克思逐渐采取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批判的态度。但是,我们要谨记,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一种历史的转型,塞耶谨慎地将其称为“社会生活的初级形态”<sup>⑧</sup>。与其“经济学”一起,这种更广泛的意义包含了对现代国家主权形式的一个论点,而这个论点又揭示了全球化理论中主权问题的无限复杂性:它可能最终来自于现代社会形态中产生的“政治”范畴的不解之谜。

不管它还有其他何种含义,资本主义也像封建主义一样,是一种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如果要理解马克思对主权的分析,我们就必须从这一点开始。马克思宣称主权的歧义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占有的特殊历史形态。这种形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通过法律形式上平等的个体交换(最重要的是用劳动力换取工资)的契约关系而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在物质关系领域和在物的依附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独立性的表达方式。只要有足够数量的人因为没有其他可选择的生活方式,或由于环境的压力而被迫出卖其劳动力,而且只要购买这种劳动力的人能利用它来获取利润,即产品(他们所拥有的)价值包括超出了生产过程中的投资成本的剩余价值(通过销售实现),只要这些条件成立,那么资本主义特有的剩余价值占有方式就会形成。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远比这更深刻,但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即在剩余价值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他的观点因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被广泛地抛弃。然而,没有任何的争论和抛弃在实际上触及了以上的描述性观点。而这些观点就足够与通

过“人身依附关系”进行剩余价值占有的所有社会形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在其他社会中,对剩余价值占有的分化的权力,要么维系于亲缘结构中的位置(父亲、妻子、堂兄弟或长子),要么是“政治上”定义的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国王、贵族、农奴),要么是这两种分化形式的结合——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这些权力及其运用在马克思看来,都是“直接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对他人作为个体的物质上的剥夺是通过明确的分化的社会身份组织进行的,个体就是以这种身份(为社会交往的目的)出现的。

这种概括乍一看来过于笼统。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它并不是强调前资本主义世界(当然是具有无限的不同)的某些同质性,而是强调在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明显不是“直接社会性的”。相反,对他人的物质占有是通过对交换和消费的商品(劳动力和货币)的“私人所有制”来实现的。人身依附关系现实存在,但它是通过“物”(的交换)来调和的,它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形式。马克思认为这是理解“政治”在意义上所发生的根本变化的钥匙。<sup>⑤</sup>

只要一个社会是通过“直接社会性的”身份认同的分层(例如,通过人身依附关系)而组织起来的,那么对亲缘、财产等等的定义必然是“直接政治性的”<sup>⑥</sup>。因此,马克思争辩道,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没有任何的政治结构可以从国家的实际物质形态或国民生活的其他内容中分离出来”<sup>⑦</sup>。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于1843年得出结论:“政治国家的分离是一种现代的产物。”<sup>⑧</sup>

他的意思是,若没有政治制度本身的分化,主权国家的现代观念是不可想像的,而这种分化就是要求“旧社会的瓦解”和废除“市民社会的政治特性”。<sup>⑨</sup>换言之,就是围绕着平等的契约关系重新组织社会生活,这样就瓦解了法律和政治上不平等社会

秩序传统的依附关系,产生的后果就是重构“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

它解放了在封建社会的各种死胡同中分裂和碎化的政治精神。它聚集了政治精神中的分裂部分,将其从市民社会的混合物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作为共同的领域和国家的总体关注,这在理念上独立于市民生活的那些个别因素。<sup>⑩</sup>

在此,马克思的语言似乎是赞同一种现代的政治观念,并将其作为实际分离但又能以自身的方式加以理解的自足的领域,并独立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当然,这是他最不愿见到的状况。正如皇室的等级秩序和中世纪的庄园制度是成为该社会秩序特点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政治体现,这对于今天来说同样适用。现代国家抽象的主权形式将其公民作为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体,这是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典型特色的新型社会关系的体现:以物为中介的、在依附基础上的个人独立性。

但是,如果这就是实际所发生的,如果现代主权的兴起不仅涉及一个集权化政治机制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社会性的”角色中分离出来,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期望新型的“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任何(非政治化)跨边界的延伸会削弱国家的主权形式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出反面的结论呢?——即作为社会的一种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有可能跨越政治边界而对涉及的国家(主权的)领土性又毫无影响呢?<sup>⑪</sup>

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19世纪(更别说是今天)的国内和国家关系的理解就要求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提供的模式。为了正确理解前文中提到的棉纺织业,我们可能要使用“社会构成”这个概念,因为它不仅是以民族国家的空间来定义的,因而就已经包含了作为一种地理整体的国际关系之实际的

跨国范围,但这种构想不应当以地缘政治的分析为代价而获得。如果说跨国联系的重要性消解了国际关系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领土被这些关系所超越的国家,是如何被拉进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和冲突之中的。尼柯斯·普兰查斯在很久以前就精确地表述了这一模式:

社会构成是扩展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链接点,而社会构成又倾向于跨越民族国家边界;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标志,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从一开始就来自于民族国家本身,并将它带入了一种相互关系之中。<sup>⑫</sup>

从理论上来说,全球化理论对这种表述又有什么真正的新贡献呢?或者说它只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混乱,而究其原因又是对空间的过分强调而被迫采取的别扭的历史分期呢?这就是全球化理论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加批判的肯定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材料对我们在上一章结尾提出的假设作出一个初步的应用。在那里,我们认为将“全球化”作为一个解释项必定产生难以解释的知识上的困难。特别是,它要求“空间”概念的扩展,而这样既不能建立在社会理论的合理选择的“空间框架”基础之上,也不能阻止对它试图解释的社会现象的过分具体化。对此,我们认为,这样做要么一开始就使它在试图阐明观点时产生概念上的闪烁其词,要么是在最后心照不宣地偏离了中心主题。

对于肖尔特来说,前一个后果如此明显,以至于即使是一个表达风格不甚明确的作者也有可能用同样的闪烁其词来掩饰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肖尔特决意,要给全球化提出一个精确的分析性定义。因此,他力图解决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依稀可见。为这个概念寻求一个明确定义的最初需要迫使他

对其空间内涵情有独钟,并冠之以“超领土性”。一旦将这个因素单独分离出来,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转型产生影响的论点就依赖于将空间概念扩展为“社会生活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对于这种决定因素,他也只能作出某些牵强的论证,试图从理论上加强“空间”概念的短暂而闪烁其词的努力导致了随即在定义“全球性”时无限制的松懈。从此以后,任何一个独立的解释性概念都在实际上依赖于将空间概念间接地具体化: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都可以归结为位置、距离、分隔的地理规律的社会影响,以及它们由于通讯和运输速度的提高而产生的超验性特征。

所有这一切在国际理论层面上的最终结果就是认可当今流行的观念:即世界政治正经历着向后主权和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对于这个实际的特定目标,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首先,为了论证全球化是一个全新的进程并间接地促成了国际体系的根本转型,就有必要确立过去的一个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该进程对现代国际关系影响的痕迹已不复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实主义”观念就提供了这一模式。这种观念的核心就是以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地缘政治形态来定义国际关系,而不考虑跨国关系得以存在的社会“国内”<sup>③</sup>层面。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就是:尽管全球化理论以其对“方法论的领土主义”的理性超越而深感自豪,但对当今问题作出的解释性论点又迫使它对历史作出了底气不足的“领土主义”解读。

但这仅仅是开始。第二点,对压制过去跨国关系的长久影响的惩罚,就是全球化理论错误地确认了这些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对主权作出的历史社会学定义以及普兰查斯从中得出的国际体系概念,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跨国关系的扩张,这些关系也会随着物质的迅速增长和资本

主义的地理扩张而急剧地发展,我们也可以见到这一历史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节奏导致的定期的危机,以及主权国家体系在政治和结构上作出的调整。如果这一进程多少带有一点无政府状态性质的话,那它至少是集体的行动。这恰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帝国主义和世界大战、革命和冷战等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然而,这一切在肖尔特的全球化理论中都无足轻重。我们可以见到,这些跨国关系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不管其范围有多么广泛,也不会必然导致国际体系本身根本性质的转型。正如普兰查斯所言,尽管多少带有公式化的表述:“这些边疆……只有在资本和商品即将突破其范围时,才会成为民族国家领土的边疆。”<sup>④</sup>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正认为“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曾经(例如,在1900年以前)准确地描述了一种“本质的领土主义”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当然就会发现当今的“全球性”的统计数据多少有点差强人意。9亿条电话线、20亿台收音机、每年450万亿美元的外贸盈余、44■500家“跨国界”公司:“如此庞大的统计数据”,肖尔特在罗列了16条统计数据后说,“足以证明一个背离领土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的重要发展趋势。”<sup>⑤</sup>对此,我们不禁要提出相应的问题:既然统计数据如此具有说服力,为什么肖尔特本人著作中的结论却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呢?

第三,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如果肖尔特相信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神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对这些数据耿耿于怀。然而,如果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真如马克思和普兰查斯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令人误入歧途,那么这些统计数据的累计当然就不可能证明现实世界中的某种转型。肖尔特本人对这一不解之谜的阐释看来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一个极端就是定量解释——需要“更多的全球化”才能使领土空间最终变得无足轻重;另一个极端就是一种理论的限制:“全球化与领土主义

并非完全水火不容”<sup>46</sup>。对于他为什么认为“超领土性的兴起并未显示出导致领土性终结的任何迹象”，我们已经有了另一种解释。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显然证明了肖尔特将该理论的建构处于不完善的状态是明智之举，它也将为肖尔特谬误的不解之谜提供一种解答。

这样是否意味着时空分析对理解现代国际体系毫无作用呢？当然不是。大卫·哈维的《后现代状况》就为这种分析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榜样。这种分析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时空形式的历史特殊性，而且更具体地揭示了时空压缩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重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一体系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危机。

然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普兰查斯提出来的。在《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中，他着力对不同的“社会空间构成机制”的比较分析作出了意味深长的讨论。他坚持认为“这些机制所经历的历史性变化并不是一种内在属性的变体，因为它们不具备这种属性。”<sup>47</sup>即使如此，他还是赋予了空间性的不同历史建构以一定的解释性意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建构，他不仅证实了我们在前文中引用的一般特征，还具体讨论了政治现象。他相信，如果不以这种空间的新的社会建构为参照系，我们就不能解释这些政治现象。他争辩道：“种族屠杀是一种现代发明，并与民族国家的空间化密切相关”<sup>48</sup>——他还将这一点延伸到了对“集权主义基础”的空间分析。

但是，差异还是明显的。虽然他严厉地批评他的马克思主义同行们对“时空转型”只赋予了“边缘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为社会理论提出另一种时空分析方法。不同生产方式的空间趋势在他们的定义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解释项和被解释项的传统位置自然毫无动摇：“不管以何种方式讨论空间问题，我们都将认识到，空间模式随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

变,同时它们本身又受到空间的历史—社会占有和消费形式的制约。”<sup>⑩</sup>

## 注 释

- ① 肖尔特,《全球化:一个批判的引论》(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巴辛斯托克2000年版,序言第14页。
- ② 该引文分别出自上书第315页和第5页。
- ③ 阿切尔(Archer),引自肖尔特:《全球化:一个批判的引论》,第15页。
- ④ 同上,第15~16页。
- ⑤ 同上,第43页。
- ⑥ 同上,第137页。
- ⑦ 同上,第46页。
- ⑧ 同上,第5页。
- ⑨ 同上,第47页。
- ⑩ 同上,第49页。
- ⑪ 同上,第50页。
- ⑫ 本段引文均出自上书,第50~56页。
- ⑬ 同上,第14页。
- ⑭ 肖尔特:“全球化:范式转换的前景”,第9、20、19和21页。
- ⑮ 有关三十年战争的文献,尽管不是十分新颖,却可从T·拉布主编的《三十年战争:动机、范围和影响》(The Thirty Years War: Problems of Motive, Extent, and Effect,波士顿1964年版)中找到。C·V·维吉伍德的经典著作《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伦敦1938年版)仍然值得一读。
- ⑯ 利奥·格罗斯在1948年评价新起草的联合国宪章时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如既往,仍然是政治家心目中的标准文献。”参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1948)”(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648 - 1948),载《美国国际法杂志》1948年第42期,第21页。

- ⑰ 条约译文可从 G·西姆科克斯主编的《战争、外交和帝国主义文件选读(1618—1763)》(War,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 1618 - 1763 Selected Documents, 伦敦 1974 年版)中找到。
- ⑱ 举例可分别参见 S·克拉斯勒：“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他”(Westphalia and All That), 载于 J·戈尔茨坦和 R·基奥恩主编《观念和外交政策：信仰、制度和政治变迁》(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纽约 1993 年版)和 J·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批判》(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伦敦 1994 年版)第五章。
- ⑲ 《国际研究评论》第 24 期, 1998 年 12 月特刊, 第 220、221 和 242 页。更准确地说, 应当指出的是, 本文所引用的是该杂志的目录标题, 而文章的标题是：“旧秩序的终结？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前景”(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World Order)。这种“谬误”的现象看来是全球化理论所谓“转变主义者”学派的普遍特征。
- ⑳ D·赫尔德、A·麦格鲁、D·戈德布拉特、J·佩拉顿：《全球转换：政治、经济和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剑桥 1999 年版, 第 37 ~ 39 页。
- ㉑ 本段中所有的引用均出自肖尔特的《全球化：一个批判的引论》，第 57 页。
- ㉒ 再版于肖尔特主编：《英国与殖民地(1815—1865)》(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1815 - 1865), 伦敦 1970 年版。[原文发表于《经济史评论》1953 年系列二第 6 卷(1)。]
- ㉓ 同上, 第 142 和 159 页。
- ㉔ G·斯特德曼·琼斯：“美帝国主义史”(The History of US Imperialism), 载 R·布莱克本主编：《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性社会理论读本》(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伦敦 1972 年版, 第 209 和 212 页。
- ㉕ 有关这些讨论和数字, 参见 E·沃尔夫：《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伯克利 1982 年版, 第

- 九章 ;以及 E·J·霍布斯鲍姆 :《工业与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 哈蒙德沃斯 1968 年版 ,特别是第七章。
- ②⑥ 肖尔特 :《全球化 :一个批判的引论》,第 57 页。
- ②⑦ 《资产阶级感觉的历史》(History of Bourgeois Perception) ,布莱顿 1982 年版 ,第四章。
- ②⑧ K·马克思 :《资本论》(Capital) ,第 1 卷 ,B·福克斯译 ,哈蒙德沃斯 1976 年版 ,第 925 页。
- ②⑨ 肖尔特 :《全球化 :一个批判的引论》,第 59 页。
- ③⑩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他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发现 ,而只是“他人发现的最大的窃贼”。参见《资本论》第一卷 ,第 549 ~ 550 页。
- ③⑪ 参见 K·布恩 :《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外交政策 (1830—1902)》(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1830 - 1902) ,牛津 1970 年版 ,第 269 ~ 270 页。
- ③⑫ 本段有关肖尔特的引文分别出自《全球化 :一个批判的引论》第 143、74、60 和 136 页。
- ③⑬ D·塞耶编 :《卡尔·马克思读本》(Readings from Karl Marx) ,伦敦 1989 年版 ,第 62 页。在尼古拉斯对《1857—1858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译文中 ,相关的段落可从第 138 页中找到。
- ③⑭ D·塞耶 :《资本主义和现代性 :补说马克思和韦伯》(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 An Excursus on Marx and Weber) ,伦敦 1991 年版 ,第 56 页。塞耶继续写道 :“马克思所要论证的 ,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明确的现代社会形式的出现 ,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现代社会形式。”
- ③⑮ 有关以上观点的清晰而详尽的阐述 ,参见上书第二章。塞耶在早先的一篇杂志论文中给出了更完整的分析。参见“对政治学和政治经济的批判 :马克思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作品中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The Critique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 Capitalism ,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in Marx's Writings of the mid-1840s) ,载《社会学评论》1985 年第 33 卷(2)。
- ③⑯ 《卡尔·马克思读本》,第 123 页。
- ③⑰ 同上 ,第 116 页。为了寻求古典时期的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

意大利“政治的分离”的早期历史事例(因为这些与该论点相矛盾),可参见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批判》第三章。

- ③⑧ 《卡尔·马克思读本》,第 116 页。
- ③⑨ 同上,第 123 ~ 124 页。
- ④⑩ 同上,第 124 页。
- ④⑪ 有关这些观点的更完整的阐述,参见《市民社会的帝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批判》第五章。
- ④⑫ N·普兰查斯:《国家、权利、社会主义》(State, Power, Socialism),伦敦 1978 年版,第 95 页。
- ④⑬ 由赫尔德及其合著者提出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定义中,这七个因素中只有一个涉及了非国家的社会维度,即使是在为了确定其与地缘政治的法律上的断裂时也是如此:“跨边界的错误行为的责任只是与受影响者有关的‘私人事件’。”(《全球转换:政治、经济和文化》,第 38 页。)
- ④⑭ N·普兰查斯:《国家、权利、社会主义》,第 106 页。
- ④⑮ 肖尔特:《全球化:一个批判的引论》,第 58 页。
- ④⑯ 同上,第 60 页。
- ④⑰ N·普兰查斯:《国家、权利、社会主义》,第 100 页。
- ④⑱ 同上,第 106 页。
- ④⑲ 同上,第 99 页。

## 第二章 罗布·沃科尔：哲学的背景？

### 导 言

马克斯·韦伯曾经作了一个著名的比较：作为“挥向敌人之剑”的语言的使用方法与作为“翻耕沉思土壤的犁头”的语言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不同的。<sup>①</sup>因此在本章的开头作出声明是公正的：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很少有人能比罗布·沃科尔更好地“翻耕了沉思的土壤”。他对于问题的丰富的想像力、文本结构的广度和深度、理性判断的锋芒、不时显露的雄辩的文风——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述了堪称灵感涌现的严谨的学术风格。在他最重要的作品——《局内与局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以下简称《局内与局外》）一书中，这些特色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沃科尔惟一的关注就是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任何理论一样）都建立在哲学假设的基础上，而这些假设能够而且应当以各种方式提出问题，那么就应当毫无保留地肯定这部作品的成功。

然而，这并非他惟一的关注。如果沃科尔批判性的事业有明确主旨的话，那么它的标志就是在其文本的字里行间不断重复的“时空”概念。我们可以预见，对于这样一位作者来说，这

不仅仅是表面现象。尽管不断地反复限制修饰,并反复向读者强调任务的艰巨性,甚至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其深层的基础却是以一种可选择的世界观而奠定的。如果时间和空间的主题在国际关系领域已取得了持久的哲学成就,那么这至少可以部分地归结于沃科尔著作中隐晦而明白无误的中心论点。

尽管他本人并未明确提出论点,他的作品实际上为“全球化转变”理论起到了思想后盾的作用,而这些理论都是以平实的散文风格表述的。大卫·赫尔德及其合作者正是引用了沃科尔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观点的。“全球政治的观念”对国内/国际、局内/局外、领土/非领土政治的传统划分构成了挑战。<sup>②</sup>同样,吉里安·扬斯强调,在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构成“理论挑战”的最新文献中,“沃科尔的观点是该学科领域关键的重要进展中最深层次上的精华,并对其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sup>③</sup>。总之,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观点、后国际关系时代出现并因此取代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的思想框架——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来支撑有关主权和现代性讨论的历史—哲学理论,而沃科尔正是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

这一理论的参照系来之不易。作为一位理论家,沃科尔明确警告要禁得住人们对“夸大新奇之新奇”(to exaggerate the novelty of novelty)<sup>④</sup>的诱惑,他宣布在对国家主权的消解(以及对大部分新的社会运动的反思)的辩论中,双方都陷入了现代政治话语的圈套,而这种现代政治话语在将来“可能是最令人误解的指导原则”<sup>⑤</sup>。他本人很少对世界将如何转变作出论断,而只是将他的论点建立在“臆测”、“声明”和“普遍感觉”等意义基础之上。即使是将他自己的作品与“批判的国际关系理论”阵营结盟也是在七重的限定后才作出的。<sup>⑥</sup>全球化理论的思想框架本身就是在“晚期现代主义或后现代”<sup>⑦</sup>观念的基础上得以建构的。

并且，沃科尔反对轻率地提出任何全球化理论的观点，因为对他来说，“艰难”是学术严谨的标志。这不仅仅是因为时间加速的概念“难以解释”，或者说“对另一种可能性作出令人信服的叙述是众所周知的困难”，甚至是“要找出对民主的期望与正在出现的全球化权力结构之间的明显联系……特别困难”。毕竟，这些只是说明了一个总体的观点：“当代政治议程充满了格外困难的问题”。<sup>⑧</sup>真正的困难还在深层。如果说他本人写作的“指导原则”“除了在总体的层面上以外都是格外难以确定的”，这是因为这个原则实际上的“动机……就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以一种艰难的态度来探讨政治问题”。他认为“要割裂与笛卡尔坐标之间的联系格外困难”，而为了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国家主权，……那么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在第四章结尾严厉地警告说：“要求我们注意的正是这种艰巨性，而不是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华而不实的假设。”

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化理论与华而不实的假设也同气相连，因此这种对困难的崇拜使得在沃科尔及其崇拜者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话语的距离，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他被批判性地引证要多于被直接引用。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像沃科尔这样一位挑剔的顾客——他不遗余力地使这个学术团队复杂化，甚至还有出卖这个团队的嫌疑——在国际关系领域为全球化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呢？这看来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沃科尔整个作品核心的实质论点就是：领土性主权的世界反映了空间在现代现象中的特权角色，而现在这个角色受到了晚期或后现代的时间加速经验的挑战。因为他特别关注的就是揭示作为话语形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条件确定性，他也因此避免了提出具体的全球化理论的责任。不管其经验或理论

是否合适,他的目标足以表明这些观点能消解“空间想像的巨大权威”<sup>⑨</sup>。况且,不管他有多么挑剔或有意逃避责任,都不能掩盖这个事实: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在此(不管以何种形式)已经成为按照全球化理论所要求的方式解释社会现实的中心。无论如何,沃科尔通常的对声称、臆测和通俗表达的依赖偶尔也让位于完全的经验式肯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速度和时间加速的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边界正在明显地转变或变得不确定”。“国家和资本两者都参与了时空转换过程,而这一过程与国家主权原则表述的定则产生了根本的冲突。”民主斗争必须对“根本的时空关系的再阐述”作出回应。他甚至断言(尽管在这一点上,其语境还保留了回旋的余地):“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理解为已经过去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sup>⑩</sup>

第二,除了在总体上肯定了时空分析以外,沃科尔还在国际关系领域间接地提出了全球化理论特别的甚至是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领土国家现代政治建构的地平线”。既然如此,它们从总体上看也是“现代政治想像力限制的体现”。“对当代政治生活加速趋势的臆测”就不仅仅是臆测:作为“对这些限制的挑战……(它们)构成了我们在当代条件下重新检讨对政治的理解的重要因素”。<sup>⑪</sup>

即使是最谦卑的全球化理论家也能沐浴这种历史—哲学使命的反思性余辉——只要他们尽量避免提出他们自己臆测的理论框架,从而“作出超越我们现在处境的错误的叙述”<sup>⑫</sup>。最后一个要求可能算做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因为它“必定导致对统一性与多样性、自我与它者、空间与时间关系的根本质疑”<sup>⑬</sup>。

第三,幸运的是这已经“成为最新文献重要的共同主题”,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化理论话语之外的文献。这个正在出现的文献的慷慨的一长串名单包括有关“全球政治经济,特别是与国际资本和通讯技术的相互关系……对某些形式的社

会运动的探索……对‘地方性’与‘全球性’的重新估价”等等。<sup>④</sup>在脚注、参考书目以及其他地方，全球化理论界充满了这些名字：齐格蒙特·鲍曼、大卫·赫尔德、迈克·费瑟斯通、斯科特·拉希等。

此后我们可以见到沃科尔的著作与全球化理论之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只须略举稍许证据就足够了：有的人完全出于选择而赞同全球化，有的人则是被全球化的锋芒所征服，而有些人则是情不自禁。很明显，沃科尔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理论背景。尽管如此，事实还是明摆着的，既然强调了时空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战略地位和中心作用，并涉及到正在浮现的全球化学术辩论，沃科尔就将自己推向了这样一个位置：他最终注定要在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理论中扮演这种角色。这种背景能否成立呢？为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沃科的理论。

以下的讨论将分成四节。在前两节中，我们尽力较为详细地说明沃科尔理论的方法和实质，第三节和第四节是一个批判性的评价。我们的发现如下所述。若将其置于一个更宽泛的学术领域，我们就会发现沃科尔的立场可以明确地归结为两个因素：在现代性的阐释中赋予空间以特权角色；力图从随之而来的将作为政治形式的主权空间属性中演绎出国际关系范畴。将前者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作品作简要比较后，我们将揭示这种空间特权是如何的莫名其妙——这一因素是如何地需要更广泛的思想或经验的证明，而沃科尔却付之阙如。我们的主要讨论将集中在第二个因素，即他如何从空间的现代形式中演绎出国际关系范畴。因为这维系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全球化的时空效应是否预示着“国际性”状况的终结。在此该轮到我们迈出非传统的一步了。在间接地批评了该书最后一章的国际关系原则未能把握现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历史特殊性后，我们将探讨这种批评可以向何处延伸以及可以延伸的范围。当然，我

们将尽力应用马克思的异化方法论(在1857年的“导言”中提出的)建构“国际体系”作为学术范畴的防御体系,而这一范畴的目标是合法有效并明显超越历史的。沃科尔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完成我们的建构,那么他对全球化理论的支持就会被严重削弱。这一后盾也将随之坍塌。

## 本体论假设

沃科尔在《局内与局外》第一章宣布:“本书没有直接的主题或结论”<sup>⑮</sup>,这当然不是说主题或结论不存在——只不过它们需要读者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才能推导出来。为此,沃科尔并没有为我们的分析提供指针。“我坚持认为”,他在第82页上说,“对当代世界政治的不同分析方法必须建立在基本的本体论假设层面上。”然而,他仍然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本体论假设。但是我们可以从其文本中推导出如下假设。

首先,人类是自我阐释的生物,因此他们的行为必须通过他们对其存在的意义建构的范畴才能得以理解。第二,必须要解决伴随人类存在的“三个哲学问题”才能完成这些建构。<sup>⑯</sup> 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自我与它者的问题、时间和空间的问题。第三,在更深的层面上说,人是社会动物,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历史的各种)文化形态的互主体性方式完成的。

沃科尔正是从这三个本体论假设(再一次间接地)出发提出了他的理论得以实际运作的重要的方法论前提的:所有的人类社会形态都体现了上述存在问题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的“解决方案”(因而可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这看起来是合理的。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支持这些特定的本体论假设而非其他呢?尽管沃科尔在其“沉思”中对于解释性论点的形式

小心翼翼，他对于这些哲学问题一以贯之的态度还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归纳性的意义。简而言之，他必定认为不同的文化体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特定形式在某些重要方面来看，是它们作为社会结构的更广泛特性的基础。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准确地澄清这些问题是什么。

沃科尔所描述的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与柏拉图所谓的多个与单个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sup>⑦</sup>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引起的对当地认知的挑战——智力的一般范畴如何能将众多的个别归类——而且在于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如何反映人类作为理性主体的存在需要。理解我们的经验是意义建构的条件——甚至是其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对柏拉图还是对沃科尔来说，一般与个别的问题既是一个解释建构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认同建构的神秘问题。

然而，对沃科尔来说，作为一个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的理论家，总体上的一般与具体的问题时常以一种更精确的曲折表现出来。在一个既定范围之内提供问题的有意义的解决方案的同一个文化建构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复制和强化这个问题，因为现代“世界政治”能为已知的经验上的文化解决提供分类。在这个层面上，作为个别文化诉求（现被称为个别的）与人类的整体诉求（现已超越任何特殊的文化解决）之间难以缓解的紧张关系再次出现了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第二个“哲学问题”，即自我与它者的问题，或称为局内与局外的问题。如果一般与个别的本体论问题可以在一个既定的文化范围内得以解决，那么不同的本体论地位就必然涉及这个范围之外，这个差别将在自我与它者的相互对立的集体认同的层次上反映出来。沃科尔声称自我与它者的问题，或局内与局外的问题，“不是国际关系所独有的”<sup>⑧</sup>，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领域它具

有特别的重要性。并且,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自我/它者以及局内/局外的二分法的实际内容也会随着特定的文化形式作出历史的改变,而在这个形式中早先的一般与个别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沃科尔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来分析,其核心内容就是认为这种个别的解决方案使得自我与它者的问题特别难以驾驭。

最后,就是空间和时间的问题。“具体化的时间地平线”,沃科尔说,“赋予了我们的目标以意义。”<sup>①</sup>如果无休止的变化和个体的死亡可以归结为生命的意义,那么这个假设就是人类存在所必需的。同时,“空间的观念,就如同时间的观念一样,表现了人类存在的诸多神秘之所在”<sup>②</sup>。这一断言有点儿躲躲闪闪,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与此后的一个论断——“与欧几里得和牛顿有关的空间建构在决定欧洲文明的文化形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③</sup>——结合起来看,那么这一论点的主旨就再清楚不过了:文化共同体不仅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从某些方面看,它们是通过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的意义建构而产生的。

如果这些就是沃科尔理论的“基本本体论假设”,那么下一步就是将它们应用到具体的历史世界的分析之中。“我将重申历史的优先地位”<sup>④</sup>,他说。果然,此后就出现一种隐含的叙述,从而展示了一幅由中世纪、现代早期/现代、现代后期/后现代三步曲构成的思想和物质的世界图景。

对于第一阶段,沃科尔并没有为我们的讨论提供更多的题材。<sup>⑤</sup>但我们也许能重建其如下梗概。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思想协调的“解决方案”就是“经院派的普世主义”的特定成就。<sup>⑥</sup>就此而论,“认识和存在的等级秩序模式”是围绕上帝存在的中心主题而得以说明的。<sup>⑦</sup>这一主题“造就了一个延续性的世界、一种天下大同的文化、一种崇高或低贱的伦理道德以及根植于一神教的神学政治”<sup>⑧</sup>。这种时间的相关性反映在“中世纪时代

复杂而重叠的司法体系中”<sup>27</sup>，尽管“具体化的时间地平线”并不是由作为历史的时间线性运动来定义的，相反：

时间和运动……在永恒的边缘停了下来，就在拥挤的天使中，从此岸到彼岸、从生命到死亡、从人类之城到上帝之城的转变中的某处停了下来。<sup>28</sup>

除了这种熟知的泛泛而论外，再也没有详细的描述（偶尔游离不定地提及了“封建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认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沃科尔的兴趣主要在于阐明接下来的现代世界。由于对它的处理决定了以后令他感到不安但又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理论主题，我们必须作更深入的探讨。

## 空间与现代性

沃科尔的理论要旨可以用三个富有特色的论点加以说明。第一个论点是：国家主权构成了“所有时空关系的现代政治阐释”<sup>29</sup>。第二，主权的独特地位来自于它在现代性的文化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主权可以解读为对三个哲学问题精致而独特的现代解决方案”，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了根植于人类存在特性的这三个问题，即一般与个别、局内与局外、空间与时间的问题。<sup>30</sup>最后，因为主权表达了“所有哲学论题的空间解决方案”，因此它就具有了“特别的现代性”。<sup>31</sup>这些论点弥漫于理论的氛围之中，全球化理论家总是要染上一丝深奥的哲学气息，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必须指出的是，沃科尔也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是正确的话”，他补充道，“当代政治生活就越来越显示出时间加速的特点，那么我们就经历正在浮现的现实与传统的世界政治理论之间越来越不和谐的矛盾”。<sup>32</sup>但是沃科尔所谓的主权的角色和特性到底是什么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是历史的，又是哲学的。沃科尔引导

我们注意早期的现代欧洲,在此他确定了在广泛的文化危机中酝酿的主权观念。这一危机的实质(其本身也是“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过程的产物”<sup>⑳</sup>)是中世纪“延续性的和等级秩序的世界”正让位于现代“自治和分离的世界”。<sup>㉑</sup>这不仅反映在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结构的崩溃之中,而且也反映在面对科学革命的精神和思想体系的同时瓦解之中。在这种语境中,以往由上帝的存在而确定的存在解决方案再也不起作用了。“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框架的努力”<sup>㉒</sup>要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案。从马基雅维里(他对于世俗的自治性的论断仍然是基于“古老宇宙观的预言”<sup>㉓</sup>)到霍布斯(他的预言是基于“欧几里得—伽利略的绝对空间原则”<sup>㉔</sup>),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出现了。主权的概念和实践表现了在政治领域绝对空间的观念在决定广泛的“欧洲文明的文化形态”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sup>㉕</sup>由此而论,“现代政治是空间政治”<sup>㉖</sup>,它参与甚至构成了以空间方式解决存在问题的核心。

它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具有割裂、排斥、虚化和同化作用的绝对政治空间是如何作为文化意义的整合原则而起作用的呢?对沃科尔来说,这就是主权的“精致”、“风格”,甚至是其“形而上学的成就”。<sup>㉗</sup>

首先讨论的是普遍与个别的问题。这具有双重解决的方案。一方面,主权国家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允许在一个相互作用(不管多么微小)的普遍框架内坚持与拥护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跨文化地)将主权国家归纳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可以重新解释为人类普遍需求——安全、自由和发展——的实现。“一个体系、多个国家”<sup>㉘</sup>成了由空间定义的公式,用这个公式就能解决现代世界政治中的多个与单一的问题。

这个“主要解决方案”使局内与局外、自我与它者的绝对空间划分成为可能,并依赖于这一划分。在单个国家合法的个别

性范围内，“它就有可能实现普遍性的渴求”——在一个稳定而有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理性与公正、民主与自由”的共同目标。<sup>⑩</sup>若没有这一解决方案，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正是其可能性规定了超越主权国家边界之外延伸的不可能性。在那里，条件的偏离和个别的冲突占据了主导地位。局内与局外的绝对空间划分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对人类可能和责任的绝对哲学划分——这一划分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文献的正统划分（以及不可调和的本体论假设）。

最后，这个划分也是理解主权是如何通过重构的方式“解决”空间与时间问题的关键。局内与局外的空间划分的领域也是时间性得以展示的场所。在局内，社会渴求的累计实现允许时间——过去、现在、将来——被“驯服”，即可以解释为人类意义展示的中介、进步。在局外，它被谴责为“反复与重复”<sup>⑪</sup>的戏剧表演，只有悲剧性循环的身份能避免时间上更糟糕的经历，因为在此时间最终是无序而混乱的，不能表现人类存在层面上的任何意义。就这样，主权的实践是“一个永恒的话语”，以往神学的时间和永恒的区分所表现出的想像的局限在局内/局外的空间划分中再次出现。国际关系理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都成了沉重的存在问题的载体，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不过是“在毫无拯救希望的情况下对时间特性的颂歌”<sup>⑫</sup>。

另外的两个步骤完成了沃科尔理论的总体结构。虽然它们零星地分散于作品的整体之中，逻辑上的清晰要求——而他论点的实质也允许——在此时将其总结出来。第一步，沃科尔从早期欧洲特定的历史“解决方案”中得出了总体上属于“国际体系”的传统特性。第二步，他通过对“时空关系根本的重新阐释”预见了解决方案的削弱——即“国际体系”的削弱。<sup>⑬</sup>我们将依次概述这些论点。

沃科尔的论辩认为“国际道德原则”的非连续性领域的存

在并不根植于政治共同体多元性相互作用的总体框架之中。相反,它“直接产生于这种时空解决方案”<sup>④6</sup>。这一点我们刚刚作了探讨。虽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论点是合适的,或者尽管有点矛盾,<sup>④7</sup>但是论点的总体锋芒是毋庸置疑的。他在第67页上强调说:“主权原则足够产生道德和国际关系的总体框架。”一些人认为主权根植于预先存在的分裂成多重的相互作用共同体的人性之中,沃科尔针锋相对地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论断。他说,

主权不是简单的国际性碎化的表现形式,它首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空间解决方案。国际性碎化只是这一解决方案的一个后果,另一个后果就是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和时间进步的表述。<sup>④8</sup>

如果地缘政治的碎化只是一个后果而决非原因,并且存在的空间解决方案由此而折射到政治层面,那么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中心主题就有可能重新最终解释为这种政治解决的发散性后果。这就是沃科尔下一步试图要做的:他确定了“以本质上的空间形式来研究国家”的四个后果以及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五个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空间定义已经很难涵盖世界政治的现实。<sup>④9</sup>

这四个后果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束缚,从而限制了对国际关系领域历史变迁的概念化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对国家领土完整性的威胁”常常导致了过于匆忙的结论,认为这是国家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终结;对国家的各种假定的替代形式未能将它们与其时空推动力区分开来,从而将后者简单地归结于某种形式的(主权的)世界政府;最后,政治的空间定义过于僵化并限制了对时间运动的想像力,因此由“新的国际体系结构”引发的争论被谴责为无用的震荡:“要么是只用几个脚注就能使修昔底德和霍布斯回到现代,要么是全球主义者的新千年即将来临。”<sup>⑤0</sup>

不管是否变化,主权政治的绝对空间定义已经导致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根本问题:正是国际关系的主权国家结构造成了其定义的无可挽回的无政府状态和暴力特性。结果,就国际关系而言,“主权既是一种体系建构因素,又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sup>⑤1</sup>这就解释了一系列围绕国际法、干预和国际组织等问题而展开的学科辩论(必定莫衷一是的结果)。沃科尔承认这些问题“对于国际关系的学生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sup>⑤2</sup>。的确,他的主要观点是:只要时空关系的主权解决方案存在,那么它们就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克服的。他对于这些辩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些辩论的不解之谜不是根植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框架,而是来自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特定的历史空间定义的解决方案。

现在“时间加速”概念又被引入了这个混乱不堪的学术景观之中。这种加速是以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秩序的节奏运动的,尽管这种秩序还未完全定型,但它的出现已经在现在的经验中引发了一种新的不协调的紧张关系。

它们究竟是什么?如果集中在沃科尔提出的经验(而非文本)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双重的效果。首先是至关重要的1989年,因为它触发了“冷战的地缘政治的瓦解,同时也触发了全球组织的资本主义在欧洲领土范围内的迅速确立”<sup>⑤3</sup>。然而,除了其所有的喧嚣与骚动,1989年实际上是“加速趋势”的产物,而这种趋势就是“整个20世纪最鲜明的特征”<sup>⑤4</sup>。如果我们追问这种趋势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那么就必须结合“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反应契约时代”才能作出回答。<sup>⑤5</sup>对于防卫政策的制定者来说,这种契约源自于军事技术的进步。这一累计效应就是深化了:

一个矛盾——或者也许只是一种不和谐:一方面  
权力结构越来越国际化和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越来越普世化 ;另一方面 ,参与、表达、责任与合法化的过程仍然根植于制度化的国家机器之中。<sup>⑤</sup>

如果我们在沃科尔的认识中再加上一点 :“对变迁、创新和转型的权力观念”在欧洲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占据中心地位已达“至少两百年”<sup>⑥</sup> ,那么沃科尔的“加速趋势”得以存在的历史叙事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这种历史叙事肇始于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 ,并受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技术动力的推进。它的方向越来越朝向全球紧密的相互依赖形式 ,并对源自于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观念提出了质疑。

人们也许会设想 ,沃科尔同肖尔特和赫尔德一样 ,在预言 17 世纪的政治理论已经过时这一点上属于历史上的后来者。然而 ,这一点实际上告诉我们 ,沃科尔认为早期现代思想的本体论假设在现代性的政治文化中是多么根深蒂固。这又解释了为什么沃科尔赞同全球化 ,反之亦然(尽管是隐秘的 ,我们很快就能证明 ,这种关系源自于思想上的相互依赖)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系必定是“格外困难的”。如果它的确是长时段的“三个解决方案”的最终完结 ,那么声称主权终结的论断只是证实了上文中提到的无用的震荡 ,因为这个论断并没有涉及“统一性与多样性、自我与它者、空间与时间关系的最根本问题”<sup>⑦</sup>。没有任何人 ,即使是沃科尔也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他能提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对新的社会运动作出社会学的考察 ,以确定其中是否有一些显示了新的时空存在形式。<sup>⑧</sup>他翻耕了土地 ,但却不能播种 ,而且现在还不清楚许多全球化的理论家是否就是那些应该被翻进地里的草皮。

略作小结 :人类社会的所有形态都体现并复制了人类存在问题的特定历史解决方案 ;现代性被定义为社会和哲学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 ,是独一无二的空间解决方案 ;它的政治表现就是主权的制度形式 ,正是这种制度形式产生了现代政治的局

内与局外的问题。关键的问题不仅是解释国际体系的形式，而且是它存在的本身。由于全球化理论引发的当代转变正威胁着现代文化的基础，如果我们仍然处于主权领域散漫的陷阱之中，那么理解这些转型的真正内涵、范围以及它们将会带给我们的将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种主权领域已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不仅占据了我们的现代政治实践的中心，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选择的想像力，而这种选择又未能参与到现存的时空解决方案之中。

## 为什么是空间？

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一切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沃科尔的观点可谓独辟蹊径，但其中之玄奥或曰独创性远不是评论家或崇拜者所宣扬的那样。它整体上的价值就是其哲学人类学的意义，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人类不同文化形式的“内在含义”的比较研究。它的前提是基督拯救学——强调各种文化形式是如何（通过赎罪、拯救和超验等范畴）将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意义从存在的矛盾转变成具有神秘基础的有意义的经验。它对于社会科学的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它对“现代的”、“西方的”文化提出质疑，从而显示出若以神学的方式解决无所不在的生存问题并提供世俗的解决方案是多么困难。

毋庸置疑，这种方法的确能产生对现代状况的深刻理解。要证实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它最著名的应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传播的反思》（以下简称《想像的共同体》）<sup>④</sup>。比《局内与局外》整整早十年出版，安德森的著作涵盖了沃科尔以后将要讨论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相似领域。它也将“存在的宿命”和不同的文化形式对其提供的“救赎”作为解释的出发点<sup>⑤</sup>，并将这一前提精心炮制为一

种散漫分析的方法。该方法将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态(以及它们的文化观念)理解为代表这种宿命的特定解决方案。安德森也将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起源追溯到了基督教神学解决方案的消解。

天堂的解体 :没有任何事情使得宿命更为武断。  
拯救之荒诞 :没有任何事情使得另一种延续性更为迫切。然后 ,就需要一种世俗的转型 :将宿命转变为延续性 ,将可能转变为意义。<sup>②</sup>

最后但并非最无关紧要的是 ,安德森同样充分而又雄辩地意识到 ,政治共同体特定的主权想像参与并体现了新的空间和时间意义的历史建构。

总之 ,应当指出的是 ,安德森充分仿效并延伸了马克斯·韦伯所运用的方法论 ,即世界宗教的总体救世神学及其在“理性主义的特定的和特殊的西方形式”<sup>③</sup>上的实际应用。他这样做的确超越了马克斯·韦伯所能达到的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正如其他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 ,在韦伯的社会学著作中 ,民族主义可能是一个最大的空白。对于这一点 ,佩里·安德森将韦伯和欧内斯特·盖尔纳作了比较并指出 :“韦伯被民族主义的魔咒所迷惑 ,因此未能将其理论化 ,而盖尔纳将民族主义理论化却未能发现这一魔咒。”<sup>④</sup>从这个意义上说 ,《想像的共同体》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它成功地运用了基督教救世说的方法 ,并将这一魔咒最终变成了强有力的理论分析的目标。

既然如此 ,我们就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既然主权的时空特性已被确认 ,并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基督教救世说结合起来 ,解释了意识和社会实践形式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历史过渡 ,那么沃科尔理论的特色又在何处呢 ?对于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予以回答 :首先他强调了空间的特性 ,其次他解释了国际体系的问题。

对于前者 ,必须指出的是 ,若从安德森著作的(实际上也是

韦伯的)观点来看,沃科尔对空间的强调就显得很奇怪了。他已经告诉我们,现代政治“就是空间政治”。也许现代文化形式的兴起要求将空间重新定义为绝对和抽象的,或者说“不可侵犯和无限制的”<sup>65</sup>。问题就在于,时间亦是如此,它不可逆转的、线性的和一致的鲜明现代概念赋予它同样“不可侵犯和无限制”的特性。“这个新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以至于我们可以争辩说每一个重要的现代概念都是基于对‘同时’的定义。”<sup>66</sup>然而,这并不致使安德森坚持说现代政治就是时间政治。(相反,早些时候,普兰查斯在分析现代国家的领土特性时,已明确地使用了局内与局外这一对概念,然而它们远远没有沃科尔作品中咄咄逼人的架势。<sup>67</sup>)

这样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参与到一致性和异化特性中的不仅仅只有时间和空间。相反,对于经典社会理论来说,正是对社会再生产(精神的和物质的)整体特性的概括决定了现代性的问题。人被异化为“个体”,时间和空间被异化为“可虚化的”,国家被异化为“主权”,物被异化为“交换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现代人“已经被异化所统治”<sup>68</sup>。

面对这种异化的蔓延,我们在匆忙断定任何一个因素为决定因素之前都会犹豫片刻。毕竟,现代政治的“绝对”领土性定义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化“解决方案”的表现形式,而决不是仅仅局限于“空间”,或者说只能用空间来定义。马克斯·韦伯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都犹豫得太长时间了。对于他们来说,也许理性和去魅化仍然只是一个复合的历史进程;在各部分之间都不存在最终固定的因果等级秩序,不管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和加速了统一的世俗化的文化精华。但这至少使得他们在整体上将这看成一种更广泛而开放的经验主义的跨文化方式的过程。与此相反,沃科尔的立场使得一个可商榷的实在的观点更扑朔迷离,即时间性成了早期欧洲现代文化惟一的决定术语。

即使这一实在的观点是正确的,也不一定能得出以下结论,即在历史和社会学的解释与分析中时间范畴因而具有了相应的因果决定性。

即使我们也像唐纳德·洛一样赞同“内在、理性的时间性表达在早期欧洲是一种主导的认识论秩序”<sup>⑥</sup>,而这一秩序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安然无恙地继续存在(就像假设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样),那么这种观点本身也是异乎寻常的。至少我们需要证明早期的“认识论”是如何受“政治经济的新空间”决定的。然而,这种认识将会动摇沃科尔的理论,正如我们已证明了肖尔特接受威斯特伐利亚叙事一样值得怀疑。那么以下的观点又是显而易见的了,即早期资本主义的主权性不可能直接从它早期的先例中(前资本主义的)推导出来。并且,“晚期或后现代性”的时间加速将相应地要求在它们试图解决的“时空解决方案”中的一种真正的历史的存在。在这种视角之下,沃科尔理论的阴影就开始出现了最后一章分析中的谬误的参差轮廓。

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后结构主义和早期全球化理论的论战中坚持这种观点当然是很时髦的。在《想像的共同体》第二版新增的一章中,安德森也显示出了这种迹象。<sup>⑦</sup>然而,现在这种时尚已经过去,很难设想它已留下任何持久的理论的论证。为什么是空间?每一种全球化的理论都假定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学和哲学的解答。即使它是存在的,我们在罗布·沃科尔的作品中也未能发现这一答案。神秘主义的魔咒也许可行,但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这也不足为凭。“神秘主义的解释被认为是深不可测的”,他在《欢乐的科学》中写道,“然而,真理是:它们连肤浅都算不上。”<sup>⑧</sup>就在那疯子宣布上帝死亡的寓言后,这一格言在此具有独特的启示。

即使不能解释其空间的优先标准,我们总算还能诊断其理

论的后果。没有任何地方比沃科尔观点的第二个方面即国际理论更明显,也更值得质疑。

## 国际理论的质疑

在此,我们再次面临的问题是清楚地界定沃科尔理论的特色。从表面价值来看,沃科尔声称“对国家主权的原则很少有理论的分析”<sup>72</sup>,或者说,经典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相互加强的分离趋势也同样“很少引起足够的注意”<sup>73</sup>。对于这些,如果我们不将其仅仅看成是露骨的傲慢与自负,那么它们确实有点语出惊人。

在政治共同体的相互关系领域,主权国家绝对的排他的形式产生了诸多问题,同时简单地延伸(国内)政治理论“本身”的原则是不可能建构起一种国际理论的:这些都成了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定论了。这些观点有其历史的渊源——也曾经有过像沃科尔一样将现代国家体系的起源归结为同样的历史机缘,并有被奉为典范的理论思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丁·怀特,他在1966年就清楚地认定了国内政治(线性)进步的时间性与国际政治(循环)“往返重复”的时间性之间的差别。他注意到这些差别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偏见”而显示其存在:他也清楚地——如果说也有点异乎寻常地——意识到了这一概念的历史与文化的特性。

12年以后,我们在同一学术传统中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迈克尔·唐兰与马丁·怀特针锋相对。怀特的结论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排斥,从逻辑上来说是不可逆转的,而唐兰实际上一开始就宣布这种相互排斥在每一个领域中都有其悠久的道德与知识的理论渊源。唐兰明显地运用了一种异想天开的文学形式,即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等伟大的政治理论家

之间的假想的酒吧闲聊。实际上,作者是以一种可能的最严肃的方式批判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理论。如果国际理论不能超越一种以国家而非个人作为行为者的世界观,那么最终原因就在于政治理论家本身。因为在最根本的层次上,他们假定人类只能在个体主义的政治共同体中追求其“美好生活”。迄今为止,他们对这一假定都习以为常,因此他们都成功地逃避了它所造成的主要后果的责任:他们认为没有义务论述由于他们的隐含假设所造成的作为道德上“国家间的荒原”的国际领域。<sup>④</sup>然而,唐兰对这一切忍无可忍。他迫使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假设辩护。在以下来来往往的辩论中,局内与局外的问题又回到了沃科尔预先设定的伟大的哲学主题:众多(政治共同体)与单一(人类)的问题、宿命与超越(唐兰称之为“自然”与“神性”<sup>⑤</sup>)的问题、自笛卡尔开始的“欧洲思想的二分法”<sup>⑥</sup>等。此后夜幕降临,唐兰对他所听到的言论仍不满足。他最后的结论是:彻底抛弃作为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基础的未加论证的假设。

这样,正如利恩·汉森的结论所说的,“对国家主权的分析并非沃科尔引进的一种新观念,描述国内和国际政治两个明显相异的领域也非沃科尔的创举。”<sup>⑦</sup>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就是并非只有沃科尔才意识到了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建构及其相关的话语。

因此,在确定现代国家体系出现的时间问题上,他强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确定了国际理论所面临的伦理和实践上的种种困境:看起来沃科尔在这个主题上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当罗伊·琼斯在《局内/局外》的一篇严厉批评的书评中指出这一点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对于这一领域批评的“反讽程度”<sup>⑧</sup>。的确,他从未说过正统的国际理论不能精确且一针见血地反映现代国际政治

的经验。相反，他将其看成是这一经验漫长的建构和再现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他的理论试图解读现代国际政治话语内在结构的修辞学节奏、其思想上的省略与本体论上的排他性时，他注定要与现实主义沿着同一个轨迹运行，具有相同的理论形态以及运用相似的材料解决问题。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如果沃科尔要提出一个鲜明的论点，那么它不是来自于国际理论所遇到的问题，而是叙述这些问题来自何处。对于唐兰来说，这些问题来源于将人类分成多个政治共同体，又因为西方政治理论未能很好地解决这种分歧而使问题恶化。他提出了国际理论的超历史性框架。然而，这正是沃科尔竭力想要抛弃的。对于沃科尔来说，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分隔、碎化以及无政府状态的超历史性框架。他试图以古希腊的城邦来说明，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局内与局外的政治含义就无一成不变的决定因素了，它会根据以往生存问题的文化解决方案的变化而变化，而正是这些生存问题才使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了不同的色彩。因此，对他来说，国际理论的问题不可能来自于任何超历史的模式：国际体系及其问题的存在根植于早期现代欧洲特定的历史解决方案。

这样，在唐兰想像的对话中“历史主义者”作为后来者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强调了总体上的问题，而沃科尔要强调的是“历史的优先地位”，因此他引用马克思的思想来谴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所谓的“鲁滨逊模式”。

他们之中谁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如果沃科尔是对的，那么全球化理论所预见的后国际世界就有可能使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个时代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国际体系的问题不能完全分解为它的现代形式，那么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非法地将一般与具体的问题掺和在一起，在这种基础上的后国际世界的论点将会使其倡导者丧失解释当代世界政治的必要

条件。

我们将要探讨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为此,我们将试图解答在本书导言中提出的问题:面对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新的理论框架,我们是否愿意捍卫经典的社会理论,同时又以某种方式为国际关系理论辩护呢?如果保留传统的国际体系问题的理论框架还有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又是什么呢?由于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用大量篇幅来批判这一问题在威斯特伐利亚综合症的歪曲的历史论点中的具体化,即使下一步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正面的回答也显得古怪,甚至还有点危险。然而,我们非迈出这一步不可,因为将这个问题置于一个图式之中就有希望使以下的讨论变得更为清晰:将(超越历史的)一般性错误地分解为(历史的)个别性并不能回答从(历史的)个别性到(超越历史的)一般性的错误归纳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个思想的谬误就包含了沃科尔所谓“困难”的最终源头,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全球化理论无意为自身设下的一个巨大的圈套。

首先,沃科尔引用马克思1857年“导言”中“鲁滨逊模式”的术语是完全恰当的。他在此试图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作的批评与马克思试图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批评几乎完全一样。就好像国际关系理论家寻求将现代国际关系解释为地缘政治的整体(超越历史的)无政府状态,政治经济学家试图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解释为“所有生产的一般(超越历史的)先决条件”<sup>79</sup>。事实上的结果也是如此。一方面,马克思写道,正是由于这些“一般状态”是从每一个历史的真实生产方式中抽象出来的(为了获得普遍适用的范畴),结果是“一般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几个简单的特征,这也是为了简单的重复使用而炮制出来的”。<sup>80</sup>对于这些,当然就“无真实的历史生产阶段可以把握”<sup>81</sup>。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经济学概念上的抽象化导致了远非思想属性的结果(马克思认为这也是其目的),其最终结果就是

将生产方式——甚至是所有的生产方式——解释为“独立于历史的永恒自然法则，从而资产阶级关系就作为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悄然降临这种抽象得以进行的社会之上”<sup>②</sup>。

实际上，这最后一点没有必要隐含地建立起来。既然“整体的先决条件”来自于既定历史世界的个体，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抽象如何被打上了这个世界的烙印。从其起源来说，这是必然如此：正是“这种既定的，不管是观念的还是现实的……这些范畴都表现了同一个世界的存在形式”<sup>③</sup>。鲁滨逊·克鲁索可能正是由于海难而从资产阶级的现实环境中被“抽象”出来，这种小说家思想实验的结果不是发现了普遍的社会先验的人性，而是表现了产生于作者“观念”中的（或者，对笛福来说更公平，也是在他的绝大多数读者的观念中）作为自然的普遍形式的社会决定因素。

对于马克思来说，鲁滨逊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效果就是要颠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同时这也是解释现代性的新经验的关键。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沃科尔：从整体的超越历史的无政府状态框架中推导出出现代国际政治的经验，就是要颠覆主权作为时空解决方案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是解释漫长的现代政治建构过程的关键，而现代政治又是围绕局内与局外作为绝对的空间两极建立起来的。然而，以下的事实使事情变得更糟：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国际政治”的一般抽象只不过是无意地对现代经验的推断，从而将只适用于后者的特殊性归结为地缘政治的永恒的自然法则。因此，这两种话语的思想核心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然而，与沃科尔不同，马克思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就此止步。如果说他消解了“18世纪毫无想像力的鲁滨逊式的自负”<sup>④</sup>，那么他还清醒地知道他显而易见的方法论的起始状态。他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探讨生产方式而寻求不同阶段的历

史发展进程,或者预先宣布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sup>⑤</sup>。一般抽象的问题不在于它们内在的不可行性,而在于它们与其他更狭窄的历史范畴的特殊关系。马克思争辩道,实际上只有将历史的特定范畴与一般抽象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后者的解释功能。

因此,在同样强烈反对鲁滨逊模式的论战中,我们发现马克思既坚持“所有时代的生产方式都具有某种共性”,同时又坚持“各个时代有各自的某种决定因素”,甚至还坚持说“若非如此,任何的生产方式都是不可想像的”。<sup>⑥</sup>那么,这些明显区分的律令(同时作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个统一的解释方法中又是如何并置起来的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隐含回答阐明了从生产方式的研究到语言研究的转向中所涉及问题的一般特征:

尽管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法则和特点,然而,正是决定其发展的那些特征即非普遍和非共同的因素,必须从对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有效的决定因素中分离出来,这样它们统一性中……的基本差异才不至于被遗忘。<sup>⑦</sup>

统一与差异、超历史性与历史特殊性能——也必须——在对任何具体的特殊性分析中结合起来。如果没有这种有意识的结合(这也决定了其分析性差异),任何实际的历史生产方式的特殊决定因素都难以确定了:它们要么被错误地消解于普遍特性之中,要么因吸收了“所有生产阶段共同”的特性而膨胀得面目全非。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从原则上说就有可能将历史特殊性的讨论推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完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在对两者的任何具体的历史形式的分析中我们称之为历时性并置(diachronic conjunction),而马克思冠之以共时性并置(synchronic conjunction)。为了将“生产”建构为分析的目标,我们不仅必须

处理好特殊的历史形式与超历史的普遍特征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遍范畴还是任何一种历史形式）区分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一般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那么，“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总体关系”<sup>⑧</sup>的特性又是什么呢？这是马克思在该文中直接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以一种共时性分析来讨论超历史性与历史性的关系非常相似：

我们的结论是：生产、分配、交换并非是一一的，相反，它们是整体性即统一性中的差异性的构成因素。<sup>⑨</sup>为了不遗余力地避免颠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双向的），他再次坚持认为只有以一种分析的并置才能将其决定因素带入一个明确的关系之中。

对这个讨论略作小结：马克思作为鲁滨逊模式的杰出批评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用双重焦点并置的方法讨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他还是被迫坚持认为“一般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抽象，但它是一种理性的抽象，因为它真正揭示并确定了共同因素”<sup>⑩</sup>。

一般的抽象，或抽象的一般，或超历史的问题，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们，也不管它们如何易于引起误解，都最终在社会解释的建构中找到了其不可分离的角色。

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回到前几页中暂时搁置的对沃科尔与唐兰之间分歧的讨论。我们现在知道，在他们通向各自不同结论的道路上，他们在方法论上必须跨越两个陷阱。沃科尔间接地指责唐兰之流坠入了第一个陷阱之中，他并非全无道理。长期以来，永恒的真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而对当代国际体系起作用的权力的特定历史形态却分析不足。唐兰的叙述，不管它有何优点，充其量只是（从其自身来看）“没有任何（地缘政治发展的）实际历史阶段可以把握”。一旦它试图对其

作出解释,它必定成为(如果它还不是的话)完全的鲁滨逊模式。

然而,问题是:难道沃科尔就成功地避免了非法地将一般分解为特殊的第二个陷阱吗?我们已经看到,他当然否定了国际体系中的任何超历史的观念,他否定了混淆当代国际关系的形式或动力上的任何整体决定因素,他认为任何整体决定因素只能从主权作为一种历史的特定政治形式的独特“时空解决方案”中推导出来。这些论点并非只是他的理论中可有可无的外表包装,相反它们是其核心:正是这些论点将它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区分开来。这些论点看来开辟了直接通向第二个陷阱的道路,我们把这个陷阱称为反向的鲁滨逊模式。

在他到达这个陷阱之前,我们还有某些工作要做。马克思的方法论分析将我们推向了前台。在它用来批判沃科尔理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一般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理性的抽象”吗?

任何现象都可能成为“理性抽象”的目标吗?如果不能,我们实际上讨论的“一般的国际关系”问题框架的基础何在?我们所谓的“问题框架”又是何意呢?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解答,沃科尔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进展将是一片坦途:所谓反向鲁滨逊模式的陷阱将不复存在。

其实,我们用不着如此焦急。“理性的抽象”听起来咄咄逼人。幸运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详尽地阐述过任何技术的程序,以至于我们必须遵循所谓的“理性的抽象”。在其他译文中,“理性的”(rational)被翻译为“合理的”(reasonable)。换言之,我们可以自由地阐述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语言平实的回答,同时可以利用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的方法,因此让我们理清该方法对于国际关系问题的核心作用。

我们应当首先确定第二个核心作用的地位——一般与个别

的共时性并置/区分。那么，能否在一般的人类社会存在的整体性中确定可称为“国际”的个别范畴呢？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是肯定的：“国际”指的是政治共同体之间或跨越政治共同体边界的社会生活的方面。这些方面能否纯粹从其自身进行分析呢？绝无可能——因为它们仍然属于“统一性中的差异”；在其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表现了这种既定的历史形式的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它们是否能提出政治、道德、知识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分解为同一社会中遭遇到的其他方面呢？它们看来的确如此：对无约束的相互作用的政治控制问题，对局内者与局外者之间不同的道德立场问题，用来解释这种社会生活的“外在”领域与其他领域相互关系的因果动因所必需的知识框架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由此而构成的“国际问题框架”）能否产生属于“所有时代”国际的任何总体决定因素以及“共同特色”呢？<sup>90</sup>也许可能。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只有通过解释马克思抽象方法中的国际历时因素才能完成我们问题框架的焦点。

在此，我们立刻遭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一旦踏出现代世界的主权国家范围，“国际的”这个词就失去了其经验上的指涉对象；主权国家固定的边界就会在一系列变幻莫测、交叉重复的司法范围内消失；定义清晰的政治共同体就会消解为广泛的文化体系，结合为复杂的帝国等级秩序，或碎化为无固定领土定义、游离不定的亲团体。面对这种马戏团般的历史形式，人们在说出“国际的”这个词时还得具有坚强的神经，或者说需要一种义无反顾的性格。

然而，至少在一个方面，这与马克思在作出关于“一般的生产方式”的“合理”抽象时所面对的问题颇有相似之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制度上区分的（经济的）生产形式在前现代社会中并无先例可循。相反，当时（政治上的）生产方式

是与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并以它们为组织形式的。这些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性别、等级,以及各种程度和形式的政治臣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甚至还包括语言。<sup>②</sup>难道这就使得马克思的抽象在这些情况下毫无作用吗?当然不是。这只意味着抽象的对象是通过不同的历史形式并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特殊性在更广泛的社会秩序中各不相同,在该秩序中的存在形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这种抽象在各种情况下都会注意这些并确认其经验上的不同形式。这就是历时性方法的基本观点。这是理论抽象与具体的历史形式之间持续的对话,其结果就是:随着抽象的进展,只余下最一般的决定因素,并使它从最初不可避免但又无形地涉及的实在的预设中解放出来。诚然,若没有这一点,就无从揭示和分析历史的特定意义。

如果我们在对“国际的”抽象中亦能如此,那也是最好不过了。但我们能否如此呢?在此,我们难道不是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差别,并有可能使我们的努力踏上不归之路吗?如果说任何社会都要从事生产活动,这个断言显然是合法有效的。“就连小孩都知道”,马克思在给库格尔曼的著名的信中写道,“任何国家只要停止工作,别说一年,就算是几个星期,它也将灭亡。”<sup>③</sup>因此,为了研究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普遍的需求时,对“生产”进行一般的抽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合理的”。经验形式的变体越广泛,一般抽象的价值就更大,同时总是可以从某种形式中找到被抽象的对象。

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的观念中,这种明显的特征并不存在。在主权国家的时代很容易确定其共时性的对象,但是一旦被剥夺其现代的形式,这种对象就没有了广泛的、一般的存在。对于欧洲的封建主义来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正的难题,区分内在与外在的分界线,即使得国际的共时性定义成为可

能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呢？它是每一个贵族的领地的界线吗？或者说它是由贵族效忠的王国的范围来定义的，还是由基督教本身的边界来划分的呢？所有这些都具有局内与局外之分，我们应当如何选择呢？的确，领地可能交错重叠，忠诚可能具有多种形式，而且基督教的边界本身就是游离不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凭这种比喻意义上的分界线就能解决所有的局内与局外的问题呢？如果不能，我们不是失去了我们期望中的范畴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一般决定因素”了吗？

应当承认，这种批判具有真正的力量。然而，这种批判指向了理论的不完善之处，而并非其内在的不合理性。在对国际最初的共时性定义中，我们在抽象的基本层面上让一个概念逃离了我们的理论化和问题框架之外。这个概念就是“政治共同体”。我们在当时就应该注意到：对“国际的”成功的一般抽象应预先假定“政治的”一般抽象。如果我们未能将“政治共同体”概念的特定现代特性抽空，那么这些特性就会无形地被带入我们对“一般国际关系”的定义之中，这也会使过去变得面目全非。正是这种不完整性使我们在理论与历史的对话中停滞不前。若要使对话继续进行，我们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下一步是：我们必须要让抽象适用于更广泛的历史用途，即抽空围绕在“政治共同体”这个关键概念周围潜在的现代内涵。

毋庸置疑，我们在此最好能抛弃“国际的”这个词，因为它（与“生产”的概念不同）特定的现代决定因素如此令人反感。然而，其可行的替代形式——诸如地缘政治或社会间的——也具有它们各自的问题。无论如何，重新命名并不能解决真正的理论问题，况且“国际的”这个词还有其自身的优势：它使我们能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不用新名词来混淆语言，相反让我们来仔细分析这个熟悉的术语。

我们下一步如何进行呢？很明显，进入我们抽象之中的现

代假设是将政治定义为人类集体活动的社会包含性和领土统一的特征。读过马克思早期论国家的著作的读者,当然不会疏漏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除这一点?因为这一假设的本身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一般国际关系”的抽象在基督教社会中毫无作用。也许下一步就是寻求一种有关“政治的”表述公式,以支持马克思在给库格尔曼的信中提到的对生产关系的论述的相似的论点。(我们顺便可以提出假设,以区分哪些可以成为一般抽象的对象,哪些不能成为一般抽象的对象。在这个例证中,如果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断“政治的”和“国际的”可以成为一般抽象的对象,而“国家”和“国家体系”则不能。)我们能否找到这样一种表述——一种不需要假设其现代形式的政治定义呢?

例如,我们可以提出:任何社会秩序的政治维度都包含其形成和执行集体决定和规则的方式(而不管它们是什么)。④这种表述能否从理论上区分一般的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特定方面呢?或者说,按照马克思的术语,能否确认统一性中的差异性呢?明显是可以的。那么这一表述能否使我们理解政治的任何实际的历史形式呢?当然不能。这是一个研究经验现实的指导原则,只有通过精确地研究在给定的条件下的政治建构方式,我们才能得出解释政治过程的特定的历史范畴。总之,它是一种抽象。我们是否知道——或者说我们能否想像——我们所表述的政治维度在任何的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呢?如果不存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了一种普遍适应和超越历史的抽象:即我们得出了一般的抽象。

这种对“政治的”表述不需要——即使是隐晦地——提出现代国家主义的政治定义的假设。它可以同样适应于质疑任何形式的社会现实——氏族网络、朝贡帝国、民族国家,甚至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当然其结果是不同的。问题是:这是否有利于

我们的主要任务——同样完成对“国际的”一般抽象的建构？如果我们早先对问题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答案就是：在对“政治的”概念的重构中，我们已经将“国际的”概念从无政府状态的纠缠中解放出来，并完成了对这个概念的一般抽象。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国际的概念是否还保留着任何分析的决定性内容。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在前文中试图定义“国际的问题框架”时，已经确认了三个最终不可分解的建构因素：不受约束的相互作用的政治规范、局内者与局外者不同的道德立场以及由部分构成的整体的思想（以及哲学）问题。这是否是我们含糊的现代主义假设逻辑中所隐含的反映呢？或者说它在我们已经重新演绎的“政治的”范畴基础上是否仍然有效呢？既然没有任何社会秩序能涵盖整体上的人类社会，那么结论必然就是：我们已经确认的那些集体约束规则就会对谁将受到制约有一个限定。这也就意味着将会产生局内与局外的<sup>①</sup>问题：如果政治团体的约束规则限定了权利与义务，那么作为局内者和局外者又怎么会具有相同的道德立场呢？再者，如果集体约束规则划定了局内的界限，那么这些局内者（他们非普遍性的特征就必定不止一个）相互作用的规则（因果、道德、法律）又如何能强求一致呢？既然它们各不相同，那么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就必然产生需要单独解决的各自的一般问题。

在此，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经验主义假设，而在国际关系文献中，这个假设却要经过繁多的宗教—哲学或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证后才能得出。基督徒式的悲观主义者（以 20 世纪的现实主义者为代表）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碎化”（fragmentation），并神秘地将其源头追溯到了《圣经》上所说的人的堕落（Fall of Man）。<sup>⑤</sup>社会科学派的学者则称之为“无政府状态”，并用它来建构了一种地缘政治行为的反历史的理性选择模式。<sup>⑥</sup>

每一种理论都招致了不满,并引发了无休止的论战与反驳。幸运的是,为了使我们对国际的一般抽象合理化,我们并不需要这些论战。我们只需要经验假设的本身:在人类历史的已知领域,各种社会秩序一直是共存的。是否真有人愿意就这一假设展开争论呢?

如果没有,我们就完成了可应用于社会和历史解释的对于国际的“合理抽象”的建构。它的思想立场与马克思提出的“一般生产关系”的范畴不相上下。它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事情,但如果缺少了它,或者说未能认识到它所体现的一般决定因素,那么也就不能理解它所抽象地描述的任何特定的历史形式。<sup>⑦</sup>

现在我们能最终揭示这个漫长的方法论探讨对于我们更广泛论点的隐含意义了。这种含义可分为三种,相关领域分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罗布·沃科尔代表的立场,以及更广泛领域的全球化理论。

它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在于国际的“一般决定因素”以及如何对待这些因素。一般决定因素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就是“所有时代共有”的特征,但这些特征的本身并不能“理解……任何真正的历史阶段”。因此,它能解释的意义有很多,但同时它能告诉我们的又很少。这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作为一种理论的现实主义能接近于提供一种恰当的对世界政治的论述,同时它又离这个目标是多么的遥远。

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就国际关系的性质来说,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观念上总是有某种不可分解的因素,这一点无疑是对的。它也正确地认为这种不可分解的因素有一种历史的共性,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所有的社会在与它者的相互作用中,都在地缘政治共存的基本事实中获得了一种共同的形式,并要从最广泛的层面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即使将其视为国际关系思想的超越历史的典范,从对这些

答案的反思中也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筛选出哪些是国际关系的一般问题(历时性),哪些是它在社会再生产整体统一性中的特殊性(共时性)。正是因为如此,“即使说应当重建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它应当或就会消解于社会学之中”<sup>⑧</sup>。

然而,一旦当它企图将这些一般决定因素归纳为一种不偏不倚的解释性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的国际政治时,现实主义就错了。当它以一种推导于人性或社会科学性质的非历史性观点来支持这种企图时,它又是错上加错了,因为若要正确地应用一般决定因素,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解释毫无价值”,马克思在针对以这种方式被滥用的一般抽象进行论述时写道,“因为它缺少历史因素。”<sup>⑨</sup>一般决定因素告诉我们应当在现实的历史世界中寻求什么,而只有其目标的特定历史形态才能提供解释的实际基础。相反,在新现实主义中,国际关系的一般决定因素则“被扭曲为平淡无奇的同义反复”。

尽管如此,一般决定因素对于批判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仍然是存在的:不管是否喜欢,要想超越现实主义就不能回避它。不管其构想多么失误,它还是立足于这个思想基础(一般决定因素),这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所必需的。如果一般抽象成立,那么没有任何对跨国关系的论述——不管它多么具有说服力——会废除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性论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管是全球化理论,还是全球政治经济理论或者世界体系理论,都不可能最终完全取代国际关系理论框架。(我们也许可以以一种质疑的态度审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中作出的贸然断言:“为了保持我们研究对象的完整性而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我们必须将整个世界贸易作为一个国家的贸易来对待。”<sup>⑩</sup>)

如果这些隐含意义成立,那么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方法论

的陷阱——反向的鲁滨逊模式的陷阱就的确存在。过分地从一般滑向个别与非法地将个别概括为一般同样危险。对沃科尔的情况来说,这又会产生思想上的什么效果呢?

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国际关系的一般决定因素,那么它们的后果(我们不能凭空地希望其不存在)就只能从历史的特殊性中推导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空间的理论上的重要性在沃科尔的论点中牢牢地占据着中心地位。只有将空间的意义扩展到超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才能找到超越一般决定因素所产生的后果的源泉。只要我们不仔细研究其他的历史世界(在此也显现出一般决定因素的存在),只要我们不质疑总体上的空间前提的合理性,那么沃科尔的论点的确还有其内在的逻辑。早期欧洲的绝对空间观念导致了政治的空间定义,政治的空间定义造成了局内与局外的绝对分离,局内与局外的绝对分离则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最终不可分解性。瞧:鲁滨逊模式的“碎化”已经被所向披靡的历史特殊性所征服。问题是:并非所有的一般抽象都是可以削足适履的鲁滨逊模式。无论如何,这个胜利的代价太高。

这对我们来说代价太高是因为如果没有对“国际的”一般抽象,我们既不能理解其他的历史世界(别说我们的当代世界),同时如果我们被迫沿着另一条道路前行,我们也就被剥夺了理解其历史特殊性的机会。

在《局内与局外》的第三章可以找到一个例子说明因为否定这一基本点而出现的问题。在此作者讨论了希腊城邦以强调现代主权的历史特殊性,他试图说明若不是置于绝对空间的定义之下,局内与局外就有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这种奇怪的讨论并不能得出结论。在该章的第一段中,作者就多达六次提到了“古典政治理论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平行关系”<sup>⑩</sup>。在第二段中,因为有可能引发“无政府主义解释的危险”,作者以另一种

方式争论道：“对局外者的意义建构，将它者定义为对同一的根本否定”在现代情况下“并不是界限分明的”。这种从普遍到特殊的立场转换当然是完全合理的——即使沃科尔想方设法地避免提到希腊城邦的奴隶制。（其实，在此讨论奴隶制也是非常恰当的，因为禁止将“局内”公民变为奴隶的绝对禁令并未能延伸到在战争中捕获的其他城邦的“局外”公民。在对局外的建构中，还有什么地缘政治定义得比这——同时使所有的希腊人在一个共享的文明内共同面对在他们城邦体系之外的野蛮的“局外”——更“界限分明”呢？<sup>⑧</sup>）

然而，沃科尔从普遍到特殊的立场转换产生的真正问题是：这一程序的当地用法真正损害了他试图阐明的更广泛意义上的论点。他不可能两者兼得。要么是第一段中明确提出的一般决定因素允许在现代主权的情形中存在——但这又有损于现代国际体系的空间演绎，要么是对我们在前文从国际的抽象中获得的一般决定因素提出经验的反驳，但是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存在又使这变得不太可能。正如我们早已见到的一样，只是简单地认识到不同的历史形式不足以对一般抽象构成反证。

如果对我们来说这一代价太高，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对沃科尔本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此也可找到成为沃科尔作品中压倒性修辞特色的“困难”感的真正源头。在对现代国际体系的分析中，如果沃科尔事实上将普遍的一般抽象与具体的历史特殊性强扭在一起，那么他反复声明设想该体系的未来“格外困难”明显是避重就轻，因为设想超越抽象的普遍性不仅仅是困难的，从逻辑上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结合已经使得沃科尔的观点不可能取得进展，同时这种结合也解释了它对于全球化理论的吸引力。它是基于一个根本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的主要后果就是空间的具体化，而且这种具体化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将时间加速和空间的相互依赖强化

到了一种思想上无以复加的震撼程度。至此,我们就能讨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讽刺性意义了。检验沃科尔理论能否出现在当代思想锋芒上而不是被置于一个死胡同的惟一方法,就是看全球化理论的观点是否具有实际的经验证明。空间和时间的转型也许真的即将发生,并导致一个新世界的产生,在这个世界上国际的问题框架将随着特定的历史时空状况而消失,而沃科尔试图得出的结论正是这种时空状况。由于他本人避开了经验论证,他只有依赖于别人为他提供这种论证。一个学术的循环就此完成了。全球化理论家转向沃科尔的作品,试图从中获得对经验研究的哲学背景,他们也的确能发现一种哲学的论证,但这种论证却只有当获得全球化理论的经验背景后才能具有真正的生命活力。他们之中究竟谁将先作出让步呢?这并无区别。在这一点上,不管我们滑向哪一边,我们的思考方向将是向下的,也就是即将离开国际关系与全球化理论的交锋,从而转向社会理论的本身,而安东尼·吉登斯正是运用社会学的素材重新奠定了这一理论的基础。

## 注 释

- ① “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Science as a Vocation) 载 H·格斯和 C·赖特·米尔斯编:《马克思·韦伯选集》(From Max Weber),伦敦 1948 年版,第 145 页。
- ② D·赫尔德、A·麦格鲁、D·戈德布拉特和 J·佩拉顿:《全球转换:政治、经济和文化》,第 50 页。
- ③ G·扬斯:《全球时代的国际关系:一种概念性挑战》(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Global Age: A Conceptual Challenge),剑桥 1999 年版,第 76 页,强调为笔者所加。
- ④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剑桥 1993 年版,

- 第 2 页。
- ⑤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s) 载 K·布思和 S·史密斯编：《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剑桥 1995 年版，第 322 页。
- ⑥ 我指的是以下的陈述(同上，第 7 页)，为了说明，我用了斜体并加注(方括号)：“我的部分[但仅仅是部分]的目标就是要探讨[但不一定赞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但仅仅是一些]隐含意义[而非实质]，因为近来它试图[我不敢说能否成功]游说[而不是确定]一种明确的批判态度的可能性[更别说实质的]。”这句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事实，就是说读者越是熟悉“明确的批评态度”这个确定的术语，沃科尔却通过多重的修饰距离它越来越远了。
- ⑦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161 页。
- ⑧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13 页；《局内与局外》，第 17 和 157 页；“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13 页；《局内与局外》，第 21、162 和 103 页。
- ⑨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14 页。
- ⑩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2、8、155、158 和 16 页。
- ⑪ 同上，第 9、5 和 6 页；以及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09 页。
- ⑫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10 页。
- ⑬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157 页。
- ⑭ 同上。
- ⑮ 同上，第 21 页。
- ⑯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20 页。
- ⑰ 参见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113 ~ 114 页。
- ⑱ 同上，第 60 页。
- ⑲ 同上，第 27 页。
- ⑳ 同上，第 127 页。
- ㉑ 同上，第 129 页。

- ② 同上,第 82 页。
- ③ 利恩·汉森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困难。参见沃科尔:“国际关系:解构一个学科”(International Relations:Deconstructing a Discipline),载诺伊曼和韦弗斯编:《国际关系的未来:形成中的大师们》(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 Making),伦敦 1997 年版,第 322 页。
- ④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45 页。
- ⑤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19 页。
- ⑥ 同上,第 320 页。
- ⑦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46 页。
- ⑧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12 页。
- ⑨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6 页。
- ⑩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20 页。
- ⑪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14 页。
- ⑫ 同上,第 14 页。
- ⑬ 同上,第 89 页。
- ⑭ 同上,第 149~150 页。
- ⑮ 同上,第 149 页。
- ⑯ 同上,第 45 页。
- ⑰ 同上,第 46 页。
- ⑱ 同上,第 129 页。
- ⑲ 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06 页。
- ⑳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177 页。
- ㉑ 同上,第 176 页。
- ㉒ 同上,第 177 页。
- ㉓ M·赖特:“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呢?”(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载 H·巴特菲尔德和 M·赖特主编:《外交考察》(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伦敦 1966 年版。
- ㉔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177 页。
- ㉕ 同上,第 158 页。
- ㉖ 同上,第 63 页。

- ④7 参见第 153 页上的陈述：“对于民主可能性的局限，就是别的共同体系统施加于某一特定共同体之上的限制。”
- ④8 同上，第 78 页。
- ④9 分别参见上书第 136 页和第 173 ~ 174 页。
- ⑤0 同上，第 136 页。
- ⑤1 同上，第 172 页。
- ⑤2 同上，第 173 页。
- ⑤3 同上，第 2 页。
- ⑤4 同上，第 3 页。
- ⑤5 同上，第 46 和 155 页。
- ⑤6 同上，第 143 页。
- ⑤7 同上，第 3 页。
- ⑤8 同上，第 157 页。
- ⑤9 参见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中题为“永恒之后”(After Eternity)的有关部分，即第 322 ~ 324 页。
- ⑥0 B·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传播的反思》(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伦敦 1991 年版。
- ⑥1 同上，第 36 页。
- ⑥2 同上，第 11 页。
- ⑥3 为了解马克斯·韦伯(当然还有马克思)的全部作品所作出的经典的哲学人类学解释，参见 K·洛维希：《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Max Weber and Karl Marx)，T·博托摩尔和 W·乌思怀特译，伦敦 1982 年版。
- ⑥4 “马克斯·韦伯和欧内斯特·盖尔纳”(Max Weber and Ernest Gellner)，载 P·安德森：《相约的地带》(A Zone of Engagement)，伦敦 1992 年版，第 205 页。实际上，在此也可见到有关沃科尔的有趣的相似论述。“在沃科尔对国家主权的论述中是否有什么遗漏呢？”利恩·汉森问道。“看来最重要的遗漏就是他对国家的忽视。”参见沃科尔：“国际关系和政治的概念”，第 332 页。
- ⑥5 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 129 页。

- ⑥⑥ 安德森 :《想像的共同体》第 24 页。
- ⑥⑦ 普兰查斯问道 :“是什么使得一种特定空间的出现成为可能呢?而这种空间特性又划分出了局内与局外的界限。”在探讨了“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具备了为其自身准备的社会空间和时间特性”后,他继续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边界”定义为“能够在一系列非连续的框架内转移,并规定了局内与局外的界限”。他争辩道,正是国家划分出了“后来成为局内与局外的界限”,如此等等。分别参见《国家、权利、社会主义》,第 96、99、104 和 106 页。
- ⑥⑧ K·马克思 :《1857—1858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 164 页。
- ⑥⑨ D·洛 :《资产阶级感觉的历史》,第 59 页。
- ⑦① 特别参见该书第 179 页脚注,在此他提到了寇松爵士的评价 :“福柯在此的评价是最中肯的。”
- ⑦② F·尼采 :《欢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W·考夫曼译,纽约 1974 年版,第 182 页。
- ⑦③ 沃科尔 :《局内与局外》,第 164 页。
- ⑦④ 同上,第 151 页。
- ⑦⑤ M·唐兰 :“政治理论家和国际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ists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载 M·唐兰编 :《国家的理由 :国际政治理论论研究》(The Reason of States :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伦敦 1978 年版,第 77 页。
- ⑦⑥ 同上,第 79 页。
- ⑦⑦ 同上,第 83 页。
- ⑦⑧ 汉森 :“R·B·J·沃科尔和国际关系”(R. B. J. Walk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 331 页。
- ⑦⑨ 沃科尔 :《论教育的责任 :恢复罗伊·琼斯》(On Pedagogical Responsibility : A Response to Roy Jones),载《国际研究评论》1994 年第 20 期,第 319 页。琼斯的评论发表于同一期,题为“教育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Educate)。
- ⑧① 马克思 :《1857—1858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 86 页。
- ⑧② 同上。
- ⑧③ 同上,第 88 页。

- ⑧<sub>2</sub> 同上,第 87 页。
- ⑧<sub>3</sub> 同上,第 106 页。
- ⑧<sub>4</sub> 同上,第 83 页。
- ⑧<sub>5</sub> 同上,第 85 页。
- ⑧<sub>6</sub> 同上。
- ⑧<sub>7</sub> 同上。我在此继续讨论尼古拉斯的译文,因为在我看来这使得该论点更精确——即使在推理完成以前,讨论的目标似乎从“语言”又回到了“生产方式”。其他译文都表明语言和生产方式都具有方法论上的类似性,而不是证明语言是生产方式的本质派生(这正是尼古拉斯的翻译版本的隐含意义)。参见其他译文:大卫·麦克莱伦:《马克思的手稿》(Marx's Grundrisse),圣阿尔班 1973 年版,第 28 页;特雷尔·卡弗:《卡尔·马克思:论方法的文本》(Karl Marx: Texts on Method),伦敦 1975 年版,第 51 页;德里克·塞耶:《卡尔·马克思读本》,第 35~36 页。
- ⑧<sub>8</sub> 这些语句——来自于《1857—1858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 88 页——构成了第二部分的标题。
- ⑧<sub>9</sub> 同上,第 99 页。
- ⑨<sub>0</sub> 同上,第 85 页。
- ⑨<sub>1</sub> 同上。
- ⑨<sub>2</sub> 同上,第 472 页。
- ⑨<sub>3</sub> 马克思给库格尔曼的信,1868 年 7 月 11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1895 年通信录》(Correspondence 1846 - 1895),D·托尔编译,伦敦 1934 年版,第 246 页。
- ⑨<sub>4</sub> 我的这种表述以及这个论点来自西蒙·布罗姆利。
- ⑨<sub>5</sub> 更具体的例子,参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现代国际冲突的悲剧性因素”(The Tragic Element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Conflict),载于他的《历史和人类关系》,伦敦 1951 年版。
- ⑨<sub>6</sub> 在此,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肯尼思·华尔兹,特别是他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纽约 1979 年版。
- ⑨<sub>7</sub> 在此有必要作出以下说明。马克思的“一般生产关系”范畴并非

唯物史观,他也并无此意,而后者在逻辑上从属于(但并不包含于)生产关系的一般抽象之中。同样,我们对国际关系的一般抽象并不包含任何社会秩序中的相对概念。这样,所谓“国际关系的问题框架”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兼容的论调看来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提出的其他一般抽象概念中得到验证。在《资本论》第1卷第七章中,对“劳动”的一般抽象最初也并非指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坚持的任何社会维度。此后出现的对“合作”的一般抽象也不包含任何唯物主义的解释性的假设前提。在1846年12月28日给安尼恩科夫的信中提出的社会的一般抽象亦是如此:“何为社会?它又具有何种形态呢?人类相互活动的结果而已。”(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1895年通信录》,第7页。)

- ⑨8 J·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批判》,第46页。
- ⑨9 参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93页。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讨论的是“机器”。
- ⑩0 同上,第727页。
- ⑩1 以下参见沃科尔:《局内与局外》,第65~66页。
- ⑩2 对此,亚里士多德说过:“奴隶制可由这一点得到证明,而很多的陪审员却利用所谓的‘非法的控告’来反对这一原则。”亚里士多德随后饶有趣味地比较了“自然奴隶制”的原则(应用于野蛮社会)和将作为战俘的公民囚禁为奴隶的可能性,但是却证明了后者是司空见惯的行为。随后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不同形式的统治的性质,作为奴隶、非奴隶的依附者和其他(自由)公民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事实是(不像其他两种情况)统治是按照奴隶主的利益而进行的,只有个别情况下才考虑奴隶的利益。”参见E·巴克尔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牛津1946年版,第14~17页和第111~112页。

## 第三章

# 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社会学的基础？

### 导 言

对于许多全球化理论的拥护者而言,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性的后果》一书,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点。这也许不难解释:吉登斯确实如同其他当代思想家一样,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内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的是寻找一种潜在的基础以支撑通常较为偏颇的全球化理论的建构。的确,至1990年,对社会学理论之替代者的时空问题进行阐述,已成为他写作中的当务之急了。一段时间内,这已经成为社会学理论中一个正在形成的特色,而且其结果——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目前已经被充分发展,可以把“全球化”的范畴置于顶峰了,同时他也从多年的辛劳中圆满地获得了知识界的尊敬。吉登斯还对古典理论进行了特别权威与自信的批判,这部分来自于他早期作品的严肃阐述中。<sup>①</sup>最后,他对他的作品在社会学理论的知识高地上的本能定位,使他赢得了大量的关注,这类关注通常因为学科专门化的隐含界限而彼此隔绝。毕竟,一本将对专制主义国家形成史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与20世纪

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政治策略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书(如《民族—国家与暴力》<sup>②</sup>)，其出现频率能有多高呢？<sup>③</sup>批评家也许会对他轻率地出入一个又一个专业领域进行指责。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自己的作品也逐渐变得被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分子层的读者所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其他全球化理论的学者所不能匹敌的。

因此，罗兰·罗伯逊在这方面的著作，尽管在许多方面均很前卫，但在理论内涵上却不如吉登斯那么鲜明，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它在风格上更具沉思性，而并不具备多少知识上的计划性。<sup>④</sup>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马丁·奥尔布罗的著作比吉登斯也许更为雄心勃勃，但是它也相当不好理解。<sup>⑤</sup>大卫·赫尔德等人编纂的最新著作——虽然被詹姆士·罗西瑙欢呼为“全球化的定义之作”——事实上仍是描述性的，而且其理论定位总体上与吉登斯的作品非常接近。<sup>⑥</sup>正如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其他作品倾向于围绕着传统上对国家主权的命运的关注，因而在更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缺乏相同意义的通用。与此同时，齐格蒙特·鲍曼对这一争论的介入，虽然是生气勃勃，但只是衍生的和印象性的描述，也不成体系。只有在吉登斯当时的作品中，我们才能看到一种真正跨越学科界限的积累性理论目标与表述的无与伦比的清晰性的结合，这允许我们可以全力参与讨论。没有一本书像《现代性的后果》一样，作为社会学理论中的全球化理论的原始文本，如此广阔地发挥着作用。

因为这个理由，在这本书中，我们将通过对吉登斯的观念进行细致的、批判性的分析，来完成我们对全球化理论总体上的质疑。而且，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对下列关键点的简短概述。

在与我们关注的问题有关的范围内，<sup>⑦</sup>《现代性的后果》的论证分成四个主要步骤。其起点是宣称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

“高度现代性”的时代——一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经典社会学理论家均不能预见的社会。他们当时对现代性分析中出现的必然局限性，为论证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保障：古典理论中对社会的分析，现在应该被“时空伸延”的理论框架——即试图用“社会体系”如何不同地组织（并使它们自身超越）空间与时间维度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所取代。正是这一断言，成为全球化理论的必要基础，其正确性将在论证的第三部分尝试加以证明，这也是这本书阐述的重点。在这里，替代性的框架被直接运用于现代性的“全球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亲密的自我建构与世界范围内社会进程的重构交织在一起。最后，吉登斯转而探求他为任何进步的政治活动而重新解释现代性的实际含义，并且将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的信条与“新社会运动”的创造性机构结合起来，以便想像真正的后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轮廓。

然而，言及于此，我们应该看到这四个步骤在分析上的不连续性——如果要阐明论点，这种不连贯性就必然存在——在这本书自身的进程中并未得到维持。毕竟，步骤二和步骤三——替代性问题的定义和随之而来（逻辑上）的运用——并未清楚地区分开来。在相当程度上，在连续各章节中可以彼此交换的因素，以使论点的核心部分难以明确解释的方式来回交织起来。不过，虽然存在困难，想要明确解释论点并非不可能。因为事实逐渐变得明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十分简单：吉登斯越是深入地把时空伸延作为一种替代理论加以运用，那么它对于已经得到确认的社会原因的虚化世界的影响就越大。这迫使它必须不断地对原初“问题”作出回溯性的修正，以便把一种人类的内容重新注入以别的方式包含人的因素的分析中去，这种方式日益受到非个人力量和似乎已呈现自身生命的实体的影响。也许并不令人奇怪的是，步骤三不能中止在步骤二中就已经从分析上得

以巩固的东西,原因在于它们都不能使自己摆脱步骤一中已经假定丢弃的材料的纠缠,从而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说,当吉登斯(在第二章中)揭示其现代性的机制分析之时,它所包含的大部分是传统的混杂物,而不仅仅是它所限定的时空问题。

因此,无论从哪一端来说,新的社会学理论的时空问题都将证明是处在一种持续的和不可避免的内向爆炸状态中。在它的正面,它向外延伸以构建关于世界的坚实解释,这些解释因为缺乏人类社会内容而趋于崩溃;同时,在另一端,它本应该使它自己与早期的社会理论分离开来,但是其范畴又被吸收到削弱它自己断言的基础中去,即断言它已经与过去决裂并建立了新的知识论证。

人们可能会争论说,这一困境并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它归因于吉登斯作为一个理论家个人的失误。相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对于这个在知识界占有相当重量的问题比其他任何作家做的都要多。其原由,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作为社会理论的时空整体观念的根本不连贯性,反过来,这一观念又是更为广阔的全球化理论计划逻辑上所依赖的基础。因此,只要这一主题的作家们约束其理论断言,以便使“全球化”恢复其原初的、纯粹的描述性特征,整个问题就会立即消失。然而,既然这不可能出现,我们就必须坚持到底,并尽力详细地证明:即使是全球化理论最著名的倡导者,在他被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提供了这一理论的最根本基础的作品中,也同样不能逃避该理论在其参与计划的每一个构建阶段时都必然会出现的矛盾。

这一章的下面五个部分将分别分析如下内容。在“形成断裂”中,我们将批评性地探讨吉登斯的断言,即“高度现代性”的全球世界要求与古典社会学理论做知识上的断裂。在“前进还是后退”一节中,我们将质疑,他开始构建时空替代范畴的理论框架时,是否如他所希望的,引导我们超越古典理论的界限;或

者,它们是否是后者深邃的洞察力的一个后退。在“队列中的困惑”一节中,我们将剖析一个主要的例子,以证明一个我们在总体论述的诊断中已经预言的、两端并存的内向爆炸。在“论证的重组”中,我们将在阐述过程中描述这一争论经常遭受的、最具重要意义的“回溯性调整”,我们将指出,这是一种接近于解救整个工作的调整,并且对全球化理论更为普遍的基础作出调整。解救行动的错误运行将是最后一部分——“时间和空间在捉迷藏”中的主题。在结论章节中,我们将努力解释,一旦这种错误运行启动,整个知识体系也就崩溃了,并解释这种崩溃对于全球化理论总体而言的含义。

## 形成断裂

所以,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吉登斯说:“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sup>⑧</sup>对于这个开场白,他立即附带了两个断言。首先,这种新的社会生活模式与过去的历史先例如此根本地不同,以至于它们的出现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根本的不连续性——一种其真实规模通常因为历史变化的“社会进化论”观念占优势而要被贬低的进程。其次,现代性所包含的历史性断裂可以用其效果来加以描述:是一种社会变化步伐的加快(与前现代社会做对比),是一种变化范围(朝向全球化社会关系的整合)的地理上的拓宽,并且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生活机制的质的发展。后者当中主要包括民族国家、工业化和物质产品即人类设施的商品化。这些机制形式,连同现代生活模式总体上的动力性和扩张性,不仅来源于现代时期物质进步和认识论上的进步,也来源于现代社会同样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险的规模和类型:政治统治的潜在集权化趋势,若隐若

显的环境威胁,以及始终存在的、通过工业化特别是核战争而造成的集体自我毁灭。

而且,正是在这里,考虑到现代性的“双刃剑特征”,吉登斯首次停下来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赋予我们的理论遗产的缺陷。他认为问题不仅仅是这些理论遗产未能“全面地预测现代性将可能出现的黑暗面有多广泛”[7]。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为了理解(或给与适当的考虑)生态危机、集权主义和战争的工业化而必须采用的诸多范畴,并非简单地来自于那些早期的理论。而且正是这些缺陷,反过来促使他探讨了一系列充斥在那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的假定。他认为,那是一些随着现代性条件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显得滞后的假设。

首先,在今天,早期的理论家和基于他们的思想传统,都“倾向于一种单一的、超越一切的转换机制,以解释现代性的本质”[11],无论它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杜克海姆的工业主义还是韦伯的理性主义。他指出,终止这些彼此排斥的断言之间进行的毫无成果的竞争的时候已经到来,因为“我认为,现代性在机制这一层次上是多元的,而且每一个要素都因各种传统扮演的角色而得以说明”[12]。

其次,古典理论和它的拥护者们,在他们的主题涉及的范围內,把现代性的一个关键特色内化和自然化,而这本来是需要解释和问题化的:社会学作为“对社会的研究”的定义,假设了社会体系的地域界限,这既对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又因为它有可能忽略重要的跨越现代国家政治界限的社会体系而产生了严重的误导。

最后,吉登斯批判说,古典社会理论未能理解它自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学知识反映论的重要意义。启蒙运动对社会世界的巨大知识能够直接转换为人类历史提高了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信仰,已经确切地被证明是幻想,因为在现代社会的再生产

中,知识呈现出科学的形式和构成性角色。这首先动摇了哲学基础上的确定性的可能性,并使所有知识都成为暂时的。另外,这也同时使知识的内在不稳定机制固定下来,成为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中心。

吉登斯接下来提出的“与现存社会学前景的分裂”[16],的确是根本的分裂。他争辩说,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本不应该首先用与之相联系的物质关系或信仰体系来确认,而宁可这样进行分析,即阐明“社会体系”用何种方式在数量上(意味着它们使社会关系超越时空维度的程度)和质量上[意味着社会体系如何多样地组织时间和空间“以联系在场(presence)和缺席(absence)”]来使“时间和空间”结合[14]。用“社会体系”来代替“社会”,将使社会从关注于“有界限的实体”中解放出来,并使向大片时空地带伸展的现代社会关系可视化变为不可能;与此同时,对时间和空间的再次关注揭示出真实的、深刻的不连续性,这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这就是吉登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倡导的“时空伸延”的普遍理论。正如我们所知,这也是全球化理论的逻辑前提。

在探讨吉登斯如何进行他所建议的理论框架的转换之前,我们应该停一会儿以更仔细地研究他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因为他自己似乎觉得,下面的建设性论点,在某些关键的方面依赖于对古典学派批判这一前提。而且,他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对过去20年的批判上来,每次都以之为“跳板”<sup>①</sup>来再次用更进一步的形式发起他的争论。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一跳板在知识上是可靠的。但果真如此吗?

这个跳板有五根铆钉:对社会进化论的指责,低估现代性的“双刃剑”特征,依赖机制性解释的单一维度,作为地域实体的社会的自然化,由于未能正确理解现代性的反思性特征而过分依赖于“天意观”(providential outlooks)。让我们依次来考虑这

些问题。

首先,认为马克思在“社会进化论”的潜在影响下,低估了现代性转换这一过程相较于其他历史转换过程的激进本质,这是否合理呢?几乎不是如此。正如我们以前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非常肯定这种巨大断裂,现存的整个人类社会因此被分为两大范畴:前现代社会(通过“人身依附”关系而组织起来)和现代社会(通过“客观依附基础上的个人独立性”而组织起来)。<sup>⑩</sup>结果是,他通常被指责犯有相反的错误,即过多地单独运用“前现代社会”的概念。<sup>⑪</sup>但是,这个观点从总体上来说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杜克海姆的社会理论的知识轴心,因为只是区分了机械与有机的社会形式,只能运用于现代性的转换过程,因此自动地使所有其他历史转换过程相形见绌。至于马克斯·韦伯,用他自己的解释说,他关于世界宗教的全部比较社会学,最终均不能以其自身的方式来理解非西方文化,其全部功能是使一种文化的地位非常突出,这就是现代西方文化。这些论点无需进一步阐述:现代世界的激进断裂性远未在社会进化论的潮流中解除,而且成为古典社会学理论清楚的、公开承认的困扰。<sup>⑫</sup>

第二根铆钉中同样存在着这类问题:吉登斯断言,现代性通过要求对古典理论进行根本修正的方式证明了“双刃剑现象”[7]。对马克思作这样的断言是非常奇怪的。因为现代历程中的内在二元性的观念(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矛盾的观念),同样是他的整个作品中最熟悉的、反复出现的隐喻。自由的形式同样也是不自由,制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贫困,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类力量的无限扩张与人类自身控制力的集体丧失并肩而立——所有这些悖论,都是马克斯对现代性分析的核心。正如马歇尔·伯曼指出的:“正如马克思所经历的一样,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是,这种生活本质上是矛盾的。”<sup>⑬</sup>

并且这个例子可以再一次引申。因为伯曼指出,这种矛盾的感觉使作为整体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与后来的非此及彼的传统区分开来:

我们 19 世纪的思想家,既是现代生活的热情拥护者,又是它的敌人,他们永无止境地与现代生活的模棱两可和矛盾性搏斗;他们的自我讽刺和内在紧张是其创造力的首要源泉。他们在 20 世纪的继承人却步履蹒跚地转向了僵化的极端化和刻板的集权化。<sup>⑭</sup>

吉登斯的第三根铆钉最初似乎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他宣称古典理论家试图用诸如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或工业主义等“一种单一的、超越性的转换机制”[11]来理解现代性。我们已经看到,他在坚持“在机制水平上的多维度”[12]。这种对因果关系的多元性的大胆断言是具有欺骗性的,它实际上并不能比斜体字做得更多。让我们暂且来看一看。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断言早已经成为马克思和韦伯理解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正如吉登斯自己后来顺带指出的一样[56]。机制水平上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定义的核心。而且对于韦伯而言,恰恰是日益增长的机制“领域的差别”和它们的相互不妥协性构成了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进程的理性主义的主要结果。因此,使机制的多维度与任何“单一的超越一切的动力机制”对立,在逻辑上是错误的——除非某人理所当然地从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定义为机制的单一维度。然而,在这件事上,结果性的批评是不能对准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由于上述理由)。

其次,吉登斯的限定语——“在机制的水平上”却含蓄地使现代性在另一种更深的层次上确实成为单一维度的。至少,它暗示着关于现代性的不同维度如何相互关联的解释,有可能成为现代性为何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开始的解释。

无论如何,如果吉登斯把现代性解释为是由彼此不能复归的机制形式的多元性组成的,那么这种解释本身就不能够成为与古典传统断裂的理由。因为这种多元性确实实地因每一个作家强调不同的机制因素而曾被集体地提出来过。所以,如果一个人宣称与作为整体的传统决裂的话,则理由只可能是试图通过引进一种新的“单一的、超越一切的转换机制”,来再次将某种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加于人。而且,人们不得不感到疑惑,时空伸延是否能在吉登斯的解释中逐渐起到这种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与现存的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又有何不同。

这里只剩下两颗铆钉还能使跳板恰如其分:断言古典理论使由民族国家向作为有界限实体的根本性社会概念转变的历史性短暂经历具体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古典作家无视知识在现代性条件下的特别反映的进一步指责。

现在,确实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实实在在的有一种断言的东西。马克思之与黑格尔决裂,是围绕着后者的非历史性和对现代国家的崇拜,他在1844年坚持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避免使社会‘物化’”,而且他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宣称有界限的实体不复存在又对此进一步作了阐述,这难道还不够吗?事实上,马克思处在一个与吉登斯指责的位置之相反方面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如此不受有界限的实体的束缚,以至于忽略了民族国家的真实历史重要性——这种指责在吉登斯的早期作品中,曾经给与过马克思。<sup>⑮</sup>

对于古典传统缺少现代反映论的观点,人们必然会怀疑为什么韦伯的作品不能证明这一点。<sup>⑯</sup>韦伯在把社会学定义为一种“文化科学”<sup>⑰</sup>的道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这种“文化科学”是指理解不同的世界观如何用对照的形式表达出来,上述形式反过来不仅控制着行动的背景,而且控制着能够感到人类存在有意义的方式。并且在对这种普遍社会知识之反映的肯定

中，“特殊的西方形式的理性主义”之影响构成了他全部世界宗教比较社会学的核心。这种文化的发展在以后的时间内导致了社会知识的传播，韦伯认为这是不受控制的官僚主义、善于预测的行动形式的传播和“科学”世界观的兴起契机——这还包括社会进程的非个人化和无理由的形而上学真理的主观属性。因此，吉登斯关于启蒙运动的诊断——仍然有一半陷于“天意观”之中——对于马克思、韦伯来说并不新鲜。的确，对于他来说，“初现端倪”已经“不能挽回地消失”了。<sup>⑩</sup>而且他并未试图用一种新的人类自我掌握的幻想来替代上述论断，他已经在他对现代性的定义本身安置了对现代知识形式的特殊反映的文化预言。这毕竟是他通过不断地观察我们所生活的“一个吞噬知识之树”<sup>⑪</sup>的时代而得出的结果。

考虑到这些，我们也许不禁疑惑，为什么吉登斯竟然轻而易举地断定，集权主义、战争的工业化和生态危机不是古典作家所讨论的范围。因为，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已经有力地论证过的，官僚机构理性的自然化以及它与领袖魅力（这确实是使集权主义现象不可理解的一个例外）实实在在的对立，并不是韦伯本人的成果，而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家对韦伯的范畴进行选择 and 适当变形的结果。<sup>⑫</sup>同样，如果一个人准备对生态危机说点什么，就必须把共产国际的生产狂热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式，这种狂热是受工业化落后的意识形态所驱动的。但是如果解决方法的中心（正如吉登斯所持的观点），是一种“社会化自然”的概念，一种人为地转换环境；这种转换又以有意无意的方式反馈为作为种群的人类的自我创造动力。如果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看不出来生态危机是如何提供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据，后者的本体论也许确实是惟一的与我们想要的东西相对应的。<sup>⑬</sup>

什么能够解释吉登斯对古典社会理论陈述的显著错误

呢？<sup>22</sup>这种显著性并非是得自他自己早年试图把传统从错误陈述中拯救出来的行动。我们首先应该排除用智力上的无能或学术上的恶劣信仰来解释。这两者都不能应用。如果我们注意吉登斯自己的批评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条线索，虽然一处的误导无论如何也不会使别处有价值的目标丧失。总而言之，在吉登斯学术发展的不同点，他用了不同的进一步学术重建的跳板，在他后来的出版物中这种断言和再断言是他的特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错误，而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一种“正统共识”（orthodox consensus）——塔尔科特·帕森斯在这方面占主导地位。特别是，这一学派被控犯有进化论和不能掌握理解社会生活的反映论的错误。<sup>23</sup>1971年，吉登斯在一本书中援引马克思对作为一种超历史错误的社会进化论的反对，<sup>24</sup>并指出回归古典传统是与这种共识断裂的必要步骤。<sup>25</sup>然而，至1984年，当他开始正式宣布他的结构性理论之时，他却不仅回转过来与（现在已解体的）“正统共识”交战以作为他的论述的起点，而且把古典作家的遗产也列为他批判的对象。“那些把他们自己既视为社会学家又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倾向于采纳功能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假定”，这些战后时间内的观察结果，已经滑向了最初加以防卫而逐渐不予争辩的断言，即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进化论的翻版。<sup>26</sup>

因此，事实似乎是这样的，最初用古典传统反对战后美国社会学的行为首先转向了并非没有道理的断言，即它们日后的追随者已经在方法论上被“正统共识”吸收了进去，后来同样的“正统共识”的要素又被吸收进古典传统本身，依次重复而告终。<sup>27</sup>

至《现代性的后果》一书，这种干涉知识历史的行为再次被淹没，而且吉登斯似乎又单独与古典传统站在一起。然而这在

揭示“压制的反弹”(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形式中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吉登斯开火都开错了方向。他不仅断言古典社会科学是不能证实的,而且无意中降低了对本应该成为他首要批判目标的那些论述的防卫。很明确的是,当他的论证发展之时,帕森斯理论体系的异化范畴不再明显地跃过他的视野,而是仿佛从后面支持了他的分析。<sup>28</sup>到这个时候,吉登斯就无力抵抗甚至无力感知到这种渗入了。因为证明和逆转这种渗透的钥匙恰恰埋在古典社会理论中,而他一开始就把它丢弃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记住这不是吉登斯一个人的问题。尽管对他而言(正如它们在吉登斯早期的、前全球化的作品中显示的),它们最初并非是由全球化理论制造的,但对古典传统的某种拒绝却可以归因于试图巩固作为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全球化理论的行动。为了从全球化的描述特色中得出解释性的机制,就必须(或者是通过)制造关于时空的因果重要性的断言,以直接对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和韦伯的“文化科学”的前提。这可能确实如此,比如,在鲍曼的作品中就有过暗示,他写道:“不断进步的交通方式标志着现代历史”<sup>29</sup>——选择这种词汇可以肯定是为了与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同类语对立。

## 前进还是后退？

现在该建构理论部分了。在发表了他的批判意见后,他又从何处开始构建他的理论框架的呢？

与他早期的方法论建议相一致,他通过在现代和前现代世界中建立一个描述性对比开始他的论述。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彼此不可分离,而且(或相当程度上因为)两者都不可能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及由它们设计运动方向的行动中分离出

来：“什么时候”总是普遍地要么与“什么地点”相联系[17]，要么由自然的事件所确定，而且空间也并非是被运用一种抽象的、单一的标准来想像和规定，而是运用“地点”(place)这个术语来规定实实在在的社会活动场所。因此，正在出现问题的是独特的现代概念：一方面是“虚化时间”，另一方面是“虚化空间”。因为正是这两种概念的相连出现，使得人类经历的时空维度被置于一个分离的想像栅格里，在那里，社会关系能够被自由地重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可以被衡量和协调。这种独特的现代时空的必要历史条件是由早期的现代发现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前者促进了地图绘制上试图根据抽象的、全球空间本身的地理划分来表述世界区域的形状划分，而后来，工业革命时期时钟和手表在整个人类中的扩散，则建立了一个有可能不依赖于任何发生在其间的事件的时间框架。

吉登斯指出，空间从时间中产生的分离，在三个方面“对于现代性的最终动力性是至关重要的”[20]。首先，它所创造的协调社会关系和活动的的能力确实超越了大片时间和空间，而成为“脱域”(disembedding)过程的先决条件；“脱域”使社会关系超越纯粹的地方背景，并把它们与无限的地理范围的更广阔结构再次联系起来——正如它后来所呈现的那样，是全球化的最终先决条件。其次，同样是时空分离巩固了人类机构主导形式的存在，这种形式在新的媒介——“理性化的组织”[20]中形成并运作。毕竟，官僚计划依赖于在特定时空结构——时间表、工作日程，等等——中的人和事的预定秩序。最后，一旦时间从地点中抽象出来，并被再次想像为始终如一的、线性的和虚化的，则它不仅能够开辟预测性操作的未来，而且能够开辟作为“历史”的“统一过去的专用”[21]——“虚化时间”因此巩固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历史性”[20]。

那么，是什么在造成和维持处于上述过程中心位置的社会

关系的“脱域”呢？在论证的这一阶段，吉登斯提出了两种客观标志：“象征性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以及一种主观的指向：“信任”（trust）。

象征性标志被定义为“能够在各种特定情况下被‘传递’的交换媒介，而无须考虑到处理它们的个人或团体的特征”[22]。这样一种定义最明显地指向了钱。虽然吉登斯也曾暗示（但没有解释）其他象征性标志的存在（“比如政治合法性的媒介”），但确实是钱被吉登斯选来表明他的论证。他问道：“什么是钱？”他的答案如下：钱，无论是它的早期形式，还是它的最新形式，本质上是债务（而且也因此同时是信用）。它是物质债务的象征，该债务在事物交换过程的中途介入，并且因此使它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被延迟。直接的交换首先让位于“商品货币”，然后让位于由银行组织维持的借据，再后则让位于政府控制的国家货币，最后让位于“在计算机打印输出中出现的纯粹信息形式”[25]。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性质是不变的：以数的形式使物质债务具体化，钱使交换过程从受时空限制的交易过程中解放出来，并允许它无限制地超越时间和空间。它使交换过程实现脱域。

专家系统也使社会关系从地域性的时间和空间中解放出来，但它们的着眼点比物质交换更宽阔。专家系统被定义为“熟练的技术或者专门技术的体系，它们组织着我们今天生活的绝大多数物质区域和社会环境”[27]。更为特别的是，它们包含着特殊的知识——从法典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以及这些知识借以干预自然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组织机构。当我们考虑在结构性的环境中现存社会成员“几乎被专家知识所渗透”[28]的程度，它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日常涉及个人的行为，诸如开灯、驾车，均依赖于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和社会规则，它们均超越了个人直接的生理经验或头脑意识。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专家系统控制着当地事务和个人的相互行动,同时它们自身又从当地地域中抽象出来,而且受着非个人准则的规范。

考虑到脱域倾向于产生依赖于知识结构和相互行动的常规,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能控制的甚至是不可知的,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吉登斯对于探究现代性脱域机制的主观维度也很感兴趣。这就带给我们他对信任的探讨。他用这个词来表明一种高度特殊的现象。在这个背景下,信任是一种现代性的世俗化本体论的心理沉淀物。对于把神明或自然注定的原由作为社会解释基础的信仰之下降,与日益增长的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日渐复杂的专家系统的运作来再制造的意识——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使人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意外事件的种类发生转换。而且这种转换反映在理解意外事件的主观形式的相应转换上,逐渐用“风险”代替“幸运”。个人面对的挑战逐渐变为人类体制和行动的有意无意的结果。而且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可依赖性的信心,现在都采取了一种信赖—信任的形式,无论是在体系中得以具体化的抽象原则中,还是在吉登斯后来又转回的论证之中。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停留片刻。应该记住,我们正伴随着我们的作者阐述他的“现代性的全新特征”,这是在有意识地与传统的视野断裂。因此,利用机会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目前为止所占领的阵地,似乎是很有理由的:我们究竟已经远离被丢弃的古典范式多远了,而且是在什么样的方向上?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象征性标志”的概念,吉登斯已经将之运用于分析钱上。

众所周知,在钱的问题上,马克思并未保持缄默。的确,《资本论》的前三章主要是致力于对“金钱的魔力”<sup>③</sup>的解构。这种解构的目标在于,揭示钱作为一种事物——最重要的是作为价值和贮存单位的替代物的角色——的显而易见的内在技术

特性,是如何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特殊人类关系的自然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根本批判,是坚持使这些自发的特性具体化,把它们归因于通过它们得以运行的物质客体,而不是把它们追溯到普遍的人类关系本身。

事情就是这样,显而易见的是,吉登斯能够持这样的观点(更不用说马克思),即“由于它作为‘纯商品的角色’……金钱使任何事物的交换成为可能”[22]。这种公式非常危险地接近于马克思试图推翻的崇拜形式。他写道:“并非是金钱使商品可以被衡量。恰恰是相反的。”对于他来说,金钱的替代物——远远不是原初的交换的促进物——以最明显的形式造成了商品本身的内在迷惑。也就是说,是“价值”这种无论如何也不能物化的东西能够等同交换,而且它是否是在金钱当中才发现了它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呢?或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崇拜之谜也就是商品崇拜之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就变得可视和耀眼了。”<sup>③</sup>

对于没有时间检查吉登斯的引证是否确切的随随便便的读者来说,<sup>④</sup>同样也不会意识到把金钱描述为“象征性标志”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章中详细考虑(并否定)这一主题的几种研究方式之一。他写道:“通过这种方式,启蒙运动致力于(至少暂时)驱除他们所不能破解的人类关系所呈现的神秘形象的表面奇怪之处。”<sup>⑤</sup>他论证道,把金钱描述为一种符号,至少“包含着对事物的金钱形式外在于事物本身的怀疑”。但是它在揭示社会学是如何提到“金钱”和这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本身”上,却什么也没做。而且即使没有这些,金钱所具有的使它成为如此有力的现象的技术性特征,也使它对于社会学的质问有了免疫力。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对一种真正的有关“价值”的社会学理论的需要,就比马克思时代更为明显了。因为正如吉登斯所说,“今天,‘金钱的特性’不依赖于它所代表的手段,即

采取了计算机记账中的纯粹信息形式。”[25]那么,“钱”又是什么呢?吉登斯的回答是:“发展了的钱的形式是……最重要的是以信用和债务的方式加以定义的”[24]——这又引起其他问题:什么信用和债务?

现在,澄清在这一批评中什么处在风雨飘摇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马克思或吉登斯是否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对金钱的技术分析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它更关注的是,现实的特殊社会结构以何种深度进入到我们的经验世界的整体概念——而且,相应的,关注社会理论所包含的最终可能性和要求。

在马克思的事例中,对于其《资本论》的早期篇章中闪烁的智慧的火焰,主要来自于其试图回答“什么是价值”。他已经揭示了埋在现实结构底层的社会决定论的层次,这比其他任何早期作家曾经想探究的做得更多。现在已经证明,甚至于价值的客观性也是特殊历史种类的社会关系的编码形式,等着被与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客观化的评论相合拍的理论所解密。因而,马克思的论证方向与吉登斯归结于他的并且后来自己也采取的方向相反:即考虑到钱的内在技术特性,不是它被用于解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相反,金钱的技术性质被揭示为,它们自身是社会关系的本体论前提的具体表现。而且尽管这层关系(也就是说,商品与货币)的事物运动确实有其能够以“经济”这种自我封闭的形式追溯和系统化的技术上的规定性,但现在在原则上阐述一种社会学的替代理论已经成为可能,这种理论把事物的技术特征最终理解为一种特殊人类代理机构的历史形式的自在特性。

因此,在阐明这一论述时,马克思不仅发展了关于金钱的特殊论证,同时还扩展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学理论的解释性断言。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通过价值理论,为社会学理论抓住了“经济学”主题的论点。而在吉登斯(通过把钱具体化)不假

思索地折回论证,并对于隐含在“象征性标志”的原帕森斯理论中肤浅的社会本体论洋洋得意之时,<sup>③</sup>我们只能以怀疑的目光拭目以待。

因为通过把象征性标志定义为“能够不考虑个人或集团的特殊性质就能被‘传递’的交换媒介”[22],吉登斯已经开始把象征性标志从它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它们的社会结构中抽象出来。这是致命的一个步骤。因为,金钱(或者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社会创造物)“不考虑个人或集团的特殊性质”而流通,这是不真实的。为了使金钱按照他所描述的方式流通,他至少假设了一种社会生活的偏颇的商品化。很明显,它们是某些“集团”而不是其他集团的特殊性质。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历史的普遍现象。对于这,吉登斯也许回答说,他正在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中描述这种象征性标志的角色和特性,这一范畴不是意在超历史地运用,它的历史特殊性在这种意义上被当做已经给定的。麻烦在于,恰恰是社会现象的“给定”,使它们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且在这个事例上挡住了社会学探究的进一步道路,因此它允许从这个“标志”的显著行为特征中得出的结果,以一种非人化的、纯技术性的现象出现。

如果为吉登斯辩护,就必须指出,他这里的目的不是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基础,而是指出它对于社会关系的脱域以及它们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结果:“金钱是时空伸延的方式……通过即时和延迟、在场和缺场的结合,(它提供)了一种包括时空的方式。”[24~25]因而,它也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关键条件。然而,当他假定这些发展了的交换关系的时空含义对于马克思关于这一进程的解释也不是中心时,就又显得很荒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章中写道:“流通超越了直接的商品交换所加诸的所有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障碍,而且它是通过把这件事中个人产品的交换和获得别人产品的直接在场加以分裂来完成

的。”<sup>⑤</sup>因此,马克思和吉登斯的解释中最主要的区别,不在于马克思较少关注交换所涉及到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在于他试图找到为什么它们作为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的自然属性而兴起的,而非赋予它们技术性特征:

考虑到流通的代价,产品越是依赖于交换价值,交换的物质条件——交流和交通的方式——就越重要。资本被其本性驱动超越了地域障碍,因此,交换的物质条件——交流和交通的方式——的创造,时间和空间的消灭,变得特别必须。<sup>⑥</sup>

而且,这也许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分析对于所有问题而言,都天衣无缝地发展成为通过物的运动阐述的对人的权利关系的探究;同时,正如我们后来将看到的,吉登斯的解释越来越构成一幅图景:一边是人,另一边是非人化的体系,在这当中,权力自身不再是组织化的范畴,而被纯粹的技术化的“风险”(risk)变动所取代。后来他所做的关于权利不平衡的断言来自于他的中心论点之外,而且必须从外部加以支持。[参见第154页]除了将帕森斯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以外,吉登斯很少在他的作品中引用帕森斯的观点。并且如果吉登斯真想提供“一种现代性的全新特征”的话,那么他必须将帕森斯拒之门外。然而,从一开始帕森斯就转身将一只脚踏入了他的门槛。

《资本论》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中心论点是如此地反直觉,以至于它一开始可以被理解,很快却又会被忘记,在永无止境的相互抵消感觉的溪流中进退两难,这些感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构成每天生活的经验。而且人们发现他们自己会问,自从吉登斯最后一次阅读那些章节之后又过了多久。<sup>⑦</sup>

然而,这些论证并非只依靠象征性标志,还有“专家系统”,而且这带给我们令人烦恼的吉登斯和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之间

的关系的问题。因为吉登斯自己后来详细地确认了,韦伯在描述现代性的特征时曾给与专家系统的作用以特别的关注。他说:“在现代社会学的三个奠基人中,韦伯最清楚地看到了专门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用它勾画出现代性的现象学轮廓。”[137~138]这确实是真的,而且正是由于吉登斯才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现代性的全新特征”呢?答案是吉登斯相信他自己在他的新理论基础之上,能够理解不能用韦伯的范畴领悟的、有关现代化的关键之处。因此,我们必须要问:吉登斯看到了哪些韦伯不可能看到的东西?让我们来考查一些证据。

吉登斯断言“专家系统”对于现代性而言,比韦伯认识到的更加独特,更占主导地位,更重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韦伯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已经很极端了:

没有一个时代曾经经历过与现代西方同样意义上的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特别训练的官僚组织系统,这个系统是政治、技术和经济生活的整体存在。<sup>③</sup>

也不能断言,通过使用“官僚”这个术语,韦伯更为强调国家组织而非其他。他的关注点很确切是在“专家系统”本身。“对于官僚系统的特征而言,无论作者叫它‘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不重要。”<sup>④</sup>但是可以说,吉登斯的“专家系统”范畴,更多的是指官僚系统中的个人的组织化结构,它也包含着特殊知识体——技术上的、法律上的,甚至哲学上的,它们被专家用以调节、安排世界,而且它们充满了现代性的日常生活经历。韦伯的“理性主义”的范畴也可以同样这么说,这个术语包含着科学的专业化——这被理解为发展中的官僚组织的社会形式之知识上的相应部分。韦伯也看到理性化进程的结构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并非是透明的:

它意味着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生存的生活条件

比一个美洲印第安人或一个霍腾都人有着更多的知识吗？几乎不是。除非一个人是个物理学家，否则当他驾驶着一辆车时就不会对这辆车是如何发动的有概念。<sup>40</sup>

他看到，这实际意味着一种新的主观指向——“信任”——基于对能够在原则上用世俗的方式理解自然、社会世界的信仰，至少，正如驾驶车辆的例子所显示的，它们已经逐渐地处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之下。韦伯也看到，这种新的主观指向与现代性的关键机制形式——资本主义市场和法制体系相适应。他看到，在行为上，这些形式的实质是迫使个人按照理性方式的压力行动——“每件事均按照平衡来行事……每个单个行动下均包含着预测……确切预测成为每件事的基础。”<sup>41</sup>而且他看到，这种行为方式后来又反应成为理性化的科学分析的目标，而这些科学分析又会反馈到它所描述的社会现实再构建之中。最后，在他那篇“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的演讲的最后，韦伯已经完成了剥去理性化知识不能再扮演的所有社会学、哲学的可能角色，只保留了诸如“风险分析”等角色。<sup>42</sup>事实上，韦伯甚至分析了反映论和先验论系统的特殊相互关系，与吉登斯最感兴趣的篇章——交易市场相对。而且他论证说，现代社会条件使这种现象对于“其他行动的所有范围”也普遍化了<sup>43</sup>。

是吉登斯在简单地重复韦伯吗？不是。正如他超越马克思的企图把他远远抛到后面一样，因为他复制了《资本论》从一开始就推翻了的具体化，这里的事情也是同样的。古典理论家关于现代世界有更多、更深的东西要说，远远超过一般人从《现代性的后果》中猜测到的那样。

为了了解问题可能是什么，我们必须探询韦伯全部作品的核心是哪种论证，正如我们探询马克思的作品一样。我们可能从一开始起就忽略了最普遍的误解——韦伯通过与仍陷在宗教

泥泞中的其他文化作对比，把欧洲“现代性”归因于它更理性或者理性化的特征。他多次坚持，因为理性主义“是一种涉及整个世界不同事物的历史性概念”，而且这些事物甚至可以包括“神秘思索的理性化，这是一种态度，从生活的别的方面来看，是一种特别的非理性”。那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而恰恰是“西方文化的特殊和特别的理性主义”成为质疑的真正目标：“因此我们首先致力于努力解释西方理性主义特殊性的起源，以及在这个领域内现代西方形式的理性主义。”<sup>④</sup>

在第二次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理性和宗教的对照——也许是理解韦伯真正达到什么地步的惟一最大障碍——被进一步打破了。因为在这里，“起源性”的分析导致了一个明显的矛盾结果：现代性的世俗化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起源被追溯到特别的宗教发展。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世俗主义的历史世界证明是缘起于宗教信仰的特殊形式。但是，这里面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在第三次阅读时找到优先点，它们把韦伯的世界宗教的比较社会学作为他的作品的关键点。因为随着这一转移，西方理性主义最终就可以分析了，可以被理解为并非宗教的对立物，也不简单地是宗教的异想天开历史造物，而是世界宗教自身的特别和特殊形式——意味着定义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历史方式的机制形式和智力形式的合成物。

重新发现在这种方式上作为一种文化特殊性的西方的“理性”——而且，并不解除它的认识论上的断言<sup>⑤</sup>——是一种真正的成就。因此，西方的理性主义不再是“文化”的历史出口，而是可以借助于这种特殊文化方式涉及到的人类内在意义的压力来加以分析。这又反过来使我们在纯粹技术现象（诸如组织的官僚形式）的表面下，再次把它看做最明显不可能是的事物：人。血肉之躯的人类成了试图解释现代性的明显非人化的、异

化的社会形式的核心了。然而,吉登斯的方向再一次使我们翻转了古典作家的视野。由于未能把“专家系统”从历史文化中明显地抽象出来并加以问题化,他不可避免地把它们的特性再自然化,通过把它们深层的、人类学的质疑作为解释基础而逐渐封存。这种进程的最终结果在《现代性的后果》的第五章中变得完全明显了,至那时,抽象系统的广阔人类问题以纯粹的技术形式——因“知识的传播”而复杂化的“设计错误”和“操作错误”——再次出现[151~153]。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样一种隐喻仅仅是在认知水平上复制了已经建成自身文化形式的人类机制的具体化,而且这是一种社会理论非神秘化和解释的目标,这再一次暗示了帕森斯理论深入地渗透到了他的论证的核心。

正如我们将要在后面看到的,吉登斯也尝试对官僚体系的人类经历再次专用化,但它是狭窄的、用已经外化的形式开始的人类方法论的那种。正如“标志”(定义为社会特性的抽象形式)的早期例子一样,这大部分是因为使官僚体系的机制形式问题化的最初失败,导致建立了一个基础,随之的关于其意义和效果的分析能够借此进行得很深入。

从其自身来看,韦伯关于官僚体系的分析似乎指向社会生活的日趋僵化,并强化了对有关“机械僵化”、“铁斗篷”以及其他残忍预言之印象的分析,都是真的。但是从这种分析自身来看,就必须将它从它所促进的、更为广阔的预测性理性分析中抽象出来——这种理性根植于韦伯视之为整个进程的终极原型和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原动力特性。而且,既然吉登斯比韦伯更乐观,那么就不能算做是对韦伯的分析的丰富,因为他并非建立在对韦伯的关注点的解析基础之上,而是仅仅建立在不能全盘采用它们的基础之上而已。

那么,与马克思的事例一样,韦伯的问题也是一样:他的方

式所能涵盖为社会学研究客体的现象范围，远比吉登斯的为广。而且吉登斯通过把官僚系统再自然化来运用他的“专家”系统的范畴，应该被看做并非是对古典理论的发展，而是从一个最深刻的直觉中的退却。

然而，马克思与韦伯不是惟一这样被批评的古典思想家。吉登斯运用其他作家观念的问题性本质，是第二手文献主要的甚至是不时令人尴尬的特征。<sup>⑥</sup>但是，既然对此完整讨论会使我们远离我们的主题，还是让我们集中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的另一个例子，一个直接与全球化理论有关的例子。我们在第58页被告知，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当他发展它们时就已经非常陈旧了”。似乎这个非同寻常的断言还不充分，吉登斯又跟之以一个总体战出现的例子作为证据，而丝毫不提及相当一批作家把这个观点的出现归之于克劳塞维茨的作品。在第75页中，他指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之过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有关相应学科领域的一个非常坦率的错误，<sup>⑦</sup>以至于人们会立即转向第183页脚注以发现所谓的“每个人”可能会是谁，结果只发现这样一句远远不能证实它而且还与之矛盾的话：“然而，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微妙的思想家，仍有许多有关他的观点的解释与今天有关。”微妙？“这个观点（即‘战争不能与政治分离’）即便是在总体战的年代仍将是不可避免的。”<sup>⑧</sup>难道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还不够明确吗？

在此，吉登斯的观点是如此闪烁其词，以至于人们不禁希望真能有人为他指点迷津，使他从陷入的不能自拔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到时，他本人也会感到某种解脱。毕竟，吉登斯的真正见解建立在对克劳塞维茨的粗略的阅读上，是让人很难满意的，这会使后者的真知灼见不复存在。

有些人也许会对这种错误解释的出现模式有所辩护。正如吉登斯热衷于指出的一样，社会科学本身包含着一个抽象的体

系,在这个系统中,信任是建立在对“专家系统”有关思想整体的知识可信度上的,这种思想的内容和判断超越了非专门人员的领域。在专家领域内,迫切需要在更为细致的咨询仪器的帮助下,用平等的相互批判性质疑来取代这种信任。《现代性的后果》缺乏这样一种仪器,也许缺乏一种合法的仪器。因为尽管它已经被告知其他知识分子,但是从对单个古典思想家的研究来看,这个理论的主题还是有参与者的。不过,这也意味着本书的断言是具有权威性的,所以就要求一种非常规的高度信任。如果吉登斯想写出韦伯从未提出过的社会关系的脱域、作为抽象体系的市场形式的非个人化,或者甚至是信任在结果上的主观性质,那么他当然可以自由发挥。<sup>⑩</sup>但是,迄今为止,他的读者们都相信他“专家性质”地批判了古典传统,那就必须指出他的这种批判帮了倒忙。然而,严格地讲,这个问题和我们都有关系,只要它似乎来源于寻求社会学理论的时空问题的迫切要求,而且在对待克劳塞维茨方面也很难判断。该论证更愿意扮演批判马克思和韦伯的角色,我们必须在进入到下一个论证阶段时记住这一点。

## 队列中的困惑

### 背后的混乱

然而,在这一点上,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始就预言,任何巩固社会学的时空问题的试图,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两端爆炸,具体的解释在正面崩溃,其理论的前提在背后受到外在概念的入侵。在前面讨论象征性标志和抽象系统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预料中的事情,正如这预示的一样,我们将在第三章一开始就看到随之而来的全面崩溃。然而,在我们到

在那里之前,我们必须经过它潜在对应物的显著例证:背后的分析混乱。在这一点上,事物的状态非常明显地处在人们期待发现的地方——在第二章对现代性的机制性定义的公式中。

在这个公式中,吉登斯重复了他试图推行的方法论上的转变:“社会学界对‘社会’这个表示有边界的体系的不恰当依赖,应该代之以关注于社会生活如何超越时间和空间——时空伸延问题——来加以组织的分析。”[63~64]但是,至这一阶段,无论是在术语学上,还是在时空伸延将扮演解释性角色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水平上,上述断言并不是确实正在发生的事实就已经很明白了。在术语学上,“社会”和“社会体系”的差别已经被迅速打破了,而且在实践中已经被丢弃了,导致了有疆界实体的名副其实的增長。“社会”、“国家”、“文明”、“民族”甚至于“地区”均愉快地跃然纸上。<sup>⑤</sup>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点上,所有构成现代性定义的四个机制已经被引进: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制和对暴力方式的集权化控制。不是每一个机制都是用超越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特殊秩序来定义的。相反,它们中的几个——特别是每一个——是用演进的、事实上又制造了吉登斯希望使之突出的时空现象的社会属性来定义的。

其中之一,也许并不令人惊奇,是资本主义。吉登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和工资劳动基础上的,并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商品生产的古典体系——并不是用包含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构建的。它当然显示出有巨大的时空结果:它具有“本质上的不稳定、不安静的”和“与生俱来的高度动力”[61];而且这些特性支撑着它的“扩张性特征”,既使它的“某些方面只局限于特殊社会体系契机”[57],又产生了基于“技术发明是会恒定不变并具有穿透力”[56]的事实之上的暂时动力。但是很清楚,时空伸延不是这里的出发点。相反,它是一个方法论前提——资本主义的物质理论——正在解释的东西。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字里行间中都被证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甚至降低了吉登斯极力将之置于现代性坚实定义的中心位置的因果多元性的地位。他把后者视为上述四个相互不可复归的“机制集合体”的连接点[55]。他相信,为了避免涉及到寻求“一种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联络点”的“缩减主义”,巩固这种多元主义是必须的。而且,通过第二章第一部分的结尾,读者已经知道,资本主义产生工业主义[61];由现代国家控制的暴力垄断与劳动进程中的力量的挤压有关,这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了的“阶级统治的本性”[62]决定的;而且,产生现代主权国家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的“隔绝”,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机制特征”[56]之一。

考虑到四种机制的集合体被认为在知识上是等值的,则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的作用(这不是以另一种方式运行的决定论的翻版)也是显著的。更为显著的是,甚至于在注定要遇到这种限制的地方,由吉登斯提出的其他现象,仍然不是他根据时空的方法定义或解释的那种现象。外部概念的吸入在加速。他坚持说,从最重要的例子上讲,“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它们行使主权的能力。”[72]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现代主权国家涉及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这样一种断言能够被用于描述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而论证却仍然必须进行,需要解释为什么时空会提供分析的起点——而非主权国家用这种方式来重构时空。

吉登斯立刻尽其可能来翻转这里暗含的东西,他在这一部分的结论处重新确定,“在机制整体的背后,埋藏着现代性区别于早期时代的三个动力源泉:时空伸延、脱域和反映。”[63]但是这没有用:他自己阐述的整个力量表明,事情走上另外一条路了。在现代性的机制定义的关键层次上,基本的方法论上的转变要求给尚不能简单地作为解释范畴(而非是平直的、描述性的范畴)运行的“全球化”以根据。

现在,吉登斯关于四种机制集合体本身的出现依赖于涉及到时空重构的早期历史转换的辩护的断言,可以断定是不对的。但是,除非有人打算(正如他的理论和“动力的源泉”这个短语所包含的)根据因果关系从中得出现代性的机制整体,则这种断言仍然是当代世界之非决定性的解释。毕竟,马克思用同样的方式坚称,“几千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都涉及到甚至是最原始的商品交换体系的出现,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放弃用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来解释现代世界的重要性。

因此,就我们在这一阶段所知道的而言,为了回复安克·胡格维尔特使用的隐喻,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应该起飞。而且,吉登斯的倒计时屏幕告诉他,他自己的社会理论已经在寻求起飞了。然而,在其自身的发射台上,“时空伸延”的知识引擎尚未发动。我们似乎已经目睹了一种特别的理论故障——幻影起飞。

### 用蹦床定义

当吉登斯准备提出有关全球化主题的文献中最有影响的定义时,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一进程分四个步骤,从中可规划出迄今为止该讨论中的四个关键因素。首先,他提醒我们他的论证的基本性质,这一论证以“时空伸延的理论框架”代替了传统的社会学范畴。其次,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转变的方法论含义,即它使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关注于人类机构的空间构成,使我们用涉及到社会生产的在场和缺场、地点和距离的相互关系来分析社会世界。再次,“时空伸延”这个短语再次被援引,然而此时,它的含义已经改变了。它已经从一个普遍的知识问题缩小成超越不同历史世界支撑的社会关系的时空距离的定量标准问题。他告诉我们,“在现代,时空伸延的水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这一高水平的双重后果是,社会关系的地理“伸延”,以及

“变幻无常的空间”——日益受到遥远的偶然性因素渗透的社会再生产的地方场景——的随之扩散。最后,它提供了最终定义的桥梁:“全球化因此能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当地发生的事情受到遥远范围之外的事件的影响,上述社会关系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连接远方的地点的,反之亦然。”[64]

这里进行的论证如此水到渠成,以至于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发现能够引导我们找到发生在内部的概念省略的涟漪。这一命题顺序的修辞流程是足够清楚的,要么全球化是时空伸延的产物(可以被看做是全球化的趋向特性),要么全球化是一种典型的时空现象。它看上去就像是用时空伸延在解释全球化,这使得我们只有用时空伸延(被视为一个理论框架)的独特范畴才能分析。我们也发现为什么这个定义已经如此有影响。因为如果能够使这些清晰的断言中的任何一个陷入困境,那么“全球化”这一术语将确实仅仅成为一个描述性的地理范畴。只有在它能够独一无二地既抓住现代性的扩张动力,又抓住在社会空间本身的背景下的转换时,它才可以再次作为关键性概念出现。因此,在理论框架和问题化中摇摆不定的时空伸延,似乎就提供了使全球化概念扎根于社会世界更广阔解释的关键联系。

然而,问题在于,上面提到的这些清晰断言中的每一个,均建立在如下优先假设的基础之上:社会现象和时空定义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特征的关键。而且这恰恰是吉登斯和其他任何人尚不能确定的。相反,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在吉登斯自己对时空现象的分析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是从并非用这些术语本身定义的现代性的其他机制性特征中得来的。并且因为这些特色——应该把“全球化”坚定地置于被解释项位置的解释项——从定义的最终构建中被排除出来,导致后者的步伐必定终止于一个循环的路径中。

首先,潜伏在全球化理论中的空间的具体化,被再次认为是

社会理论基本要素的重构。这里似乎存在着使一种知识倒置合理化的做法,而这种倒置又使空间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让位于社会的空间结构的分析,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两者是彼此不分离的。然而,使具体化相混合的第二个步骤明显地按照这一路线行进,阐述着它坚称是替代物的一套分析范畴(地点、距离、在场、缺场)。既然促进社会理论的空间化的是时空压缩的特殊现代经历,那么当步骤三把时空伸延的史无前例的水平作为现代性特征时,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最后,从“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全球性”的因果断言中,仅需要小小的一步就可以把“全球化”视为关键性的概念,不仅因为它用空间的术语来表明一种历史结果,而且因为它使除了空间之外的任何指示物都实现虚化。另外,它是根据时空条件坚实地定义现代性的载体,也是再制定空间理论范畴的抽象公式的载体。因此,它既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高峰出现,又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的载体的角色出现。

然而,事实上,全球化理论明显地根植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已经在事实上使这一概念从任何比它自身定义中所包含内容更深刻的解释中分离出来。而且,时空伸延的观念通过对更深层次的坚实、抽象的理论的殖民,在使空间范畴扩展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至此,全球化理论的定义之环终于完成了,并且阻止了会使其再次转换为纯粹描述性的非时空概念的再次进入。通过这样一种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方式,吉登斯使理论保持静默,并似乎使“全球化”理论稳定地建立在一种根本的社会理论之上。但是,事实上,根本的社会理论只能起这一概念的回音室的功能。借助于此,这个概念的描述性言论就以更为响亮的解释性命题的形式又回到了它自身上来,而且仿佛那些命题是来自于分离的、更深入的源头。

换言之,仅仅通过在时空伸延的蹦床上跳来跳去,全球化理论获得了足够的知识高度,可以跳过会使这种被解释项自身出

现在解释项的逻辑空间中的逻辑障碍。

然而,游戏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吉登斯尚未完全展露他的理论。他的下一个步骤将使他涉猎到由此而来的人种学方法论的、心理学的和人类学的运用中去,并且这首先会引导我们方便地绕过问题的“背后”而直接到正面中去,在那里我们将进一步观察到坚实解释的相当壮观的崩溃。

## 正面的麻烦

在第三章中,时空伸延的理论几乎是第一次被用来明确阐释并回答有关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初起源是十分简单的。当时空伸延的水平提高时,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远远超越单个人类经历的地方环境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这些社会关系本身具有脱域的、非个人化的特征——它首先是社会关系的空间扩充的前提。象征性标志和专家系统是现代性的巨大脱域机制——“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并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1]通过这种做法,它们制造了一个人为创造原因和结果的世界,这 and 任何前现代世界在两个基本点上不同。首先,因为这些抽象的系统现在统治甚至构建着生活的基本条件,而它们参与到与它们有关的、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形式中去也是强制性的:

个人在前现代的背景中,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能够忽略祭司、哲人、巫士的言论,并按照日常行动规则行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却并非如此,特别是在专家系统的问题上。[84]

而且,其次,置于这样的权威之上的信心的主观内容也是在转换的:

这不仅仅是……制造一种关于独立给定的、事物普

遍性的安全感的事情。这是一个作为知识的持续反映运用的结果，在专家系统不能提供预测而又确实在创造事物普遍性的环境中预测收益和风险的事情。[84]

因此，在一个被抽象系统统治的世界中，信任的常规产生既比以前关键，又比以前问题化。所以，就带来了这样的问题：信任的常规产生是如何完成的？吉登斯的回答是，通过把这些脱域的关系“再嵌入”(re-embedding)到关系到意识和行动的地方背景下，现代生活的机构就必然会涉及到一种特殊的在场和缺场的再联合。人们参与到诸如银行、医药、法律或官僚机制统治的政府等抽象系统中时，要求一种“非当面的承诺”(faceless commitment)，一种对这种体系既不能基于个人的直接经验，也不能基于对涉及到它自身运作的机制和进程的全面的技术性理解的信仰。相反，它是由“表面工作”(facework)来支撑的，这些表面工作涉及到“聚焦性互动”(focused interactions)和银行雇员、医生、法官、政府官员等“系统代表”。那些“聚焦性互动”构成了协调个人和专家系统关系的“交会点”(access points)，并且个人对系统的信心通过“明确的可信赖性和诚实的展示，以及‘照常运行’或不变动性的态度”得以维持(如果所有都运行良好)[85]。通过这些方式，一个其运作和程度均超过寻常人理解的系统就可以插入到有意义行动的地点背景中去。或者如同吉登斯所说的：“再嵌入是指表面的工作通过非当面的承诺来支撑或转换的进程。”[88]

事实上，吉登斯进一步增添了两个因素以解释为什么信任要常规地给与抽象系统：一种使接受抽象系统在世俗化行动中的角色正常化的社会化进程，以及日常生活不依赖于实用的、势在必行的专家系统的实际不可能性。然而，吉登斯的最大兴趣仍然是关注“交会点”的角色，大概是因为在他的分析中，空间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最后，吉登斯在时空伸延的条件下，使复

杂的社会空间结构处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评定他所提倡的整个理论问题转变的解释性益处了。那么,什么东西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里,崩溃开始了。因为提出这样的问题会使人情不自禁地去考虑人们实际上想去解释的社会结构的范围。而且在这个背景下,使人们震动的现象是,吉登斯的新前景竟然不再是分析和解释的目标。因为,尽管大范围的抽象系统在这一讨论中出现,根植于组成这些体系之关系的社会形式的因果特征,却或多或少地消失不见了。而且这是因为,当人们通过时空伸延的眼镜来观察它们时,它们最重要的特性就变成了它们共有的从地方背景中的“脱域”,这使得它们的无限空间伸延变为可能。但是,这样的一个焦点却不自觉地把它们的不同社会内容从抽象体系中排空出去。用这种方式加以夷平,则世界市场、国家、法律、医药、科学——甚至于旅游工业——就均具有同样的基本特征:如此众多的、日益穿透每天生活的常规行动的脱域知识结构,甚至当它们越来越扩张到超越个人意识之外时(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技术上)也是如此。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所提出的惟一重要问题应该是,信任在这样一种不可理解的知识结构中如何在地区范围内得以制造和维持,而且,它又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吉登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采取了一种主要为描述性的、人种学方法论的形式。为了阐明这一体系自身客观的因果特征——也就是说,解释它们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运作,从而用特殊的方式分配财富、知识和权力——超越对它们的时空表达进行分析将变得很有必要。而且既然这将把他带出时空伸延之外,那么也许就可以理解吉登斯不这样尝试的原因。然而,其结果,就是使他自己的解释被限制在一系列描述性的陈词滥调之中,一个早年在他自己的论证中警告说“仅仅发明新术语是不够”[3]的作者,在用伪科学的语言——诸如交会点、非当面

的承诺、表面的工作、聚焦性互动、体系的代表等等——粉饰他自己的论述。好吧,那么,为了弄明白我们日常卷入到了我们通常不能理解的巨大体制中,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现代性本质的……全新特征”呢[4]?通过雇员的行为准则体现出来的官僚组织调和了这种卷入,而且我们对体系的信心又被不熟练、不专业的行为所削弱。不是人们发现这里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同意的,而是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因社会学理论的解释断言已经出现的戏剧性缩减而震动。而且,理由也不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的。如果时空伸延被严肃地当做是替代性问题,则其要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是使系统本身的社会动力外部化。

## 论证的重组

然而,如果时空伸延的理论似乎已经缺乏第三章开始部分的雄心了[79~88],那么在下一步却还有更多补偿,因为这里断言的范围突然地、戏剧性地扩展了,而且是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我们在这一章的引言中指出,当整个论证的四个步骤展开时,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了以一种新的形式再次注入解释性的人类内容,其逐步从社会生活中疏散成为这一理论迄今为止如此显著、如此无能的特色,论证的步骤三(应用)突然回到步骤二(公式化)。这些回顾性调整的最惊人之处现在将要发生了。

因为在这一点上,吉登斯暂时背弃了构成他的论证主要目标的“现代性的机制性分析”[1],而关注于“似乎适用于任何文化——前现代的、现代的信任 and 个性发展进程的方面”[92]。后来发现,这一迂回的目的,不过是根据心理分析理论地发现重组时空伸延的理论问题。它的起点是“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大多数人对于其自身认同之连续性和他的行动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之恒定性具有信心”[92]的现象。没有这种信

心,个人将不能与其他人联系,而且将被“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所吞噬。现在,正如“哲学家们已经显示的”[92],在纯粹的认知水平上,构成本体性安全的信仰——即对自我的持续性的信仰和外在现实的可依赖存在——不能被证实。所以,就要问吉登斯,为什么“每个人并不总是处于高度的本体性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既然吉登斯已经指出,本体性安全“是一个情感现象,而非认知现象”[92],“我们可以推断”,怀疑论哲学家“并非是本体性不安全论者”。[93]但是这提供了一座他希望架起的论证桥梁。因为他用心理学的术语回答说:“我想论证,‘正常的’个人接受了日常生活几十年的信任的‘配方’,或者磨平了那些存在论的怀疑。”[94]特别是,母爱提供了最初的外部世界可信赖的经验,以及母亲与婴儿之间的相互期盼,满足后者促进了“一种可信赖的内在感觉,这随之提供了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94]

这个关于婴儿发展之本性的心理断言也是真实的。然而,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是吉登斯试图从中得出推论的令人震惊的知识压缩。“对婴儿照顾者的爱的信任,在本质上是通向基本信任——而且也许是所有形式的信任——的承诺的飞跃。”[95]所有形式的信任?既然正是吉登斯自己早期曾建议在社会学上运用与抽象体系有关的信任术语,他在这一点上掉进去的陷阱就完全是他自己挖的。因为尽管确实存在着丧失后一种信任形式的神经机能病,却几乎不足以证明他想作的关于信任的心理和社会形式的总体断言。<sup>51</sup>毕竟,未曾从“日常生活中接受他们的基本‘配方’的”精神变态者,也并非是以他们不能信任抽象体系而著称。相反,更为常见的是,信任在他们中间茁壮成长,他们操纵着别人的信任,靠的正是吉登斯论证中隐含的心理正常度和功能健全(人种方法论上的和官僚机制的)的混

合。“所有形式的信任”意味着基本的“配方”，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它吸引精神变态者就非常简单了。事实上，这甚至并不必要，因为既然宣称他们的功能不健全，那么没有人会首先被他们欺骗。

然而，这一论证的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出现了。由于（在他开始的问题中）在哲学和心理学的不稳定的意义上有一点偏差，也由于（在他的回答中）“信任”术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指示物的混合，吉登斯进行到也许是最大胆的知识压缩了。他观察到，婴儿期身份之形成的最初训练中心是关键的时空因素。母亲在场和缺场的交替，既在这个空间中创造着一个自我能够浓缩的独立意识，又能培养儿童相信母亲会回来的能力，即使她完全不在场。通过这种方式，婴儿实际上被引向发展感情上的和认知上的“信任”才能，其本质是“它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97]，而且抵挡住了也许会随之发生的所有存在性焦虑。因此，一个我们早期本体性安全发展的空间特征的副作用就是，我们都把婴儿训练当做一个全球化的心理动力的基本训练。如果吉登斯的这个解释是荒谬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他自己得出的结论弃之一边：“在这里，在信任的心理发展的核心，我们重新发现了时空伸延问题。”[97]

现在，这个揭示性的宣言所具有的准确意义又如何呢？迄今为止，如果我们简单地运行最后几个步骤并且允许时空伸延问题恢复其更为连贯的社会学起源，吉登斯总体论证中的一些困难也许被缓和了。然而，问题在于吉登斯本人还有其他计划。对他而言，本体性安全之心理学来源根本不是一个迂回。那是到达震中的旅途，他现在正带着更为深刻的含义而返回了。在下一个部分，迈向本体性安全的变换条件变成了有关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广泛对比（在整本书中现代和前现代之间最详细的对比）的轴心。在其含义已经回到了第四章中的现代

的、全球化的自我构成的分析时,它又经历了进一步扩张,成为当代世界政治行动可能性与形式的能被人理解的、再想像的基础。

因此,我们远远不能忽略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追寻它对于他的论证的其他部分的影响:因为变幻的本体性安全的人类学条件现在也被用于提供其社会理论的替代满足物,很明显,它同时封闭了更多更传统的概念二次插入的“后边”的缝隙。而且因为本体性安全条件下的时空转换从现在开始构成了主要的论题,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就迫使我们认真对待自己过去在所有进行的批评意见中均未曾暂停考虑一下(更不要说充分发挥重要性了)的可能性:用新的观点来看待的可能性——而且完全与本书的标题一致。这种现代性的时空结果,通过转换本体性安全的条件,也许确实已经比制造它们的“根源”的因果动力更具重要性,而且它们因此合理地在对当代社会的分析中展示后者。

如果论证就此打住,那么它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我们对吉登斯地位的全部批评将开始展开:我们指责他的知识范畴不能表明不同抽象体系的内在因果机制,将证明仅仅是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误解了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理论的时空问题的倡导将决定性地被证实;全球化理论也将建立在我们至今仍认为在逻辑上不能支撑结构的“时空伸延”的理论基础上。然而,与此同时,如果论证的动向意想不到地迫使我们在这一点上回转过来,那么,它也相当戏剧性地在另一方面下了赌注。现在它将不得不证实一种假设的可能性。为了使论证站得住脚,它就必须表明,本体性安全的时空条件的变化是“高级现代性”的最具因果关系的重要特征。

那么,什么是本体性安全条件变幻的本质呢?或者,什么是使现代不同于前现代的信任呢?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吉登斯首次用模棱两可的时空术语构建了更为广泛的论点:有关这

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不同地用时空组织自己机制方式的转换,它们之间形成对照的“跨越时空组织起‘可依赖的’相互行动的模式”[101]。在这当中,他挑出了四个作为前现代的特征。

首先,亲属系统通过提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义务的原则,能够涵盖时间和空间。这些原则被普遍确认,而不顾特殊个人彼此之间是否在感情上相互接近,甚至相互认识。其次,在前现代社会,“地区共同体”提供了制造信任关系的背景,因为它的空间或多或少是社会的自我构成,而且并未渗透超越地区控制的“伸延的时空关系”(它尚未成为变幻不定的)。因而,一种稳定的“地方”感经由“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的结合,及时为它们的稳定性提供较低范围的空间跨度”,从而得到复制[101~103]。信任关系的第三个前现代的支持是由宗教的宇宙论提供的,它可以通过向社会和自然时间传递依赖感而“致力于涵盖时空”[104],把它们解释为超自然力量的有意义表达。的确,继弗洛伊德之后,吉登斯也将宗教宇宙论看成是婴儿的有关父母照顾关系的经验转化为外部现实。最后,还有“传统”的作用——连接着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可信赖时间世界的相互加强部分的时空社会实践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时间的流逝从通向未知的旅途转化为可靠事件的自我确定的循环,信任关系因此能够被延伸,由此可以得出本体性安全的结论。

吉登斯这里的目的当然不是暗示前现代社会比现代社会更舒适,它们有自己的与自然危险、地方流行的暴力以及对个人诅咒的害怕相联系的“风险景象”(risk profile)。他的观点毋宁说是,组织起作为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的信任关系中介的时空的每一种方式,现在已经致命地遭到现代社会形式兴起的侵蚀。亲缘关系已经大部分被抽象系统所取代,场所被幻想空间所取代,宗教宇宙观被世俗科学所取代,传统被“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论”[109]所取代。而且相应地,一种新的、不同的“风险景

象”现在昂首出现在心理社会学的地平线上。在那里,抽象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副作用、集权国家提高了的破坏力、战争的工业化以及不可避免地被现代科学的论述提出来供考虑的人类和自然世界内在的无意义,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这个对比的基础上,我们确实能够比以前更为详细地用公式表示时空伸延所包含的东西。它的基本前提不仅是对不同社会如何根据时空不一样地组织自身的观察,而且可以在这个方面多成果地加以研究。毕竟,对超越人类文化范围的地域和时间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与人类学和其他研究相交换的一部分股票,并且尚且没有作为整体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而得到上涨。在吉登斯的工作中,带到它的中心舞台上的是一个先前的理论断言:信任的关系——没有它,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再建都不能维持——是通过涵盖时空而得以基本构建的。而且因为这个理由,分析在任何给定的事例中已经完成的这种涵盖的机制形式,就是解剖社会自身的实质。<sup>②</sup>

现在非常清楚,只有当时空伸延的“程度”很高,并将社会关系的网络延伸到世界范围的体系时,它才会变得非常重要。人类的存在作为意识的不连续中心这一事实,既与其他物种分离,又与自然分离,因而不能具备另两者内在运转和将来行动的持续确定性——这事实上使得信任跨越哪怕在最地区化的面对面交流中都存在的时空缝隙成为必需。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为什么甚至在所有人类关系中最生物性的、最心理性的亲密接触,即婴儿和母亲之间,能够意味深长地“再次发现时空伸延的问题”。因为可以随之得出,人类自身的原始差别可以通过涵盖时空的训练来形成。时空伸延在我们从子宫中出来时就开始

了。

那么,对于吉登斯从该书的一开始就倡导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坚实基础的问题之转换,我们可以在普遍的社会学

理论的基础上给予一个理由了。且不说对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决定因素的混合的方法论上的误解,我们关于由于其不同组成部分最终还会突然发生爆裂的整个理论的解释力量,又能说什么呢?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吉登斯提供了一些关键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尽管他从“亲密关系的转换”开始,不久却回到在宏观社会学层次上阐述现代性的风险景象,而且是根据政治本质和可能性作了重新解释。

## 时间和空间在捉迷藏

因此,现在第四章成为证明时空伸延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不能对吉登斯提出的一个指责是,他并不想降低那些断言的雄心从而回避巨大挑战。在这一章的三分之二内容里,他都坚持说,“任何试图理解现代性经验的努力,必定从这一观点开始……它最终来源于时空的辩证法,正如在现代性的时空机制中所表达的一样。”[139]而且,这些“时空辩证法”现在被不断重复援引,并直接以在一个因果含义的空间模式中的“本体性安全”之结果为条件。在这一章的三个主要部分,社会关系的全球化被清楚地宣称为是人类自身的变换本性、现代性中起决定作用的风险景象、现代人类机构的独特历史形式的基础。

因而,也许在读者被告知这一章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明显地不能论证这些观点,更不要说证实它们时,会引起自然的怀疑。但这正是我们一页一页地工作到这儿时将要发现的东西。

通常,我们每次都看到吉登斯作出一个如上引用的大胆观点。但是,在读者能够理解他的文字时,他又再次隐没在描述性阐明的丛林中。而且等我们已经穿越了丛林之后,他却发现他又转移了,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不同点上再次突然站起,提出一个新的同样是使人干着急的宣言。所以,这一

章将卷入到巨大的捉迷藏游戏中去,并越过当代社会理论的宽阔门槛进行玩耍。不过,在我们打算玩的游戏的版本中,却存在着规则的关键性差别。而且吉登斯是否已经掌握它也并未弄清楚。在这一点上,闪避和迂回前进是允许的。但在最后,如果它不能够被理解,被证实,他的论证就会崩溃,并且正是他自己(而不是困惑的读者)输掉了游戏。

规则上转变的理由非常简单。吉登斯有可能拯救全球化理论,并且使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几乎所有批评中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应该做的所有一切是,证实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整个工作的中心断言。也就是说,本体性安全的时空条件的变化,是现代性最重要的、具有因果特性的特征。不过,如果他不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所有以前的批评将自动恢复它们全部的毁灭性力量,并被同时也许已经招致的任何一种进一步的倾向所补充。

从第四章一开始,吉登斯的语言就暗示,他具有提供实证的倾向。他不失时机地发布他的第一个大胆宣言:“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和我称之为日常生活背景下的亲密关系的转换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虽然是辩证的)联系。”[114]从这一点开始,整章的论证就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个阶段[114~124]是从宏观社会水平上的抽象体系的传播研究到在个人水平上成为必需的信任的变化条件。第二个阶段[124~137]重复了有关现代性的风险景象对本体性安全条件的冲击。最后,第三个阶段[137~149]通过将其中的每一个修正为活跃着的人类行动的场所,再次断言了分析的“辩证”本质。因此,正如这个打开的包裹所暗示的,吉登斯的公开宣言的扩张范围不是无意的,整个理论确定是要兑现的。

## 1 号丛林：亲密关系的转换

论证的第一阶段已经随之开始了。在日常生活中，抽象系统被认为提供了超越时空的、巨大的、人类活动提高了的稳定性。而且在我们的实践中，也是这样确认它们的。开龙头、送信、乘飞机、储蓄，所有这些均暗含着对现代生活所依赖的抽象体系的实用性信任。然而，也有某些是它们不能提供的。与现代社会宗教（以有意义的和个人化的方式来包含时空）相比，对抽象体系的信任并非是一种心理回报。的确，在某些与其早期断言存在冲突的细微之处（但是如果论证将在这一点上发展，则又不是必须的），吉登斯现在告诉我们，“非个人的信任……是与基本信任相矛盾的”[120]，而且既然后者“提供了个人与体系信任之间的联系”，则这种不连续就成为交会点的重要性的基础[115]。

那么，信任的术语是如何使我们把有关个人和共同体的相互关系的现代性之兴起再次概念化的呢？吉登斯从否决三个“确立的社会学解释”开始[115]：对共同体价值的崩溃的保守哀叹以及个人向内转向为关注个人利益；哈贝马斯关于现世世界的图景日益遭到非个人化的社会形式和机制的工具理性的决定因素的入侵和殖民；都市社会学家所作的相反断言即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在现代城市生活的明显不友好环境中重建。吉登斯说，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错误：一种不加区别的“共同体”概念，最终来自于费迪南德·托尼斯不加批判地加以接受的关于礼俗社会/法理社会<sup>③</sup>（Gemeinschaft / Gesellschaft）的对比。而且正是这种共同体的本质化概念，能够被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构成和重构的“信任机制”的对比性混合所瓦解。

在“传统的”共同体形式的核心，吉登斯确认了四种机制：“实际共同关系”[117]（建立在封闭的、地区的相互依赖之上

的)、亲缘关系、友谊关系和性关系。通过对比,在当代社会中,这里面的前两种机制已经因抽象体系的兴起而“的确被大量摧毁了”[117]。那些体系既穿越了地区的空间限制,又“直接地克服了对个人纽带的依赖”[119]。然而,另外两种也未得到某种称之为私人/个人领域的、收缩的机制性怀疑的支撑,也已经不能运用粗糙的公共/私人、非个人/个人或者,法理社会/礼俗社会的二分法的方式使自己转换。我们将通过对“全球化倾向”和现代性的新主体性之间的联系的观察,来提供对这种转换的更好的理解——部分分解,部分转换。

在前现代社会中,朋友关系不光是个人之间偶然发生的联系,它是直接的共同体机制。它通过公众确认的“荣誉”的法则而被认可,提供了个人信任能够增值为“远距离的、可以深入到‘敌方地域’的社会关系”的机制(相较于血缘和地域的纽带[119])。通过对比,在现代性中,时空伸延通过非个人化的、抽象的体系得以明白地说明,友谊的本质和作用也相应地转换了。它似乎被重构为“纯粹个人”的联系:“荣誉”被“忠诚”取代,公开的、重要的“真诚”被私人培养的“可靠性”所取代,等等。这种新的“纯粹个人的”性质,却并不能被理解为某种程度的、外在于抽象体系世界的东西。因为后者不仅提供了这种新的主体间形式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也提供了它扩展到更广泛距离(通过电信)的载体以及甚至是(以流行的心理分析专家的形式)行动主体本身的亲密的、离散的公式语言。

普遍适用于友谊的东西,也可以适用于更为亲密的性关系范畴;并未因为它篡改为公共机制(通过安排的婚姻)而得到支持;个人化的信任应该对“泄露的相互过程”起作用,产生作为“计划”的“关系”的历史性社会形式。的确,因为这种“泄露”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发现,它不过是“现代性的反映论”自身进入到亲密领域的例子[122]。然而,同样的观点也可以适用于特

定的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一直就是这样，比如说，西方的日常饮食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交换”；[122]宗教的西方消费者的精神偏好是由真正的全球菜单提供的。

吉登斯说，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偏好于非个人化的组织体系的个人生活的缩小——它是个人生活自身特性的真正转换”。因此不可能从全球化的抽象体系退入到受保护的私人领域，因为后者没有独立的存在。

好，这里就有第一处丛林了。在我们进去之前（并且我们不希望用太熟悉的论证段落来考验读者的忍耐力），就已经能够从这么远的距离说一些东西了。尽管吉登斯试图围绕着进行论证的新事物的大厦——“友谊几乎没有被社会学家研究过”[118]，然而这里分析的确实目标，又一次是古典社会理论的最突出主题之一，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形式的个人的历史性。马克思、韦伯、杜克海姆均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内在、外在世界的特殊重构，在这当中构成了新的、矛盾的人类主体形式。正是它们（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即本质化的、非历史化的共同体和个人身份，被吉登斯用来作为他的“现代性的全新特征”部分的跳板。事实上，吉登斯替代马克思论述的理论，其肤浅的相似性是如此醒目，以至于在这一点上去否认前人的某些原创见解是非常粗野的。

因为，恰恰是马克思指出了在现代性中，“个人是被抽象控制的”<sup>⑤1</sup>——从个人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相互关系的形式，而且，在一个通过这些抽象组织起来——而非通过“个人依赖的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个人自我的本性就发生了转换。吉登斯在他对于前现代的朋友关系的讨论的个人和社会认同的无差别性上，与马克思观察到的不谋而合，即“在一个基于个人关系的社会”，人们“仅仅作为不在特定范围内受限制的个人进入到与其他人的联系中”<sup>⑤2</sup>。马克思指出，通过对比，现代社会

的成员“已经成为抽象个人,然而,这个事实把他们置于作为个人进入与其他人联系的位置上”<sup>⑤</sup>。德里克·塞耶又在对这些问题的感知性讨论中补充道:“在这里,个人关系似乎首次以‘纯粹’个人的、不同于社会的形式出现……个人现在可以独立于社会背景被构想为一个主体。”<sup>⑥</sup>毋庸讳言,从马克思的论证推导出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吉登斯不惜试图与之搏斗的知识上的唐吉诃德的风车,也就是说,“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然的、单一的本性,确保了它相对于“社会”处于分析上的相反位置。相反,他坚持“制造这一立足点——即隔绝的个人的时代,精确地说是一个迄今为止关系得到最大程度发展的时代。”<sup>⑦</sup>

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而游离主题。吉登斯应该证明,本体性安全的时空条件的变化是高级现代性最重要的因果关系的特色,而且他的第一步已经断言全球化与亲密关系转换之间的联系。那么,他努力进行这样一个证明的努力又能走得多远呢?答案应该是以他能够建立的联系之本质为转移的。正如对共同体的讨论一开始就暗示的,如果说导致(甚至是“辩证地”)亲密关系之转换的空间范围告以终结,那么这确实标志着巨大的一步。然而,对这一论证的进一步考察又揭示问题并非如此。

如果这样的论证结构不分崩离析,那么就存在着一根需要重新编织的松散的线。在吉登斯的解释中,空间围墙不仅仅得到已经遭到“现代性的后果”分解的传统共同体的支持,还有第二种关系,即亲属关系加以支持。那么,为什么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不复存在了?因为抽象体系“详尽地克服了对个人纽带的依赖”[119]。是全球化的空间程度使它们克服了这种依赖吗?不。吉登斯的解释再次表明,恰恰是它们的非个人化特征(依赖于象征性标志和专家系统)允许它们进行无限的空间延伸。但是如果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在作为社会组织原则的亲缘关系

的毁灭性运作中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说这是根植于亲密关系转换的现代性的特殊空间倾向呢?

现在,也许可以认为这几乎不是个问题,吉登斯已经详细阐述了一个因果多元论。因此,接受另外的原因会怎样损害他的中心论点呢?答案是,知识性地讲,甚至吉登斯的多元主义是一个“有疆界的实体”——正如它将不得不避免完全的分析上的决定论。因此,重要的是他援引的其他原因在他自己论证的知识范围内倒塌了。而且,这里涉及的特别原因是他自己从早期论点中就排除出去的东西。

为了理解这里问题的真正策略性本质,我们必须回到第一章,在这里吉登斯安置了他的解释性范畴的基础,而且我们必须特别在他的“脱域”的讨论中找一找。这个术语来自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伊的作品,他用它描述市场关系向自我控制的“经济”范围转换的机制性差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波兰尼伊指出,通过比较“社会关系的嵌入”,市场因而从属于各种各样的“非经济”限制<sup>⑨</sup>。所以,在其原初的意义中,“脱域”是指被如此之多的社会学家视为现代社会出现的特征的、更为广泛的机制性的“范围差异”。

然而,这并非吉登斯用这个术语的含义:

我用“脱域”这个词,意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并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1]

而且,吉登斯清楚地表明,这种“脱域”的时空定义是作为“社会学家经常讨论的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变”的“差别性概念”的替代物而被提出的,这种讨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在其他问题中,后者确实“不能满意地提出时空伸延的问题”。[21]因此,在吉登斯那里,“脱域”变成了被用于与其原初(尚未得到公认)含义相对的解释的术语<sup>⑩</sup>。

这是一种使得吉登斯如此出名地难以被驳倒的知识进程。然而这一次,含义是像水晶一样清晰的:吉登斯已经成功地使他的整个论证依赖于“脱域”(用时空定义的)替代“差别”(传统上理解的)作为解释现代社会特征和兴起的基础的能力。而且的确,从全球化理论的观点来看,这里有着一个必要步骤:本体性来源状态和时空现象之间没有做出什么妥协,因而削弱了将时空伸延构成社会理论的替代问题的断言。

正是这个同样基本的动向,现在正返回到第四章开头处的论证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吉登斯声明,亲属关系作为组织原则的衰落,依赖于抽象系统“明确地克服对个人关系的依赖”的能力。但是除非它自己能显示出它来自于抽象体系的时空特性,这样一种断言将只不过是把机制分化的先进行程作为现代社会形式之兴起的最重要特色的例子再次提出。吉登斯自己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不仅未曾试图在时空理由上重新构建他对亲属关系的观察;相反,他通过把同样的观察应用到朋友关系和性关系上而扩展了这个问题。毕竟,现在正是吉登斯本人把“亲密关系的转换”定义为一种历史进程,通过它,一度公开阐释为社会关系(通过令人尊敬的朋友关系和安排好的婚姻)的私人纽带失去了广泛的作用,而以新的、明显的行动与意义分离的方式重建。很难想像,还会有比“社会学家经常讨论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分化”的复制更为详确的知识方案。但是这不是吉登斯的论证在这一点上能提供的精确性:因为他越是依赖于这个方案,就越是使他遭受到他自己早年对之进行的批评的攻击。而且根本弄不清楚的是,他的确定公式如何能够被认为是更“令人满意地表达了时空伸延”。

到现在,下列观点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在“亲密关系的转换”与“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之间也许确实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然而,那些直接的联系不是解释这些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此它们不能承担这一章加在它们身上的雄心的重大意义。尽管吉登斯宣称“我们必须从一个最终来源于时空辩证法的观点开始”，他自己的实际所为却与这样一种前提相反。当推动力开始猛烈推移时，他自己“试图理解现代性的经验”，策略性地复归到前面已经丢弃的“分化的范围”——现在证明是站在了他试图联系和解释的个人和空间转换的背后，从知识上来说，他使我们回归到了古典社会理论家留给我们的游戏之中。

这些观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吉登斯在他的中心断言上也许仍然是对的。但是与最初的面貌不同，它们确实导致了下列事实：这个论证至今还未开始证实上述断言。然而，在这处丛林内部逗留是没必要的。吉登斯自己都不再停留于此来使我们在这一点上忙碌。当我们有时间在这里结束我们的清场工作时，他已经在别处另起炉灶，发表他的下一个大胆论断了。它开始于一个强调“风险的全球化”的标题[124]。而且当我们向第二处丛林进发时，赌注又一次开始了。

## 2 号丛林：风险和本体性安全

下一个阶段似乎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描述的动向追溯到第一阶段自上而下的路径，这次不是从抽象体系移向个人间的关系，而是从现代性的全球风险景象移向它对于个人的本体性安全的影响。这为全球化和个人的交织增加了第二根线索——或者如同吉登斯指出的，“扩展的”和“内涵的”[123]。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内容也扩展了吉登斯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结构的替代性想像——作为那些基于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错误二分法之上的幻想的替代物。因为如果后者在它们解释两者关系时被误解，那么它们在一件事上却是正确的：现代世界的确呈现出充满着个人的现实世界之重要性的“威胁性面目”。而且正是对于这种“威胁性面目”和其结果，他现在建议通过风险和本体性

安全的范畴来重新解释。

很清楚,风险将会成为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且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回过头来在第一章的早期论证中寻找有关这一定义的定义。警惕,每一个读者都应该被提醒不要进行这一程序,这只会孕育混乱。吉登斯早期讨论的论点是什么呢[30]?他从卢赫曼的作品中得出了一个明显很清楚的定义,进入到某种注定要引起真正概念分歧的程序,并且因此开始提出有关风险范畴的宣言,而风险由于缺乏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可能回过头来找到一个清楚的概念,以证实他的错误或者加以理解。所以,从吉登斯有关风险的真正含义中,我们能得出的惟一确定保证是,通过从他现在对现代性的风险景象的描述性内容,可以得出实际推断。我们必须进入到此处丛林。

这一景象的全部形状是通过两种类型的因素的相互结合而得到描述的:与现代社会制造的偶然性之客观范围和性格相联系的因素,来自人们经历的偶然性之主观形式的因素。关于第一种因素,吉登斯列了四点。存在着社会制造的偶然性——比如说,‘核战争、生态灾难、无法控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换的崩溃的可能性’[125],等等——的确定天启本性(或者如他也曾指出的,“全球化的强度”[125])。它们中的每一个“均跨越了社会和经济差异”[125]。其次,存在着来源于抽象体系的全球空间扩张的现代偶然性的质量——也就是说,甚至在系统仍在正常运转时(更不要说在某些点上已经崩溃)出现的地区控制的客观性损失。风险的维度是与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通过全球抽象体系而扩张的影响一起兴起的。接下去,工业化的非故意生态后果增加了第三个有特色的、大量的偶然性,它根植于“社会化自然:人类知识注入到物质环境中”[124]。最后,现代性中还存在着通过“机制化的风险环境”扮演的独特后果角色,在这里,偶然性(以行动者之间猜测别人之预测结果的游戏

的形式出现)不再指的是结果,而是指直接进入社会行为自身的回归性特征。以这种方式出现的情况,从赌博、运动,通过市场的行为,一直转到核武器竞争。

同时,风险的现代主观经历的特征,是通过三个相关的特色体现出来的:第一,有关任何种类的风险可以被宗教和魔法技术缓和的前现代假设,已经大部分消失了;其次,“作为风险的风险意识”[125]在世俗人群中的广泛传播;第三,这又与一种“专业知识的局限”(在一种偶然的理解不完全性的意义上,以及在原则上反映性知识不能提前包含其运用中的非故意结果的意义上)的感觉相混合。

现在,考虑到吉登斯对“来自自然界的威胁与危险”的前现代“风险环境”的早期讨论[见第102页上的表格],我们不能说他把普遍风险定义为社会制造的偶然性。然而,这样一种定义将很好地运用于他对特别的现代风险环境的描述(这一点意外地把他带回到卢赫曼的原初定义上)。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如下:通过与前现代的对比,现代风险景象是由社会制造的偶然性之形式支配的,它在社会化自然的结果和预测理性的困境上,以及在通过文化去魅和反映性开放方式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上,更相信天启,更距离化,更深陷泥潭。

于是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一切对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后来成为社会再生产之重力的核心——的影响是什么?答案似乎存在于强度、非个人性和难操作性的混合。既然不断考虑核战争的后果(虽然有关威胁规模的考虑并无价值)太过悲伤,一层薄薄的但是不可渗透的、宿命论的表层将允许在这种偶然性的表面下重新构造“一种对于不可控制的远距离时间的模糊的、总体的信任”[133]。这种进程是得到“后果最严重的风险的浓重反事实特征”[134]的支持的:较低的可能性因为使政治参与的预测不能解决问题而使意愿迷惑。这种风险具有矛

盾性的“麻醉效果”[134]。而且所有这一切仍旧：

确定地在无意识水平上施加压力,尽管它本质上假定焦虑的减缓。与基本信任相对的恐惧感有可能无意识地灌输有关人类整体面临的不确定感。[133]

考虑到我们所知道的信任对于时空伸延普遍理论的中心性,这必定会被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充满着因果含义的观察来对待。然而,吉登斯不是得出这些,而是用一段描述开始了他的第二段论述,即“对现代性的风险景象的四个适应性反映”[134]。简单地说,“实用性的接受……支撑着乐观主义……怀疑的悲观主义……(以及)激进的参与”构成了主观指向的图谱,个人通过它寻求对付现代性的“威胁性面目”。非常重要的是,必须指出在这四个反映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发现了现代焦虑的发泄口(无论它多么片面),否则现代焦虑就要反制造性地被压制。而且,成为“激进参与”之“主要工具”的“社会运动”[137],提供了在现代条件下心理真实性和社会活动的再统一一点。

这一章达到了高潮,总结性的“现代性的现象学”将展开。然而,不断积聚的分析的波浪在我们头上澎湃,让我们最后一次提醒我们自己,这里确切地要展示什么。

我们在早期的部分看到,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全新特征”的断言,不断地因其依赖于(承认或其他)他已经抛弃的古典作家的观念而失效。我们也看到,依赖于抽象时空伸延不能解释现代性各种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内容。前景并不看好。使他的论证重新振作起来的,是论证突然突起一个主题,它从开始到现在均被作为一个确实的、中心的支持本体性安全的主题。这是一个发展,我们承认它有能力通过转换我们对它的术语的理解,来努力实现对这一论证的营救。

特别是,如果正如书的标题所显示的,正是本体性安全的现

代性后果现在被证明对理解当代世界有最大的重要性，那么在有选择地利用对现代性的古典解释与论证它们时需要系统化地超越之间，是没有矛盾的。（马克思也许已经理解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转，但并不知晓资本主义的无意后果将证明是对从他写作的时代开始转换的世界最具重要意义。）而且，进一步说，如果这些后果特别地是来自抽象体系共有的时空特征，那么后者的不同社会内容（无论如何并非不重要）就肯定能够被留给其他理论加以详细说明。最后，如果上述两种断言被“高级现代性”的经历证实，那么，不仅“全球化”的术语能够具有我们否定的理论重量，而且时空伸延的问题将获得真正的确实性，因为它将提供替代性范畴，通过它们可以掌握整个进程最重要的方面。

如果，如果，如果。循环发生的条件提醒我们，分配给本体性安全本身主题的角色导致了某些基础的假设，如果整个论证不再次崩溃，那么现在就不得不去证实这些假设。而且这些假设皆指向一个单一的、简单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表明，本体性安全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变化，是“高级现代化”最重要的因果特色。

在这方面，第四章开始得很糟糕。在背部分析混乱的进一步爆发中，“脱域”的原初含义穿透了再定义的防护墙，吉登斯早年曾试图将之排除，代之以他自己关于亲密关系和共同体转换之时空原因的解釋。在刚才回顾的那些段落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对于正在维护的本体问题的着重强调。我们甚至看到，焦点再次集中于这种本体性安全的特殊现代风险景象的后果。而且，在列出的风险景象的几种因素中，只有一种——“世界范围的风险环境”[126]——对于其特别的时间和空间效果是重要的。如果本体性安全开始回击的话，则它似乎已经处在了原因的恶意武装的控制下了。这些原因主要是工业主义（民用和军

用)、去魅化(在韦伯的意义上)和因机制化的体系而展开的矛盾的理性。在这种入侵中,关于时间和空间最需要说的是,它们所作的任何卷入均归功于在其他原因的恶劣影响下已经趋于失败。而且,关于论证的“正面”,在那里转换本体性安全的条件(无论它们的原因是什么)急需解释社会现象(不是那些吉登斯指控古典理论疏漏的现象),我们甚至不能为了构建这样一种尚未尝试的解释而宣告崩溃。

因此,需要从第四章中取得的东西是,一种可怕的赌博正悬在最后几页上。我们被最响亮的号角引到它们身边。吉登斯准备用他自己的现代性的“大图景”替代物来打出王牌击败马克思和韦伯他们。

### 3号、4号、5号和6号丛林:空间和时间的辩证法

我们在第四章的第三部分称为“总结性”特征的东西,是来自于第一段的证据,在那里更为片面的早期分析现在正让位于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竞争图景。我们被告知,韦伯把现代性想像为“官僚理性的‘钢铁一般坚硬’的笼子”。相反,马克思把它看做是“怪物”,尽管它是可以被驯化的。吉登斯现在建议道,“对于这些想像,我们应该代之以猛兽(juggernaut)。”[139]

甚至当我们从外面看时,就再次产生了对这一处丛林的怀疑。吉登斯用全书仅有的七个脚注(与尾注相对)中的一个,指出要读者注意“猛兽”一词的印度教起源,以及它的人类牺牲和偶像崇拜的含义。而 he 自己在主要段落中的简短阐述则清楚地表明,这根本不是运作上的参照。很可能,印度语种中的“猛兽”,不是指在不能预料的方向上脱离它的驾驶者而高速运转的“逃逸的引擎”。这幅确实使描述性的笔触具体化的想像,很明显与古典形式毫无联系,而与这个术语的方言形式相联系:吉登斯正告诉我们,现代性像一辆大卡车,它的重量和速度产生了

一种冲力,使得那些驾驶它的人以及那些寻求用非常有限的控制来驾驶它的人,交替感到恐怖和兴奋。

关于这种想像,毫无疑问是有一些东西要说的——即使不能控制的冲力和不能预测的方向都几乎不能说是现代性重新发现的特性<sup>①</sup>。但是如果它就是我们想像的卡车,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一阶段(没有关联地)展示古典参照物呢?毕竟,这样做情不自禁地使那些留意这种事情的读者想到:把现代性想像为一个猛兽,是为了作为马克思和韦伯的全新替代物,但实际上这种想像早已被马克思本人运用过<sup>②</sup>。然而,在马克思的例子中,古典参照物确实切合吉登斯提及的力量:为了使一个文明社会消除资本“无限制地对价值的渴望”以及不加规则的童工使用潮,将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制造野蛮,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东方学”的扭曲程度)向他们的印度臣民转嫁的东西。英格兰也有它自己的上帝偶像,它的崇拜者们用人类的牺牲来满足它的欲望。

但是进一步进入到丛林深处没有意义,因为吉登斯本人就已经告诉我们那是空的。在他一引进猛兽的想像后,他就向内推进,这在一段将要使事情的节点露出水面的段落中确凿地显示出来:

现代性的难以控制的力量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就像谈论它所穿越的那条惟一的路径一样,这种比喻本身就是无效的。它绝不是一个由完整的机械构成的引擎,而是一个里面充满了张力和矛盾、往不同方向你拉我扯的引擎。[139]

这就是说:为了“获得现代性的经验”,替代性的想像必须自行移去表象,以揭示它的统一性所掩藏的“往不同方向你拉我扯的动力”。正是他在这一点上所作的宣言,是我们早年从“时空的辩证法”中所引用来的“这种观点”的最终来源。所以,下面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他对辩证法的解释[140~149]。

“辩证法”这个术语现在被用于指称明显矛盾的(或相反的)因素在个人生活经历中合在一起的现代生活经历的四个维度。在每一件事上,“社会学家通常假定”[145]现代性的经历被表明是基于这些因素的二分法上的,真实的二分法解析逐渐地提供了一幅当代社会的替代图景(不再基于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僵硬对比)。

因此,“地点”被社会关系的脱域分解,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终结。同样的延伸通过再次插入到新的、前所未有的“时空背景”[141]中,从而为幻觉似的地点,同时也为社会关系的“再嵌入”提供了条件。全球的似乎要消灭地方的,事实上,它现在正成为伸延所调节的地方新形势建构的场所。

其次,适用于共同体集体经历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的亲密经历。抽象机制的非个人化并不能定义那些被机制调节的人类相互行动的形式。电话系统允许亲密关系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甚至抽象系统也在不熟悉的个人之间制造着技术性的相互行动的特性,而不是简单地把非个人的行为概括为“陌生人”的匿名世界;它也应该被视为涉及到会晤别人和锻造个人关系的可能性的巨大扩展。因此,亲密性和非个人性也是辩证相对的。

甚至于专家——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最不可抗拒的入侵者——也辩证地受到现代性生活世界的相反面的混合。世俗的个人作为与抽象系统相互行动的单一条件,发展了他们工作的实际意识,这种工作(无论在知识上多么局限)能够成为以各种方式挑战抽象系统运作的基础。处在所有反映性知识系统顶点的机制性的不确定性,和它们必须脆弱地依赖于实际上使专家统治权力在原则上不稳定的“交会点”混合。铁笼子不能被锁起来了。

最后，“高后果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s)的低可能性”，也许的确具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促进“私化”的“麻醉效果”。然而，这里面所必然包含的心理代价使它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这不仅在“无意识水平”上增加了“外在威胁”的负担，而且通常在生活经历周围环绕的高后果风险，以担心健康、工业事件或政治危机的形式不断地进入到核心。在这些点上，分散的个人和社会存在的因素戏剧性地再联系在一起，而对私化的心理压制也有助于随之而来的积极参与的力量。

那么，在结论中，我们还不能想像我们自己陷入到铁笼之中，或者消灭于怪物的腹部，或者甚至栖息于一个运动的猛兽上。我们存在的机体并不最终导致它自己产生任何这种一致的想像。我们也许必须看到人类机构的接触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最世俗、最不反映性的行动中运作，使得每一个不具体的决定因素转化为人类目的的中介，反映为以各种使将来永远未知的方式过多地决定它。

这是一个慷慨的、有希望的、世故的论证。我们需要在一件事上单独询问：它详细地断言了什么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这一幻想的四个维度能被说成是包含了——或者甚至是“最终来源于”——“时空的辩证法”？

它们——取代和再嵌入——中的一个，乍一看已足够安全。然而，甚至于在这里它也是个问题。“脱域”的原初定义，吉登斯很痛苦地使之区别于其他可能的含义，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并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1]。因此，严格地说，不可能存在使时空伸延过程的逆转成为必需的“再嵌入”的范畴。而且吉登斯在这一点上的整个论证是，虽然地区性的新形势不是不真实的，但它们又是充满幻觉的，也就是充满时空关系的。“嵌入”(embedding)的确实含义，因而已经从它的原初参照物转变

为社会因果关系的地方空间围墙。它现在很明显是指社会关系再次插入到时空原产地,无论这有多么广泛,它都似乎使“场所”(locale)的早期重要性与“嵌入”的定义矛盾(或者反过来,隐喻的空间力量被认为过分地依赖于它)。

也许,走出这一混乱状态的出路是,“地方性”的范畴已经被辩证地吸收进一种新的意义中去——把伸延归纳为现代共同体的调节条件。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几乎不能对时空中心性的定义有所贡献——如果任何事都是这样,它们减弱的重要意义,就是被削弱的社会关系之重建的障碍。

如果在四种辩证关系的第一种中还有困难的话,那么它其实是惟一能给四种合在一起将要建立或至少是要显示的事情提供任何适当材料的。真的,吉登斯试图把第二种——“亲密性和非个人性”——编织进事情中。他说:“我已经说过的‘亲密关系的转换’,是偶然发生在脱域机制带来的距离化上的。”[142]这使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上面已经考虑过的早期讨论中。然而,我们知道,1号丛林恰恰是从起跑线上就是空的:早期讨论未能建立起任何事情,或者甚至未能连贯地论证任何事情。提供给构建“亲密关系的转换”之时空解释的东西,转而依赖于机制差别的范畴,而机制差别已使自身作为理解时空伸延重要性的障碍而被否决。吉登斯现在还没有尝试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读者纯粹是被邀请来假定现在所作的断言是一个平稳发展的论证的下一个部分,而且牢固地依赖于前面已经采取的步骤。但是,这个假设没有根据。相反,如果怀着早期缝隙将被以后的发展填平的希望而留在论证旁边,一旦后来的发展又使我们回到早期的论证来寻求证实的话,是很难使我们满意的。

如果“时间和空间的辩证法”仍然在它们的第一处很混乱,在第二处未得到证实,那么在第三和第四处甚至就不要提了。随着一个最新的、未得到支持的建议被排除出去,即现代性的矛

盾特色应该被视为“再一次反映了地区和全球的特殊相互关系”[148]，那么甚至仅仅把时间和空间视为最后两个辩证法所构成的维度，也是没有讨论余地的，更不要说作为理解它们如何运作的解释性因素。

当我们进入倒数第二章时，讨论的稳定流向又移向已经作为中心主题而加速的部分。在这一章中，我们仅需指出，它包含着系统理论和模糊的、将来的（是在一些事例中已经相当文学意义地不复存在的政治障碍）迫切所需的替代物的显著混合<sup>③</sup>。吉登斯尚未试图提供这种长期期待的关键现象之解释。该现象的历史紧迫感如此强烈，以致必须要更迭古典社会理论。而且对于我们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该书再也没有过任何重要的对空间、时间、本体性安全甚或时空伸延的提及。它们已经倒下了，消失了，不见了。

而且它们仍旧最后一次回到最后一章的渐弱部分。这个简短的（5页）重复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考虑现代性是否是一个“西方计划”的问题，而第二个则形成对整体论证的告别总结。当这双重运作展开时，同样的特征——全球化、风险、空间、时间、反映性和本体性安全——又回到了这一阶段，并在舞台上鞠躬致谢。但是，奇怪的是，当我们走近看它们时，我们发现它们已经不是它们从前的东西了：当它们在前一个章节处于幕后时，已经有一些东西在它们身上发生了。

这首先在第六章的开始段落变得非常明显。吉登斯回答关于现代性的西方起源这个问题的起始点是，“对于其机制性定义特别重要的组织综合体”突然从四个减少到两个：“民族国家和系统化的资本主义产物”。[174]他坚称，上述因素“横扫世界……主要归因于它们所形成的巨大力量”。而且在提到空间和时间之前，他指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全球化”重新出现了：这是“现代性的基本后果之一”。他说，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

的制度在全球的扩散”。[175]但是,在论证的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不均衡发展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东西吗?似乎没有。因为尽管“我们这里正在提到世界范围和星际范围内相互依赖的意识的自然形式”,正在发展的却还是“一种全球化的体系”,“其特征是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均,以及它们产生的必然影响”。迄今为止,这里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精神和物质的相互依赖,也没有不平等的背景——这不能不又回到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扩散。无论“全球化”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它都已经被剪去了它所有独立的、解释性的自负。吉登斯在这一点上附加的惟一因素,是现代知识的反映论——而且它既不作为全球化的附加原因,也不是建立在它自身任何的特殊时空条件之上。

然而,全球化的严重降级,是不能与为时空这些不幸的范畴准备的命运相提并论的。那种命运在该书的最后一页到来。吉登斯说,“我们正回到问题开始的时间主题上。”他奇怪,什么将在真正的后现代世界内成为时空伸延、脱域和反映论?他的回答——如果它不是在整个先前论述的方向上,可以根本不屑一顾——如下:“有一天,现代机制大部分会被超越,它也必须要被根本地改变。”深感震惊的读者也许会问,那么早期的断言,即“现代性动力的三个源泉”实际上处在“机制性集合体的背后”[63],又意味着什么呢?而且,对早期段落的回顾的确揭示,根据“现代性的机制维度所涉及和调节”的“源泉”,确实存在着模糊性。如果我们严肃对待这些矛盾性的话,那么作为替代性问题的早期断言又是什么?

无论如何,吉登斯的思想是由书的最后一页构成的。现在,正是时空的变化特征,必须“最终来源于”特殊历史社会的最广阔制度特征。而且我们确认的任何“时空辩证法”,也许它们本身是指更为传统的解释问题。仅此简单的一击,社会理论的时

空框架的雄心就已经最终被它自己的作者击倒了。

马克思·韦伯的影子并非第一次从阴影中出现。他在他最著名的作品的结论部分中写到：“没有人知道，谁将生活在未来的铁笼里，或者在（现代性）巨大发展的终端是否会兴起新的预言，或者是否会有旧观念和旧理想的恢复，或者根本不是上述任何一种，而是机制化的僵化。”<sup>⑥</sup>韦伯在戛然而止之前，允许他自己在最后的可能性恐怖前短暂地喘息一下：“但是这带给我们价值和信念的判断，是纯粹的历史讨论不需担负的。”吉登斯在他自己对同样的后现代未来作的评论中回应道：“这是否暗示了宗教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恢复还很难说，但是也许会存在一种生活的确定方面的新固定物，它将重新唤起某些传统的特色。”而且，就像韦伯一样，他在简短的几行字后结束了他的思考：“然而，随着这类反思，我们开始解除了乌托邦的空想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而且那是这一类研究应该走的进一步。”[178]这是结束工作的一个消除敌意的客气劝告——虽然这是一个人们会在进程的早期就情不自禁地感到、也应该有意地注意到的劝告。

在作品的结束演出期出现的古典韵律的回归，仍然仅仅是在文本的表面表达了已经在底层出现的、更为基本的知识调节。因为在这两章中——在第一章中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在第二章中以一种详细的方式——正进行着一种广泛的重构论证的工作。被解释项和解释项已经逐渐地但是明确无误地交换了位置。而且到最后，它们最初的倒置已经使它们自己完全翻转了过来，使我们回到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先前存在问题相一致的路径上。

吉登斯已经离开了大厦。而且，他似乎离开得很及时，因为他在结尾处如此匆忙地撤出的全书的整个论证，在第四章的开始处就已经危险地步履蹒跚了。并且，我们现在必须观察它总

体的崩溃的最后场面了。

## 注 释

- ① A·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剑桥 1971 年版。
- ② 剑桥 1985 年版。
- ③ 无论这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合成,还是一种“可无限延伸的”非决定论,吉登斯作品的核心是对古典文献主题的重复。比如,斯图尔特·克莱格就对吉登斯作品出版的成功作了显著分析:“如何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理论家”(How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ly Famous British Social Theorist) 再版于 C·布赖恩特和 D·贾里主编:《安东尼·吉登斯:批判性评价》(Anthony Giddens:Critical Assessments) 四卷本,第 1 卷,伦敦 1997 年版。赞同者和批评家都应该感谢布赖恩特和贾里,因为他们做了如此巨大而有用的编撰工作。
- ④ 特别参见他的“全球化:时间—空间和同质性—异质性”(“Globalization: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载 M·费瑟斯通、S·拉希和 R·罗伯逊编:《全球现代性》) 以及他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伦敦 1992 年版。后者包含着对《现代性的后果》的尖锐批判。
- ⑤ 尽管奥尔布罗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每一个亚部分的题头上均贴上解释性标签,但我还是不能把这 95 个部分放在一起,以便能够评价他所作的整体论证。
- ⑥ D·赫尔德、A·麦格鲁、D·戈德布拉特、J·佩拉顿:《全球转换:政治、经济和文化》。罗西瑙的评论在封面上印了出来。在这本书中(马尔科姆·沃特斯的《全球化》也是如此),吉登斯被引用的频率比任何别的作者都高。吉登斯本人把这一卷描述为“全球化理论诞生以来,对这一主题最广泛的介绍”。(见 A·吉

- 登斯：《逃逸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第84页。）
- ⑦ 这本书也发展了对后现代性的有效的、连续的批判，不是在以下几页中进行回顾，而是说它的着眼点反映了“高级”现代性本身的现象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后果。
- ⑧ A·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页。在以后的诸页中，所有方括号里的数字均表示这本书中的页码。
- ⑨ “我想用对‘古典’的研究来为其他相关的努力提供跳板。”见“结构理论和社会学分析”(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文，载J·克拉克、C·莫德吉尔、S·莫德吉尔编：《安东尼·吉登斯：共识与争议》(Anthony Gidden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巴辛斯托克1990年版，第298页。
- ⑩ K·马克思：《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158页。尼古拉斯把“客观的依赖性”翻译为“通过物来调节的依赖性”。
- ⑪ 比如，参见D·塞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补说马克思和韦伯》，第14页。“在总体水平上反映人类历史进程时，马克思把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简单地混合在‘第一阶段’中。”吉登斯自己非常清楚，要用非进化论的观点来阅读马克思，“我认为马克思的重要性是指出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不同，而不是试图把它们都压缩到某种进化变化的方案中。”J·布莱切爾和M·费瑟斯通：“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安东尼·吉登斯访谈”(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Anthony Giddens)，赖伯恩特、贾里编：《安东尼·吉登斯：批判性评价》，第1卷，第24页。
- ⑫ 或者正如塞耶指出的：“19世纪以可视形式出现的世界的基本创新感，是所有‘古典’社会学的这种和那种方式的源泉……现代性能够被当做质问的客体，首先是由于它是建立在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学之确立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补说马克思和韦伯》，第11页)另外，塞耶认为吉登斯对马克思的批评“非常可笑”。见他的“重新发明轮子：安东尼·吉登斯、卡尔·马克思和社会变化”(Reinventing the Wheel: Anthony Giddens, Karl Marx and Social Change)，见克拉克等编：《安东尼·吉登斯：共识

- 与争议》,第 242 页。
- ⑬ M·伯曼:《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固体变为气体》(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伦敦 1983 年版,第 19 页。
- ⑭ 同上,第 24 页。吉登斯也顺便指出,马克思并未给现代性的“阴暗的一面”以适当的考虑,这又被他自己对“更为人道的体系”的可能性和它们中的矛盾性的信仰所佐证。而且这也很特别——不仅因为存在着下列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不沉溺于无根的乌托邦和令人绝望的毁灭而考虑一下将来,而且,也因为吉登斯本人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的倒数第二章中采用了同样的进程。
- ⑮ 比如,可以参见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地区、时空伸延理论被用来论证有疆界的实体的重要性:“只有现代国家在许多方面才成为最突出的权力集装箱。这就是说,民族—国家成了具有领土边界的……行政实体。”而且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社会学”均受到抨击,因为它们“缺乏对有领土边界的民族—国家之兴起以及它与军事力量之间的系统阐释。”(第 13 和 26 页)
- ⑯ 对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误用韦伯的简短质问,可见 B·特纳的“韦伯、吉登斯和现代性”(Weber, Giddens and Modernity),载于布赖恩特、贾里编:《安东尼·吉登斯:批判性评价》,第 4 卷。特纳特别注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例,韦伯并未在作为‘民族国家’的‘社会’概念中运作……他特别指出,如果他终究要成为社会学家,就要把诸如社会、国家等概念从社会学的词汇表中删除。”(第 38 页)
- ⑰ 论证全文见“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再版于 M·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希尔斯、H·芬奇译,纽约 1949 年版。第 67 页上又把社会科学再定义为文化科学。
- ⑱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帕森斯译,伦敦 1984 年版,第 182 页。
- ⑲ 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第 57 页。

- ⑳ “领袖魅力的进一步冒险”(Further Adventures of Charisma),载《语言与权力 探寻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纽约和伦敦1990年版。
- ㉑ 吉登斯从乌尔里希·贝克的《冒险的社会》(Risk Society,里特译,伦敦1992年版)中得出“社会化自然”这个短语。贝克旧瓶装新瓶的倾向与吉登斯无异,在他的“自然与社会的对照已经终结”的宣言中体现得最盛(同上,第80页)。他说:“20世纪末,自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自然。没有人会像其他世纪的人一样,把自然说成是非社会的,这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同上,第81页)那么,究竟贝克认为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个短语指代什么呢?而贝克的书目中包括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又使事情变得更为紧迫。因为马克思已经促进了“人类化自然”概念的产生,否定任何自然与社会的对照,并写道:“自然当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时,就是人类社会创造行动的结果。”见马克思:《早期作品》(Early Writings),R·利文斯顿、G·本顿译,哈蒙德沃斯1975年版,第353和355页。
- ㉒ 对于这个早期角色的讨论,可以参见A·西卡的“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在结构理论上的滥用”(The California-Massachusetts Strain in Structuration Theory),布赖恩特和贾里编:《安东尼·吉登斯 批判性评价》第1卷,第292页。
- ㉓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伦敦1979年版,第237~244页。
- ㉔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第23页。
- ㉕ 同上,第247页。
- ㉖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剑桥1984年版,序言第15和29页。后一个引用反映了吉登斯在出版《现代性的后果》之后的20年间走过的知识历程。如果它仍然没有探讨后来完全展开的马克思是一个进化论者的断言,那么它就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吉登斯1971年的位置;当时他甚至不愿意在“它也许暗示着更大程度地接近马克思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承认

的理论围墙”的基础上,把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相联系。

- ⑳ 既然吉登斯显示出知晓过去的事例,这就变得更为重要。比如,他说第二国际是“把马克思的原初观点转化为19世纪主流知识思潮的直接表达,而非充当批判性分析或替代它们的尝试的一个背景。”见《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第244页。
- ㉑ 帕森斯范畴“回归”的观点,也许可以陈述这个事例。在一个显著的侦查性评注的运用中,西卡指出,吉登斯的“歪曲和伪装的权威性的策略,已经哄骗了”众多读者把他视为“牢固地扎根在欧洲知识家庭之树中的……孩子”。(“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在结构理论上的滥用”,第302~303页)西卡说,事实上,吉登斯应该更确切地被当做一个美国思想家,因为结构理论未被承认的根源,被一个虚假的“再定义的不公正”的尾巴所掩盖,处在一个人种学方法论、象征性行动主义和系统理论的非原创性混合中:“通过他的后期理论化,无论自我和社会这个问题在什么时候出现,人们都能在南加利福尼亚听到长期流行的这个观念的无名回声,甚至是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找到其他人梦想的重要残余。”(同上,第302~303页)
- ㉒ Z·鲍曼:《全球化:人类的结果》,第14页。
- ㉓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87页。
- ㉔ 同上,第187~188页。
- ㉕ 我尚不能在吉登斯引用的企鹅版的《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特定页码(第141、145和166~167页)上找到马克思对“纯粹商品”这个术语的应用。
- ㉖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86页。马克思后来又观察道:“如果我们将其纯粹的象征意义置之不顾的话,那么价值就仅仅存在于事物的使用价值上。”
- ㉗ 那么西卡就是对的吗?毫无疑问,没有人会非常仔细地深入阅读帕森斯的作品,为的是把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全新特征”的关键要素和其他东西组合在一起。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的一篇24页的论文,再版于《社会体

系和行动理论的进化》(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纽约 1977 年版)一书的第九章。对这一章的粗略阅读就揭示出,吉登斯称之为“象征性标志”的“交换的媒介”,非常狡猾地与帕森斯称之为“交换的普遍象征媒介”相似。因为帕森斯也认为,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定义了“交易体系的延伸,能够发展和扩散的地域的界限”。(同上书,第 209 页)帕森斯也从钱开始,也将之定义为信用和债务。帕森斯同时也争论说,因为其他普遍象征标志的存在,他的这一称谓的首要点,就是吉登斯提过的另一种“象征性标志”——也就是说,政治合法性。然而,当吉登斯在这一点上悬而未决之时,帕森斯又进一步阐述其他两个媒介:“影响”和“价值承诺”。认为这标志着两者真实的差异性的观点,几乎立即被帕森斯对此的讨论削弱。首先,以“医生的秩序”为例,这是与来自专家系统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它清楚地表明要“锁定委托机制”,也就是说,与信任相联系。

毫无疑问,吉登斯坚称,这些明显的相同性掩盖了真正重要性的潜在差别。但事实是,通过把钱和政治合法性定义为象征性符号,通过继之以对专家系统的讨论,他已经再次制造了四重帕森斯模板。为了确立他自己超越帕森斯的问题,而非西卡指责他的“再定义性的不公正”,他已经做了很实在的事情。

事实上,指责还能拓得更宽。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最熟悉的指责是,其“静止的成见”使人们不能掌握历史进程。通过对比,吉登斯结构理论的穿透性力量在于,通过把时间维度再次插入到社会学分析之中,不仅表述了这个问题,而且揭示出社会秩序的静态再制造同样能够被理解为动态过程。这就是他在我们已经讨论的同样文章中所做的。因为他不辞辛苦地强调他的“象征性符号”的概念(后来作为吉登斯的“象征性符号”而再次出现)“在社会关系和进程中引进了动力因素”。(同上,第 208 页)他阐明他的观念说,把媒介的动力概念引进他的总体理论,“对我而言,可以驳倒对这种结构理论类型内在的静止成见的指责。”(同上,第 209 页)而且最后,在应付质疑他的结构理论之原创性的一击中,他指出:“让我再次坚持,在动力范畴下,我

指的是平衡进程和结构变化进程。”吸收这种评价的重要性的读者,当10页之后帕森斯作为可通行的定义再次兴起——后来又 在“结构的二元性”的标题下作为结构理论中心论点再次出现——时并不感到非常吃惊。

- ③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9页。
- ③⑥ 马克思:《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524页。
- ③⑦ 事实上,吉登斯是否理解这些问题是很难判断的。一方面,他曾经正确地确认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客体,记载了人类关系转换为市场关系的现象”。(《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第64页)的确,至1981年,他仍然宣称,马克思通过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表明了钱如何表达了社会关系的脱域,并使之成为可能。”[《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评论》(第1卷):《权力、财产和国家》(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伦敦1981年版,第115页]另一方面,甚至于在1971年对马克思的主要探讨中,他致力于提供“一种紧密的、可理解的社会科学的观念”(《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序言第7页),也仍然没有提出物质崇拜的中心主题。价值理论本身被当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密克之后,又融进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马克思曾批评他们过于崇拜价值创造的劳动特征。这导致的潜在困惑,迅速以某种基本的误解形式回到文本的表面。比如,吉登斯论证说,“无论是交换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必须与体现在商品制造中的劳动数量相关。”(同上,第46页)马克思当然不持同样观念。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本体论深度相对于马克思建议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虚幻的,而且它明显地意味着对社会价值理论的需要,这一断言能够潜在地掩盖他自己。这是韦伯在形成他的替代性的、边缘化的解释时采取的观点:“已经证明有可能完全避免有争议性的‘价值’概念”。(见G·罗思、C·威蒂克编:《经济与社会:解释性社会学的轮廓》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第一卷,贝克利1978年版,第63页)然而,吉登斯却未尝试此种动向。

- ③⑧ “作者的导言”，再版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22页。
- ③⑨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第957页。
- ④⑩ “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第139页。
- ④⑪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22页。
- ④⑫ “科学通过预测外在在物体和人类的活动，有助于控制生活的技术……（然而，它的使用）必然会被带入到根据所有发生的经验的（未曾预料得到的）附带结果进行讨价还价的地步。”《马克思·韦伯选集》，第150~151页。
- ④⑬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30页。他增加道：“行动的‘理性化’进程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是将不假思索地接受古代风俗代之以故意地采用。”
- ④⑭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78和26页。
- ④⑮ 这使韦伯同时也论证说：“甚至于我们的理论科学的最确定建议的知识……也是文化的产物。”而且，“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的正确科学证据……必须要被确认为正确，甚至是被中国人确认。”见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第55和58页。
- ④⑯ 可以给出三个例子：博伊恩指责吉登斯错误地表述了福柯和德里达[见“权力话语和社会科学：吉登斯作品中关于法国社会科学的系统化的错误表述”（Power-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y: The Systematic Misrepresentation of French Social Theory in the Work of Anthony Giddens），载布赖恩特、贾里编：《安东尼·吉登斯批判性评价》，第1卷]；甘恩[“安东尼·吉登斯和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危机”（Anthony Giddens and the Crisis in Social Theory），同上引书]指出，吉登斯在《新规则》（New Rules）中对杜克海姆的诅咒是奇怪的，它“非常精确地打击杜克海姆准备批评的某种哲学主观主义”（同上，第195页）；但最具毁灭性的是伊恩·克莱伯对“吉登斯错误运用和表述心理分析法”的批评。克莱伯说，不仅吉登斯使用弗洛伊德时失去了“复杂性和原初性”，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本体性安全”的关键范畴，是从莱恩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然而，它确实包含了“吉登斯建议的相反物”。同

样,吉登斯寄予厚望的心理分析学派的客观关系(包括温尼科特),也存在这个问题。克莱伯观察到:“吉登斯不理解这三个作者。”[见I·克莱伯:“人们的问题”(The Problem with People),上引书第2卷,第353、357和356页。]

- ④7 对于克劳塞维茨作品的简要概述,见霍华德:《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伦敦1983年版。霍华德没费吹灰之力就分析出,克劳塞维茨关于总体战的论述,形成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原则上根植于对合法性的新民主形式之于军事冲突的动力影响。因此,克劳塞维茨基本的见解实际上是被证实的,并没有因工业化进程而变得过时。霍华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在每一个水平上均达到克劳塞维茨分析水平的战争”。同时,克劳塞维茨作品中的要素也提供了“对当代核战争令人沮丧的精确分析”,总之,“克劳塞维茨分析的考虑因素均与今天有关,正如它与一个半世纪以前有关一样”,见上引书,第69、70和72页。
- ④8 C·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On War),M·霍华德、P·帕雷特译,普林斯顿1984年版,第605页。
- ④9 马克思写道:“经济学家们说,人们加在物(钱)上的信任是他们不能加在彼此身上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对物如此信仰?”《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160页。
- ⑤0 分别见《现代性的后果》第72、56、14、73和76页。事实上,在第57页上,吉登斯宣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只是在一些方面才局限于特殊的社会体系”——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断言并使我们从关注于“有疆界的实体”中解放出来的短语。
- ⑤1 伊恩·克莱伯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人们的问题”,第352~353页。
- ⑤2 这个强有力的断言并不是在吉登斯论证的最新阶段就把他逼进角落的东西。他已经在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中对此作了详尽论述:“最基本的调节感是那些涉及到‘包含’社会再制造实质的时空本身的东西。”(见《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第103页,强调为笔者所加。)

- ⑤③ 礼俗社会指由自然意志推动、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如原始社会、家庭、宗族和宗教社区等。法理社会指由理性意志推动、有明确目的、可改变手段以适应需要的社会结构，如现代政府、军队和企业的管理机关等。——译者注。
- ⑤④ 马克思：《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64页。
- ⑤⑤ 同上，第163页。
- ⑤⑥ 《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ollected Works）第5卷，C·都特、W·洛和C·马吉尔译，莫斯科1976年版，第87页。
- ⑤⑦ 塞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补说马克思和韦伯》，第58页。
- ⑤⑧ 马克思：《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第84页。
- ⑤⑨ K·波兰尼伊：《巨大的转换：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波士顿1957年版，第57页。
- ⑥① 当《现代性的后果》再次定义“脱域”却不提及波兰尼伊时，《民族—国家与暴力》则包含了一个对波兰尼伊的简短讨论（第67页），然而却并没有提及“脱域”。
- ⑥② 同样可以用于指代在后来的作品中扮演相同角色的巨大相似性的短语，是“逃逸的世界”。取消这个30年前就已经被马歇尔·麦克卢汉使用过的短语几乎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想像到今天为止已经如此平常，以至于可以得自各个方面。比如说，《文化是我们的事业》一书就是一例。摘自E·麦克卢汉和E·辛格罗尼编：《麦克卢汉精粹》（Essential McLuhan），纽约1995年版，第36页。
- ⑥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2页。
- ⑥④ 然而，他在第165页也感到疑惑，考虑到巨大的物质不平均和当代世界的有限资源，“后稀缺”难道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吗？“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问，对于一个并不追求自我毁灭途径的世界，还有其他替代解决方式吗？”
- ⑥⑤ 强调为笔者所加。
- ⑥⑥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2页。

## 结 论

### 全球化理论庙宇的坍塌

我们讨论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的论证的早期步骤时,再一次确认了十分严肃的问题,它们对以下任何事情的逻辑完整性提出质疑:替代古典理论的“跳板”是不稳定的;有关空间和时间的核心断言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某些点上被排除出中心议题的公式之外,在另一些点上则正在似乎是压倒一切的结果内运行;甚至全球化的定义也陷入了一种循环,正是它原初的公式在降低它的可信度。尽管这些错误非常明显,这里却不能得出结论。因为论证尚未充分展开,而且这与吉登斯非常著名的“螺旋式”论证风格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它们最后宁可更全面的公式来作更进一步的考虑。当吉登斯围绕着他的螺旋性的曲线,基于空间和时间以及本体性安全的整合而在新的层次上进行论证之时,这种策略又被进一步证明。这种论证的知识可能性,以及那些显而易见的早期困难的相应回溯性解决方式,似乎真正地在向这一点上迈进。现在,结论性的判断确实是要推迟,除非我们看到了他试图兑现这些可能性的结果。随着赌注的增加和其采用的术语的模棱两可性,我们转向第四章,仅仅是为了发现一种捉迷藏的游戏,而不是为了把整个论证的模棱两可的特性推进到一个新的程度。

也许,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捉迷藏”是吉登斯多年来明显地一直在玩的另一种游戏的更小翻版,而且还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合作。这种更大的游戏叫做“比批评家捷足先登”,而且它明显是在一系列的出版物中出现,而不是仅仅在它们中的任何一本里出现的<sup>①</sup>。在这个游戏中,对任何一卷的诋毁都可能被另一种解释勾销掉,要么是它们在另一卷中得到阐述,要么是在另一卷中引进一种新观念从而充分地转移阵地以改变主题。这条规则甚至在第二卷时就开始运用,因为在这一卷中就充满了新的缺陷,于是求助于第三卷。通过这种方式,游戏可以玩许多年,既可以使作者回避定义性的阐述,又可以使读者不必作出结论性的判断。

吉登斯在这游戏中的技巧被公认为是世界级的。《现代性的后果》必须算做名副其实的突袭。然而,由于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试图达到的目的,必须要求一套不同的规则。我们试图回答一个特殊问题:全球化的理论能够在社会理论的层次上被巩固吗?为了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求助于被视为最广泛地提供了这种巩固的书籍。而且,既然我们的参与是受外在限定的问题所驱动的——而不是被对作为吉登斯的肯定和否定的兴趣所驱动——那么我们所采用的规则就要不同。它们是学术参与的正常规则:这一论证是否取得了它试图取得的东西?它是否具有内在连贯性?它用的资料可靠吗?

也许有一天吉登斯会发表一部最终的作品,把所有松散的结尾给联系起来,并揭示他的众多早期作品是如何构成一个逐渐增长的、最终连贯的整体的一部分。那时的确可以说,不借助于最后的合成,不能理解其早期作品,也不能判断其早期作品。但是,为了构建他们的论点,全球化的理论家们不能等到那一天了,我们也不能。我们必须评价他们已经采用的基础,因为它们确实存在。

因此,一种有追溯效力的澄清现在已经就绪。但是很清楚的是,它不能是那样一种澄清,即我们看着早期的问题消失了,因为它们根据下一个结论重新被解释了。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相反的方面:最终逃避的自我毁灭性含义现在正不受控制地向后穿透了论证的早期步骤,在时空伸延这个根本的理论前提上挡住了自身的道路,并且最终越过了吉登斯本人,动摇了全球化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所共享的基础。

尽管论证还没有结束,以下一切却是十分重要的。克莱伯指责吉登斯并不理解他借之以得出他的“本体性安全”的作家;塞耶发现他对马克思作品的陈述是“简直可笑的”;特纳判断他对韦伯作的断言“明显”是站不住脚的;西卡注意到帕森斯在他的结构理论核心中秘密地起着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自己也对他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明显粗俗的阅读感到震惊,还对他在重新定义一些范畴时带着如此明显的目的而把奇怪的模棱两可强加给诸如卢赫曼、波兰尼伊等作家的观点震惊不已。

我们一路上遇到的一系列不相连的、单个的批判现在汇总起来起了重要作用:在缺乏任何替代性的解释时,它们开始回溯性地理解了为什么吉登斯的整个论点最终既不能在“正面”成功地加以解释,又不能在背部回避多次的“压制的反弹”。伊恩·克莱伯对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的解剖,现在可以当做是对吉登斯之前能做的反事实预言的内容的一种解释:社会学和哲学意义上的信任的合一产生了“本体性安全的概念和不足以支撑他所加在上面的理论重量的惯例”;它们必然会导致很快崩溃的解释,因为它们“相当根本地把个人的概念简单化”,这种概念又是它们不得不借助以运作的。<sup>②</sup>通过同样的方式,本应该被证实可以导致任何方向的建设性替代理论的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批判,现在却被证实是错误地解释了为什么替代理论不能逃避“结尾处的分析混乱”。的确,在这个阶段,甚至于批评家们

也在高呼“帕森斯！帕森斯”，这向前看可以仅仅被当做是梳理而不加理会，向后看却需要回答。因为把它们视为帕森斯的延续而非代表着与后者的决裂，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现代性的后果》（以及更为普遍的结构理论），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早期允许向前论证的一个接一个联系都被粉碎了，因为对它们的不可靠性的回溯性证明又回过头来与单一的批判联系起来，从而使任何调停步骤都决定性地不正确。

如果这就是坍塌的机制，问题就仍然保留着：它将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假设一直是，考虑到在吉登斯的论证中使用的其他材料，这一论证的最终坍塌将涉及的范围远比吉登斯本人的论证为广。特别是，我们断言对空间和时间的关注标志着其不堪一击的共同点，这就使吉登斯成为更为广泛的全球化理论的验证的例子。我们现在能够证明这一断言吗？

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以至于值得分解成不同的组成要素，以便确保在我们的回答中最大限度地加以澄清。我们可以将之分解成三个小问题来做这个工作。首先，我们已经确认的向后崩溃的一般机制，是否特别适用于《现代性的后果》的主题？其次，如果是这样的话，吉登斯在这本书中的问题是否确实来源于时间和空间这个中心角色？最后，即使如此的话，这个结果能否从一个作家的错误推广为一种整体学术话语——也就是说，全球化理论——的失误？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相当直接的。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时空辩证法”的决定性错误，正是时空辩证法（更不要说作出对社会现象的令人信服的时空解释）导致了试图重建时空本体性安全告以终结。而且，解救方式也被错误地运用了，甚至早期关于抽象体系的断言这时也不能防御批评意见了。这就是说，围绕着它们共享的时空维度来“碾平”不同抽象体系再也不能被另一种希望捍卫着，这种希望就是：那些共同的时空特征

将在将来的某些点上显现出,它们对于现代性而言,比已经消除的其他社会体系内容更具有因果上的重要性。而这又反过来削弱了提供现代机制时空分析的价值。并且因为这里的问题很清楚地与上述范畴的描述性运用无关,而特别与它们作为马克思和韦伯的解释理论的替代角色有关,崩溃就进一步向后传输,穿过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批判而压倒了时空伸延自身的基础。现在很清楚,时空伸延的基础命题已经不能够支撑建立在它上面的论证了。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将会得到同样毫不含糊的答案。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吉登斯自己的话,那么时空命题对于整个争论的中心性就是不言而喻的。毕竟,整个“现代性的全新特征”的观点提供了根据时空转换而对当代社会的重新解释,这种转换现在需要把“全球化”置于社会学解释的经验论的顶点,同时又把“时空伸延”作为理论的基础。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吉登斯在修辞学上坚持对他的计划的定义,直至最后也未减少。

另一方面,真正的决定点不在于他已经宣布的或用其他方式表达的意图。因为如果我们越过论证的阶段,那么我们自己就能够看出,几乎所有关键性的、会混淆逻辑连贯性的错位,都发生在时空理论已经落户的节点上。正是坚持“脱域”的时空定义与它的传统用词的对立(而不是简单地揭示后者不可否认的时空含义),使得吉登斯在一个一旦运用于“亲密性的转换”时就不得不改变其含义的范畴内蹒跚。这样一种对比,因为他早期把时空伸延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替代问题所作断言的规模而得以具体化。同样,正是在时间和空间基础上重建能解释任何事物的本体性安全的最终失败,导致了整个事情的崩溃。然而,在《现代性的后果》写到一半之时,这个努力方向仍然是吉登斯可以继续的惟一方向,如果他能够在时空的迹象下解决日益积累的矛盾性的话。

简言之,正是这项事业本身迫使吉登斯走上了荆棘之路,在他面前,不可能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时空这位专制的女神似乎只给与为她不辞辛劳的仆人一项回报:他对于任务的最终无效性不可思议地全然不知。在我们看来处处跌跌撞撞的论点正自鸣得意地在空中飞扬。

那么,最后,至于第三个问题,论证已经坍塌了,我们甚至可以从坍塌的方向上得出时空因素是整个结构的中心裂缝。这些结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严肃地概括为是整个全球化理论共有的呢?

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全力返回到我们对于这些断言——关于社会理论的时空现象的新的断言——在逻辑上包含着什么的起始思考上。我们首先指出,全球化理论,在我们已经定义它的意义上,是与这样一些断言相联系的。没有它们,这一术语本身将转向纯粹的描述性角色范畴,时空范围将不能承受推动它们的核心、解释性的重要意义。我们在对肖尔特、沃科尔的讨论中看到,全球化的理论家们并未使这些建议相互竞争,而是愉快地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包含它。结果,这种论述作为一个整体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免大厦倒塌,即宣称原有基础上可以修建基础更牢固的更好建筑。

谁能否认,吉登斯作为一名单个的作家已经把他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带给了对全球化理论的知识挑战呢?其他作家也以不同的方式做了工作。在肖尔特的“超领土性”、沃科尔的“时间加速”和吉登斯的“时空延伸”之间,是有许多细微差别的。而且我们不能预见,将来会采取什么新的形式。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预测:使用这种方法——无论它的形式如何——的每一个人,将不得不面对共同的要求,这种要求不是来自于方法本身,而是来自于它试图支撑的断言。

如果确实有一种社会学的时空问题可以作为替代理论,而

且不仅仅是在已知世界的现存理论论断中运行的另一种中庸的假设,那么,这种理论在选择它的解释命题适用范围时就有一个限度。由于它的自身定义,它将被迫在社会学解释的中心阵地上与现存命题竞争——或者使我们确信,中心阵地在于别处。当吉登斯首次不能占据继而转移中心阵地时,这个要求就击败了他的事业。肖尔特非常明智地试图不去碰这个问题。沃科尔发现其含义“特别困难”。无论如何,这不是吉登斯单独遇到的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现代性的后果》的例子相当极端,不仅在于“现代性的机制维度”规避了时空定义,而且时空解释通常(如在“亲密性的转换”一段中)在它们事实上并不出现的地方被宣布出现。然而,尽管这么极端,它却并非完全不具代表性。相反,因为这些问题最终扎根于普遍的例子中,而不在任何对此的单个研究中,它们就会在试图证实那些事例时再次出现。简单地说,它们表达了这种观点本身内在的矛盾性。

在最后一个例子中,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齐格蒙特·鲍曼的相关事例。在写到民族国家受超国家力量的侵蚀时,他告诉我们:

其理由并未被完全理解,即使理由知道了,它也不能被确切地预言,而且即便它被预言,也不能防止它发生。<sup>③</sup>

好是好,但这几乎仍然不是基于一种新的、大胆的、通过宣称自己是对世界历史的重新解释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战斗宣言。而且当他在同样的一页告诉我们,这一进程的集体主宰——由同样的超国家力量构成——自身“在神秘的迷雾面前模糊不清”时,人们忍不住要问: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知识基础之上,这个新的命题敢推荐自己?然而,在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答案之前,中心断言已经被背部的混乱所压倒,就像吉登斯的论证一样。尽管这

些断言仍然保持着修辞上的喧嚣,时间和空间的主导性分析价值却在它自身中逐渐向后退却了。待到“神秘的迷雾”消散后,这些论点又立足于另一个更熟悉的海岸。事实证明,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空转换是由“技术发展的飞跃所触发的(但无论如何不是由其决定的)”<sup>④</sup>。实实在在地驱使着它们的是,它们通过运用“资本”来确保、扩展和隐藏剥削和再分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利的不平等得以再制造。既然鲍曼不能运用时间和空间来解释这种机制本身(仅仅是指出了它们的隐蔽性,并能成功地防御任何抗议)的方法,人们可以说,该书一开始时生龙活虎地响亮向前的知识号角,在结尾处真正地收兵了。

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简单的、单一的结论:我们讨论的知识要求本身是问题的根本来源。它不可避免地要把时空范畴推进到一个不能想像它们能够完成的角色中去。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全球化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争论本身也就开始失去了努力争取的意义。在一个更深层次——定义的层次——上使之失效,论述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不引起范畴错误指责的连贯性命题。

对于建立在错误范畴之上的论证,必须搁置一个特殊种类的知识判断,可以借用理查德·科布登关于权力平衡理论的结论的记载:

这不是一种谬论、一种错误、一种欺诈——这是一种未曾描述、不可描述、不能理解的空洞无物;它们仅仅是些单词,向头脑传达的不是观念,而听上去似乎是那些同样空洞的音节。我们的祖先曾把这些音节同普雷斯特·约翰或点金石等形式放在一起,为了使他们自己对词汇感到困惑!<sup>⑤</sup>

事实上,科布登误解了权力的平衡,我们也误解了全球化理

论。但是果真如此的话,现在就必须显示出来。这一论述的任性的、投机的初次登台终究不会长久。在某些方面,知识连续性的正常规则必须重新强调。而且当人们这样做时,全球化理论将和其他所有已经昂首阔步登上社会科学舞台的宏大理论一样,要么得到巩固,要么趋于沉寂。

## 注 释

- ① 我从以下两处资料推导出这个游戏的规则:其一,是D·贾里和J·贾里的“安东尼·吉登斯的转换”(The Transformations of Anthony Giddens)一文,再版于C·布赖恩特和D·贾里主编:《安东尼·吉登斯 批判性评价》第4卷,伦敦1997年版;其次,是布赖恩特和贾里主编的同一本书的第1卷导言,题为“评价吉登斯的全部作品”(Evaluating Giddens Oeuvre)。
- ② I·克莱伯,“人们的问题”,第356和358页。
- ③ Z·鲍曼:《全球化:人类的结果》,第57页。
- ④ 同上,第70页。
- ⑤ “俄罗斯”(Russia)摘录于M·G·福赛斯、H·基恩-索珀和P·萨维吉尔主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从金蒂利到特赖奇克选读》(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lected Texts from Gentili to Treitschke),伦敦1970年版,第309页。